

作者的話

我的回忆录是回忆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和1912年新的革命高涨时期彼得堡的革命工人运动的，当时受了打击的俄国无产阶级复原了，又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走上同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进行大规模斗争的道路了。

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些年代的英勇斗争是与这些革命事件密切联系着的，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在1917年10月成了胜利者。我一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就是这些斗争的参加者；如果我能在某种程度上对现今有关这个惊人时代的资料提供一些补充的话，那末我是很满意的。

本书的最后几章，是想叙述二月革命以前的那几年我在西伯利亚过的流放生活。

极大部分的回忆，已由参与各次事变和事件的同志们所证实。在写本书时，我参考了我手头所有的刊物和档案文件。

本书的个别几章，已用各种不同的题名在1924到1930年间发表了。比较完善的版本，是在1933年出版的。

现在这一版又经过相当的修改，补充了许多新的材料和文件。

阿·茨维特科夫—普罗斯维契斯基

ЭАК/80/120

目 录

作者的話

- 一 我的革命活动的开始。文化教育协会“教协”。
秘密小组。职工会…………… 1
- 二 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明星报”。第三届国家
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23
- 三 連納惨案和彼得堡对它的响应……………39
- 四 1912年彼得堡工人的五一示威游行……………44
- 五 第四届国家杜馬的选举。11月15日的
示威游行……………57
- 六 1913年的五一示威游行。逮捕。监狱……………69
- 七 在第四届国家杜馬旁听。社会民主党党团
的分裂……………83
- 八 奸細……………89
- 九 保險透动和伤病互助会……………95
- 十 第二次被捕。在候审室…………… 108
- 十一 工人运动的高漲。七月事件。战争的爆发…………… 119
- 十二 第三次被捕与流放西伯利亚…………… 135
- 十三 押解…………… 145
- 十四 伊尔基涅沃村…………… 163

十五	政治流刑犯合作总会·····	165
十六	流刑犯的成分·····	167
十七	流刑犯的逃跑·····	171
十八	流刑犯的生活問題·····	175
十九	西伯利亚大森林·····	181
二十	合作总会商店的成立·····	190
二一	关于革命的消息和从流放地启程·····	195
二二	康斯克——彼得格勒·····	202

一 我的革命活动的开始。文化教育协会“教协”。秘密小组。职工会

1907年，我还是一个16岁的孩子时，就在特威尔茨河岸的天桥作工，打桩。和我一道工作的人几乎全是所谓流氓无产者一类的人，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饮酒作乐。只要能赚到酒钱，什么工作条件都能答应，哪怕一天为四、五十个戈比工作到十一小时，得到工钱以后，许多人都“蹓跶”去了，而他们的位子便雇他们的另一些伙伴代替了。

在这一伙人当中，很少谈起1905年的革命，假定偶然有人谈起了，那么从这些流氓口里所听到的也只是对革命者和沙皇的谩骂。他们所以骂革命者，是因为革命者在翻天覆地的时代不许他们抢劫，而骂沙皇则是因为他样样不好。但是在反动政府屠杀时期，这些流氓却同便衣警察、侦探及“俄国人民协会”的会员们一齐加入了黑色百人团。

我常常亲眼看到这些作奸犯科的家伙在杀人以后的那种丑态。自然，向这班人是学不到一点好处的。我想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工人。

放工以后，我常到普罗哈洛夫斯基工厂的工人俱乐部去，那里经常有工人聚会。这个俱乐部是在1905年“自由”的日子里成立的，总算侥幸保存下来，没有被警察和黑色百

人团破坏。1905年革命时期，我父亲在这个工厂里作工，而我还完全是孩子的时候，就跟着母亲一道从乡下到这里来找他了。有一次，在一个阴雨天的深夜里，我看到彼得堡出来的几连哥萨克骑兵走过工厂区漆黑的街道去镇压罢工的工人。这是在1905年10月总罢工时候的事。我当时又怕又恨地盯着这些歪戴着帽子的彪形大汉——革命的刽子手。人们都说，哥萨克骑兵在工厂里拿皮鞭毒打工人，实际上在第二天真发生了这种事。这时，我想详细地知道一下大约在两年以前发生过的这类事。

在普罗哈洛夫斯基工厂，我接近了1905年10月罢工时的几个积极的参加者。他们讲的革命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所以我便开始看书，希望能多知道一些革命斗争的事。

过了一个时期，我到玻璃制造厂当了一名正式工人，但不久我与我乡村小学时的一个同学帕·耶·斯米尔诺夫通信后，我就到喀琅施塔得去找他了。斯米尔诺夫曾因参加革命而被捕，释放后继续在喀琅施塔得的港口担任事务所的职员。当时我父亲在梁布兴斯克工厂做工，我跟他商量一下后，他就放我走了，于是在1907年春天我在口袋里装了五个卢布就离开了天桥。

起初，由于斯米尔诺夫的帮助我在喀琅施塔得的港口当上了一名小工，每月挣16个卢布，过了一个时期我又在造船工程师那里“试验”及格开始当上了造船的木匠，每日工资为1卢布30戈比。

当时喀琅施塔得扑灭革命的情形，还使人记忆犹新。喀琅施塔得的工人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曾有两次掀起武装起义：一次在1905年10月，一次在1906年7月。在镇压他们的斗争中，沙皇政府利用了驻扎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区的政治上最落后的陆军部队。

1906年的7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在喀琅施塔得开始残酷屠杀起义的人。陆海军中的各级野蛮反动军官都以残暴而自矜。大批积极参加起义的人，被拖到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周围，多半是被拖到芬兰湾北岸的狐鼻角枪毙或吊死了。喀琅施塔得的居民一直把这些地方当做革命战士的烈士墓。

狐鼻角被指定为屠场，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森林蔽天、人烟稀少、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地方。沙皇的刽子手虽然已造成了一片镇压革命的反动气氛，但也怕人民的忿怒，所以就极秘密地屠杀革命战士。

极大多数的起义水兵，是在1906年下半年专制政体趁革命运动走向低潮而扑灭政治上不可靠的水兵的时候被屠杀的。

在喀琅施塔得本地也枪毙人，但枪毙以后是把尸首装在驳船上抛到大海里，或运到上述的那个狐鼻角或奥兰尼巴乌姆岸边挖一个大坑埋掉了。有时，借口押送起义军到那个海岸，也叫他们坐在这种驳船上，但及至到了大海里，却被预先敷设的水雷连船带人都炸沉到海底了。

由于喀琅施塔得是个海岛，同时要塞重地情况又特殊，

所以喀琅施塔得与俄国其他各地孤独地隔开。凡出入喀琅施塔得的人，都要受到严格的监视，旅客的行李和护照都要经过详细的检查。这一切就使喀琅施塔得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困难，同时沙皇政府又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与“暴徒”斗争。他们散发了黑色百人团的许多传单和小册子，教会也出来帮凶。1907年，当时安得烈也夫大教堂的一个有名的司祭长、黑色百人团团员伊奥尼·喀琅施塔茨基到这里进行活动。他在举行“隆重的礼拜”时宣传屠杀。勾结在他周围的有全城的黑色百人团分子。有时，他做“礼拜”和“布道”时还把从乡下出来刚找到工作的码头工人引诱进来。这类工人与正式无产者不同，脑子里充满了宗教迷信。

在这满目凄凉景象中，青年工人表现出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们经常谈论1905年斗争中特别惊险动人的故事和革命英雄们的事迹，唱这一类的歌曲。当时流行的曲子，是歌颂海军上尉施米特领导的黑海水兵起义的事迹。最风行的是讽刺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歌曲（在这个曲子里有这样的话：“尼古拉第二雄赳赳，颁发诏书满天走；双手扼死自由，活的一个不留”）和开头是这么两句话的一个曲子：“全俄的皇帝，宪兵和侦探的沙皇，沙皇刽子手，奸细，酒店老板……”以及其他曲子。歌颂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和1905年革命中其他事件的曲子也有。有的曲子是暴露神父的说谎和欺骗的，比如在“神父和魔鬼”的歌中就是这样。在这首歌里，说到神父怎样用“地狱”来恐吓不服从政府的工人，也说到魔鬼听了这种说教后怎样拖着神父到了这么一个工

厂：“百丈的高爐紅光閃閃，鬼火直冲天，千斤的鉄錘隆声連連，火花象噴泉，无数的工人被濺滿一身。这时魔鬼向神父說：看吧，这就是資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后一滴血汗的地獄。”这个實質上是原始的歌曲，对于当时暴露宗教对群众的欺騙有很大的意义。

在上述的这个黑暗反动年代，喀琅施塔得的地下革命工作做得很差。青年工人是听了过去革命的故事和歌曲才懂得革命的道理并受到教育的。但只有革命的歌曲和故事是不能滿足我們的。我們要寻求一条在实际工作中發揮自己力量的道路。在碼頭工人中产生了組織革命小組的思想，但由于几个最积极的同志走了，小組沒有組織成功。

1908年初，港口上决定解雇一千多个工人，我也在被解雇之列，所以我到了彼得堡。

我开始找工作了，只过了一个月，就找到了，我在彼得堡港口做了一名安装軍艦的助手。我的叔父，彼得堡的老工人格·姆·凡察戈夫也在这里当安装匠(工长)。

人烟稠密的彼得堡与冷落寂靜的喀琅施塔得完全不同。虽然在工人当中有反动和消沉的情緒，但这里究竟燃起了革命的火花。当时在彼得堡有12个工人文化教育协会，或所謂工人俱乐部，有几个工会，在这些团体里也尽可能地进行着革命工作。

这些革命团体散布在全城：在市区有斯达修列維奇①

① 姆·姆·斯达修列維奇(1826—1911年)——自由主义的政論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俱乐部、“妇女互助会”、印刷工人音乐戏剧教育小组；在科洛敏斯克区有“教育”协会；在纳尔维区有纳尔维区教育协会；在涅夫斯克区有“光明”俱乐部；在莫斯科关卡有“教育”协会；在彼得堡那面^①有“知识”俱乐部；在华西里耶夫斯克岛有“光明和知识之源”；在维堡区有沙普索尼耶夫斯克教育协会；在沙洲有“科学”协会；在奥布霍夫工厂区有“知识—光明会”、涅克拉索夫教育协会等。其中有些是从1905年保存下来的，有些是在1907年和以后根据沙皇政府在革命的压力下于1906年3月4日所颁布的集会结社暂行法令而成立的。

这些协会活动的范围，由于受到警察的多次阻挠而大受限制，凡是“对社会的安宁和治安有威胁的”活动，一律禁止。全体大会每次只能在市长特别批准和警察（警察分局长或巡官）一定在场的条件下召开。

这类工人文化教育协会和工会在俄国其他城市和工业区的某些地方也有，但是它们都受到警察的摧残，不可能充分地开展工作。

从1905年到1914年的这一段时期内，这些“合法的”工人组织，如文化教育协会或所谓工人俱乐部、夜校、工会以及后来的伤病互助会都有很大的意义。的确，在伤病互助会的理事会中有工厂主的代表，但工厂中的这些伤病互助会究竟是工人的基层组织。党组织在这些组织的掩护

^① 彼得堡那面是一个地名，如上海的浦东，下同此——译者。

下进行了革命工作，从这些組織的工人当中吸收了新的黨員。这些合法的組織虽受了警察的摧殘，但在反动时代中，在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工人运动方面，起了极大的組織教育作用。

1908年5月，在一个工人文化教育协会即1907年成立的“教育”协会的全体大会上我被吸收为该会的會員。这个协会的会址設在科洛敏斯克区的一条偏僻的工厂街上，与法俄工厂和彼得堡港口相距不远；房子很小，是从一个房东手里以每月45个卢布租下来的。

虽然协会設在工人区，但它的會員那时还未超过100人。其中有些人，主要是法俄工厂和彼得堡港口的工人，虽在1904和1905年初还是加邦組織的會員，但在1905年1月9日以后就参加社会民主党了。

工人們不大关心协会的活动，很少到会里来。但是在酒店和小飯館里，直到深夜还挤滿了老工人和青年。特别是在节日里，在小飯館附近的街道上，常常发生吵嘴和打架的事情。工人們的老婆常常手里抱着孩子站在馬路的角落里等候她們喝醉酒的丈夫回去。

那时孟什維克在“教协”中占着优势，事实上他們包办了协会的一切領導工作。布尔什維克在这里总共只有几个人，其中有阿·莫·皮列科和皮·莫·阿法納森科这几个人，后来我和他們都建立了亲密的友誼。同布尔什維克一道工作的，还有我小时候的同学斯米尔諾夫，那时他已从喀琅施塔得来到彼得堡了。在协会的會員当中，还有一小部分覺

悟的青年工人是跟着布尔什維克走的。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悲伤“信条”的作者之一庫斯考娃常来协会。她总是罩着面紗，衣着清雅庄丽。不論談話或在大会上講演，她的一举一動都显露出了十足的紳士派头，矯揉做作，非常驕傲，所以会里富于革命热情的一部分會員都远远的躲开她。但孟什維克却認为她是他們崇拜的偶像，对她非常殷勤，她在他們之間，博得了很大的威信。

在这个时期，“教协”已显著地展开了它的工作。晚間常常举行普及教育講座。为了补助經費，曾經举行过募捐講演会和游艺会，这些也帮助我們加强了工人之間的联系。在这些講演会和游艺会上，社会民主党第三届国家杜馬的党团往往也全体出席。他們利用各种政治題目給最可靠的會員們秘密地做报告和学术講演。但在举行这些會議的时候，在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总是发生激烈的爭論。有时社会革命党在爭論时也参加了，尽管他們永远是少数的几个人，而且在有組織的工人当中不起什么作用。往往警察接到暗探和奸細的告密后，就突然派大队人馬闖进来搜查，把到会人們的姓名一一登記下来后成批地带到分局进行“身份調查”。如在到会的人們当中发现有党的秘密工作者，則立即逮捕，关到監獄中去。

工人文化教育协会因經費不足，常常弄得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总是出来帮忙，但因工会自身在經濟上也很拮据，所以不得不常常另找別的办法。如在1908年，我

們协会因为长期繳不起房租而被房东逼着搬家时，就是利用會員們自由捐助的 50 个卢布才繳了房租的。但是方式不只这一些。我們曾經派一个會員去請有名的历史学家莫·莫·柯瓦列夫斯基教授給我們担任一次募捐的講演。柯瓦列夫斯基同意了。他选定了这么一个題目“卡尔·馬克思和斯宾塞”。因为柯瓦列夫斯基去过馬克思家里許多次，所以他时时談起他自己的印象，把世界无产階級偉大导师的生活告訴給听众。为使在場的警察分局长不注意起見，他滑稽地講到各种瑣細的事情，比如他有一次到馬克思家里时，馬克思的夫人还請他吃美味的肉包子等等。这次講演收到 250 个卢布，因此严重的經濟危机暫時得到克服了。

为使彼得堡各工人俱乐部的活动取得联系、互助和配合起見，成立了俱乐部的聯絡委员会。为了这一目的，在委员会成立不久以前已成立了工会的联合会，或所謂总办事处。当然，俱乐部的聯絡委员会和总办事处都是秘密的，因为这些組織的任何联合在当时都是被禁止的。参加这些組織的同志都有被逮捕和被流放的危險。

然而尽管有这些迫害，党組織还是巧妙地利用了工会和文化教育协会。无怪彼得堡暗探局在給警察厅的一份报告中称这些組織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輔助机构”。暗探局在这份有趣的报告中訴苦說，发现党委会开会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會議是打着文教团体或俱乐部理事会會議的名义来进行的。为了能够討論党的問題，参加会议的人都想尽了各种巧妙的办法：在約定的時間以前

开会，在講演时趁人們把警长領到食品部的机会决定党的問題；收买戶籍人員等等。

在斯托雷平反动的黑暗时代，彼得堡是社会政治生活非常活跃的中心。在1908年和1910年之間的这一段时期內，在这里召开过各种代表大会，如人民大学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和戒酒代表大会。在这些代表大会上也邀請工人文化教育团体的代表参加，而在某些代表大会上甚至还邀請工会派代表出席。在代表大会會議期間，工人代表总是要同参加大会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和一部分黑色百人团所凑成的多数进行論战。

我曾經当过戒酒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大部分的人是戒酒协会和其他宗教慈善机关的代表。大会上有许多神父，他們建議“用宗教治疗人民所中的毒”。我們的代表对資产階級黑色百人团的这些听众表明，关于酗酒的問題是与現存的警察殘暴制度密切联系着的，在这种制度下，即使工人組織提倡的一切文化生活是以劝导工人戒酒为目的，然而也都会遭到有产階級政权方面的各种反对。所以我們宣称必須号召工人階級用一切力量首先与这种制度作斗争。当然，这些话是在公开的場合講的，所以工人的代表不得不避免用“刺激的話”。但这些话还是使代表大会上的一部分資产階級黑色百人团听了头痛。因此，一会儿警察来了，暗探局的偵探也手忙脚乱起来了。以后两天的夜里，便有許多工人代表被捕或被驅逐出彼得堡。

1908年秋天，“教协”的几个會員菲奥道尔·伏洛什尼

科夫、斯捷潘·費多羅夫、我和其他幾個同志加入了布爾什維克的秘密小組。小組的任務是給參加的成員進行政治訓練，然後吸收他們到黨的地下組織中來。我們常常到某同志的屋子裡聚會，由宣傳員“馬克司”^①到這裡來給我們上政治課。為小心起見，每次上課時都派了一個望風的人，看到警察來的時候馬上警告開會的人。

在小組裡介紹當時俄國各左派政黨的綱領要求時，使我們感覺特別親切和易于理解的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布爾什維克派的徹底的要求和方針。我們處處都碰到過勞動人民受的壓迫、窮困和剝削，看到過“高等”階級窮奢極侈的寄生生活，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必須進行推翻沙皇專制政體的革命鬥爭。我們小組組員的鬥志是昂揚的。在為俄國工人階級的基本要求而鬥爭中，我們不怕任何困難，不論監獄和流放都吓不倒我們。

在學習中，我們是根據一些片斷的材料，來研究策略問題的，但是我們還需要在此實際活動的過程中更多地來認識這個問題。最初於1905年7月底在國外日內瓦出版、而後於1907年收在“12年中”這本集子中的列寧的名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是當時稀有的寶貝，得之非常不易。早在1907年12月22日，彼得堡法院已決定焚毀此書，但是還保存下幾本。這幾本書保存在小組內供大家秘密研究。

① 他的真名字我一直不知道。

在1905年革命时期俄国所出版的各种公开和半公开的馬克思主义的書籍中，我記得必須要利用的有下列几种：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統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致彼得堡工人的信），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梅林：“历史唯物主义”，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經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倫理学和唯物史观”、“馬克思的經济学說”，狄茲根：“社会民主党的哲学”以及其他等等。政治經济学这門課程，我們是根据維·雅·若列斯諾夫当时的一本名著学习的。

过了一个时期，我們的宣傳員“馬克司”被捕了。他被关在彼得堡的“十字”監獄，不久就死在那里。

我們小組的工作暂时停頓了一下以后很快又恢复了。然而就是这个重新恢复的小組也沒存在好久。不久在工人文化教育协会和工会的會員中，接連发生几次被捕的事，因此，我們小組的工作又陷于停頓。可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們当中的許多人已經与党内的人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起初是担任一些技术工作，以后是担任党的其他工作。

布尔什維克党組織在这个时期的人数极少，而积极工作者、党委和党小組成員又时常遭到逮捕，这就极严重地妨碍了党工作的順利进行。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参加某些秘密會議的同志，一出門就不再回来了。譬如，我到彼得堡后，与我同屋住过一个时期的同事阿·莫·皮連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1909年3月1日的早晨，他从家里出去，但到中午，他已被关到“十字”監獄中了。皮連科之所以被捕，是因

为奸細要趁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全体委员在涅夫斯基大街心理神经病理学院的一个大厅中开会的时机把他们一网打尽。被捕的事完全出乎意外。出席会议的人刚开始讨论问题，在会场外面望风的一个学生就马上惊呼：警察来了。大多数同志跑到阳台上，但由于那里没有通到院子外面的门，所以他们都在那里被捕。藏在学院隔壁大厅里的那些同志也没有能躲掉。所有被捕的14个人——皮连科、布勃烈耶夫、布伊科、邓尼索夫、塞索耶夫、德沃尔佐娃等——都被关在“十字”监狱，1909年年底被提到圣彼得堡法院审判。审判结果，8人被判处流放，4人开释，其余的人则按行政手续被驱逐出彼得堡。^①彼得堡委员会成员被捕之后，必须重新建立彼得堡组织的领导中心。

1909年五一节以前，布尔什维克的彼得堡组织向工人发表了五一宣言，号召工人纪念国际无产阶级罢工的节日。这个宣言的份数固然有限，但在五一节的前夕已全数散发到工人区域中了。

虽然到处沉闷，很难期望工人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但在这一天以前，暗探局和警察局还是动员了他们的全部力量。一到晚间，就可以看到警察大队虚张声势地加紧戒备和

^①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监狱和流放地充满了革命者。到1909年被关在沙皇监狱中的人已达17万。从1907年到1909年，沙皇法院因各种政治案件而判决的有28,000人，其中判决死刑者5,086人（已执行的有2,073人），罚做苦工者6,517人，参加囚犯工作的15,590人，流放者1,009人。

搜查。

那时我同伏洛什尼科夫、斯米尔諾夫三个人住在里日斯克大街 13 号一所房子里。五一前夕，我带着一包五一的宣言很晚才回到家里，准备天一亮就送到一个工人区去。我把它放在床底下就脱衣上床睡了。斯米尔諾夫看见我藏传单时还问我是什么东西。

——你把什么东西带回来了？

我回答他以后，他翻了一个身就脸朝墙睡着了。停了一会儿我也睡着了。

突然在后半夜三点鐘，听到走廊前門上的鈴响得很厉害。斯米尔諾夫立刻猜到这是怎么回事。他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抱着我那包传单跑到他老母亲来看他时睡的厨房里，把传单藏在毯子底下。

他回到屋子里时，房东已经把大門开开了，同时警察分局长带着的 15 个警察也闖进来了。我們听见警察分局长問房东：“这是什么地方？”在得到滿意的答复后，警察們便猝然闖进我們住的房間。这时我和伏洛什尼科夫已經起床了。

——不許动！——警察分局长掏出手枪叫了一声。

我們站着不动。一部分警察把一切出口和門堵住，其余的都跑进屋子里来。

开始仔細搜查了。警察分局长坐在桌子前动手翻我們的旧信、筆記本和書籍。两个巡官和一个便衣警察也翻箱倒篋，乱翻抽屜、床鋪、……里的东西。但分局长两只眼睛

有好大一会儿不去看信和書，而是向四面瞟着。突然他的两只眼睛盯在鏡子后面放的一卷紙上，立刻吩咐一个巡官去檢查。这是些已經用过的一个报告的提綱。我不記得这提綱是我們当中那一个人的，但我記得总是有一个人因为不贊成这个提綱，觉得写得不好，还用藍鉛筆在上面批了这么几个字“最好叫无知的家伙束之高閣吧。”巡官把紙头上面写的字讀了一遍，接着又稍微打量了一下以后就报告分局长說这是“科学的东西”。他們把这卷紙仍旧放在原来的地方。

后来，我們把巡官的十足无知譏笑了很久，因为这些提綱很可以作为他們陷害我們的証据。

警察一直搜查到清晨，但是除了几本書分局长認為可疑而需要帶走以外，再沒有发现什么特別的証据。

一包宣言也沒有被发现。在搜查时，有一个警察跑到厨房里要斯米尔諾夫的母亲給他倒碗水喝。但她惟恐放在毯子底下的那包东西被他发现，所以她就假装有病，睡在床上不肯起来，要他自己去扭开龙头喝水。

搜查完毕，警察分局长說，我和斯米尔諾夫是否逮捕，要看搜查的結果而定，但現在既然沒有发现什么特別的东西，所以还是讓我們自由。至于伏洛什尼科夫，則不問搜查結果如何，一定要逮捕。

非德穿好衣服后，在警察的监护下被帶到監獄去了。天已开始亮了。我和帕維尔往窗口外边望了一下，很清楚地望到非德虽然还完全象个孩子，可是当一群警察拿着手枪和刺刀簇拥着他到街上时，他却昂着头由大門口迈步走向

里日斯克大街。

——說不定有一天这个小孩子会成为政治家哩。——
帕維尔談諧地說，他在我們中間年齡比較大一些。

搜查以后过了一个鐘头，我携着我那包傳单送到普梯罗夫斯克工厂区。

五一那天，港口上照旧从清早就工作，但我决定不去上工。因为在前一天夜里，會員們已經說要到城外去举行当时所說的“五一游行”或“群众大会”。指定了几个集合的地点，其中有一个地方只有几个同志曉得，是离奥哈特很远的一个森林里面，我們便决定到那里去。

这一天天气晴朗。工厂区域的烟囱照常冒烟，照常工作，沒有一点紀念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节日的征象。我們出城之后，在树林边遇見两个担任放哨的同志，他們向我們指点如何走到“群众大会”的地方。

大会开始了，到会的有 60 个人。由一个同志作了簡短的演說，指出五一的意义和西欧无产阶级紀念这个节日的情形。但他剛剛講完，放哨的人就发出警号：“警察！警察！”

几分鐘之后，在树林那面出現了騎馬的警察。所有到会的人都赶快在森林里散开，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同志被警察逮捕。其他各区的“群众大会”也差不多是这样結束的。

第二天我上工去了。据說五一那天沒有上工的只有 5 个人。当天我們 5 个人都被叫到事务室里，并且被警告說

以后如再有这种曠工的事，一定要开除我們。由于当时工人运动非常消沉，当局絲毫沒有怀疑我們曠工的真正原因。甚至連工友們，因为保守秘密的关系，我們也認為不可能公开地告訴他們，所以他們也猜不出我們曠工的原因。

五一节夜里被抓去的菲德·伏洛什尼科夫在三个星期以后被放出来了。

逮捕彼得堡党組織委員的事情还在繼續发生。

有一天，彼得堡組織的秘密印刷所被破获了，暗探逮捕的一批同志中有我們“教协”的两个同志——安得烈耶夫兄弟俩。最初安得烈耶夫兄弟俩被押在加里金桥旁的科洛敏斯克警察分局。安得烈耶夫兄弟俩住的那个牢房，窗口正朝着芬塔克河岸，于是我和菲德·伏洛什尼科夫便利用这个机会同他們建立了特別的通信联络。安得烈耶夫們見我們在約定的時間到芬塔克河岸散步来了，于是他們便小心翼翼地从監獄三层樓上的小窗戶里拖下一条綫来。这时我們两人之中，由一个人監視着看守人，另一个人趁守獄的卫兵沒有走到跟前的机会，馬上把事先准备好的紙条子拴在綫头上。随后，关在牢里的人又小心地把綫拖上去。但是，与被捕同志的这种通訊联络沒有維持好久。不久安得烈耶夫兄弟俩被解到审前拘禁所，以后他們又和同案子的其他难友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罪名被解到圣彼得堡法院。

审問是由參議員克拉舍尼尼科夫主持的，这个克拉舍尼尼科夫，就是后来于1915年2月审判第四届国家杜馬布尔什維克党团代表时担任主席法官的那个克拉舍尼尼科

夫。我們協會不多的幾個人設法鑽進了法庭。女孩子們——我們協會的會員，帶着許多鮮花。她們一看見士兵刺刀明晃晃的把被告帶到被告席上和克拉舍尼尼科夫宣布審判開始的時候，就把鮮花越過欄干拋到被告跟前。氣勢汹汹的參議員立刻宣布休息，命令警察把我們從法庭驅逐出去。我們不等警察“先下手”，已混進法庭里的許多人當中很快地溜之大吉了。

這次審判的結果是：大部分同志，其中包括安得烈耶夫兄弟倆，被褫奪一切公權，終身流放到西伯利亞。

我們借口參加晚會和聽講演，也常常到其他合法的工人團體里去，所以，除了與他們建立新的關係以外，還有可能參加其他區域的社會活動，甚至還可能探聽到一些警察“襲擊”我們同志住宅的情報。這不只是一種叫我們以後要特別小心來往的警告，同時也是警告我們要把房間收拾干淨，以免暗探局和憲兵司令部在捕人時抄到可資利用的一切東西。但是由於當時在工人組織周圍有許多奸細，暗探還是能依靠他們的幫助在這幾年中製造出不少的案件。

秋天，我決定進教員訓練夜校，準備受相當訓練後到工人夜校當教員。

我做工的那個工廠，工作時間有 10 個半鐘頭長，夜里我還要參加黨的社會工作。在這種情形下學習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就有一個到事務所去工作的念頭，因為那裏的工作時間稍微短些，可以擠出幾個小時到夜校學習。

在大冬天，我請文化教育協會熟識的一個同事耶·維·

斯維特罗甫斯基教授^①帮我在互助貸金协会找到出版股的一个办事員的职位。

我虽然担任新的职务,但没有停止我在“教协”的活动。在那个时候,在我们协会的会员中有一个成立工商业事务所职工会的思想。要实现这个理想頗不容易。在1905年革命时期广泛发展起来的职工运动,在反动年代是低落下去了。在彼得堡約計有10个工会,会员不多。他們同文化教育协会一样,受尽了各种迫害。警察厅在1907年5月10日对各地方分局发出的通令中早已說过:“应特別監視和密切注意工会会员和他們的活动,只有确实証明他們同社会民主党毫无关系,才可允許他們合法存在,但如发现上述組織稍有越軌的行为和企图,应立即将其查封。”^②

工会和工人文教协会都是要遵照“1906年3月4日的暫行法令”来成立的。他們的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只能筹划互助基金,帮助会员寻找工作,担任法律顧問等等;工会参加罢工和干預政治生活是被禁止的。工会要保护自己的会员不受剝削,只可“寻求一个用协商或仲裁的方式来消除劳資双方(雇主与被雇者之間)因协商不成而产生的誤会”。事实上,这种“权力”不发生任何效力,因为真要发生

① 耶·維·斯維特罗甫斯基的观点是旧民粹派知識分子的观点。他同列斯加佛特訓練班有关系,对工人文化教育协会曾予以各种帮助。

② 見巴兰道夫著:“斯托雷平的反动”,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38年俄文版,第27頁。

“誤会”，雇主是不和工会进行任何談判的，而工会也无“权”强迫他們这样做。

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以組織的形式卷入同資本主义的斗争，还是緩慢的。所以工会所能团結到自己队伍中的，往往只有 200—500 个思想最觉悟和最革命的工人。譬如我知道，彼得堡木业工会就是靠 10—15 个积极的党员同志活动的，因为他們的理事和我在一道工作时有联系，有时并請我参加他們的會議。这个工会的会址設在两間小屋子里。一間做会客室和儲藏室，另一間做會議室和办公室。当然，工会没有一个看門的人和打扫的人。

那时工会的工作主要是征收新会员、印刷和散发会员們看的公开的傳单和宣言。公开的大会很少举行：一則很难得到市长的批准，二則警官們到場以后就不能照自己的心意和需要开会了。

工会会员的人数不仅沒有增加，而且倒减少了。工会的会员，特别是积极的人，常常被工厂开除、被捕或被流放。普通会员对工会的存亡不很关心，因为那时工会对自己会员們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一件事也做不到的。

根据 1910 年 5 月 23 日木业工会全体会员大会的报告，我們知道，在 1908 年工会会员有 1,600 人，但在 1909 年却只有 446 人了。在 1910 年重新登記期間，会员有 250 人，其中按时交納会費的虽有 92 人，但到 1911 年則只有 20 人了。在工会印刷的机关报中——最初在“木业工人之声”，以后在“工人回声报”中，登載过几个訴說工会困难的启事。

木业工会工作的沒有起色，一直繼續到 1912 年工人运动出現新高潮的时候。

那时其他工会的情形，也是一样，或者稍微好一些。其中會員人数最多的是五金工会，1910 年 1 月 1 日有會員 3,678 人。那时，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哩。但會員的流动性簡直不敢想象。比方在 1910 年这一年中，新加入的會員虽然有 1,483 人，但退会的也有 1,266 人。

但不管“斯托雷平制度”下的情形怎样，为了扩大党工作的基地起見，布尔什維克采取一切方法不仅恢复了警察所封閉的工会，而且还成立了許多新的工会。

我們打算組織的事务所工作人員工会，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情。事务所職員們的特点，是經常暮气沉沉、惰性成习，而且往往在罢工的时候站在老板方面。成立这种行业的工会，是想使彼得堡各事务所的職員参加社会的革命生活，同时也推动俄国其他城市事务所工会的成立。那时候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沒有这种工会。^① 只有在巴庫，从 1908 年起成立了一个事务所、工厂和工业職員的工会，人数不过 35 人左右。

工会的发起人，除我和斯米尔諾夫、伏洛什尼科夫以

① 从 1906 年起成立的“办事員、會計員协会”在彼得堡存在的时期很短。这个团体在 1908 年 9 月 16 日因为官方認为它的活动“对社会治安有危害”而被查封了，但事实上它的活动老早就停頓了。在伊万諾夫—沃茲涅先斯克市，这种工会由 1906 年維持到 1909 年。

外，还有彼得堡各机关的四个人：托尔斯泰哈諾夫、茨渥伊嘉斯基；波利卡尔波夫和考波索夫。在发起人的头几次会议上拟定了未来工会的章程，指出了今后組織工作的道路。我們呈請市政府办公厅批准章程，但他們把章程退回来要我們作相当的修改。最后，經一再拖延后，才把章程批准，我們也才能着手組織工会。

首先需要找房子。房子租在里特大街的区域内，該区周圍集中着許多商店、工商企业和銀行。然后我們在办事員和職員們当中积极展开了吸收會員的工作。第一次成立大会是到1911年12月才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我和发起人中的其他几个同志被选入理事会，而帕·耶·斯米尔諾夫則当选为主席。

二 布尔什維克的报纸“明星报”。第三 届国家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

1910年，特别是在那年的下半年，在工人群众中开始显露出活跃的气象。无产阶级象酣睡的勇士一样，从俄国的昏睡中惊醒了。合法的工人組織、工人的文化教育团体和工会的活动都活跃起来了。

在一部分有組織的积极的工人当中，开始紧张地討論必須出版公开的工人报纸的問題。当然，寥寥可数的几种杂志是不能滿足工人們的要求的，况且大多数是操縱在取消派手里的，而从国外运回来的布尔什維克的秘密报刊又是极其有限的。

关于出版公开报纸的問題最后解决了，1910年12月16日布尔什維克的周报“明星报”創刊号出版了。在題为“我們的任务”的社論中，講到了我們对这种报纸的极大的需要和它所受到的极苛刻的檢查。

文章中說：“社会思想象一只被射伤的鳥儿，想飞而不能飞……”

在这种时候創辦报纸，我們是不想欺騙自己，也不想欺騙讀者的。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在現时的处境中，俄国报纸是不許可完全明明白白地报告俄国的生活的。我們常常不

得不在我們認為最不利于我們的時候保持沉默。我們常常不得不在形勢需要把話講清楚的時候，只能講一些人們勉強聽得懂的話……。”文章接着說：“但我們相信這一點：不論在什麼情況下，報紙決不說謊。”

報紙的積極工作者是：維·旁奇—布魯耶維奇、莫·奧里敏斯基、伊·波克羅夫斯基和尼·波列塔耶夫。在“明星報”上常常刊登列寧和當時還反對取消派的普列漢諾夫的許多文章。

第一個工人報紙的出版，是我們的一件大事。整包的報紙一送到各文化教育協會和工會，不多一會兒就當場賣光。當然，如果估計到“明星報”在一星期之中只出版一次，甚至經常還被沒收，那麼就可明白，報紙是不能常常落到廣大工人羣眾的手中的。然而布爾什維克報紙出版的這一件事本身就具有極大的意義。

“明星報”從出版的第一天起，除進行革命宣傳和表達工人的意見而外，還與當時傳布到工人羣眾中的知識分子的頹廢情緒進行了最堅決的鬥爭。知識分子想拋棄革命手段來解決一切“問題”，如“兩性之間的問題”，降神學和美學的問題。而且當時的美學已成為他們本質上腐化墮落思想和“追求”享乐的掩護物。象阿志巴綏夫等一群唯美主義的名作家，竟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崇拜的偶像。凡領導權抓在孟什維克手裡的工人文化教育協會和俱樂部，都邀請這些作家講演，甚至朗誦他們自己的作品。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伯爵在知識分子中特

別有威信，但不是把他当做偉大的語言艺术家，而主要是把他当做“精神上的領袖”。托尔斯泰在1908年沙皇軍事法庭大肆活动时期猛烈攻击死刑的言論，虽然不只是譴責了沙皇政府，而且也譴責了革命者，可是許多人还是被他吸引住了。

这种吸引力，在1910年11月托尔斯泰死后特別显得厉害。資产階級的一切报纸一致发狂地頌揚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他本人，称他为“俄罗斯的太陽”、“朋友”、“兄弟”、“导师”、“殉道者”、“偉大的人物”等等。青年学生也被吸引住了。在托尔斯泰出殯的那一天，在彼得堡的各街道上举行游行，有几队50—100人的青年学生还高唱“永垂不朽”的挽歌，高呼“打倒死刑！”这是1905年革命以后的第一次游行，市长不得不采取戒备，在全城的各馬路上加派大队的步騎宪警巡邏。少数工人也参加了游行，但是在工人当中，托尔斯泰的学說毕竟沒有产生那种使小資产階級和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对他狂热崇拜的吸引力。

在我們协会的會員中，也有几个人把托尔斯泰当做生活的导师。他們証明了托尔斯泰学說的积极性，因为他反对沙皇政府和衙門似的教会，号召“道德的复兴”。

在“明星报”的最初几期中，这种“吸引力”已受到应有的申斥。当时还是“明星报”的合作者普列汉諾夫，在1910年12月16日写道：

“托尔斯泰的不幸，就在于他不能教导他自己生活，也不能教导別人生活。

托尔斯泰临终还是一个大贵族。这个大贵族早年养尊处优，享尽了他祖上的特权地位所遗留给他的物质财富。后来，为民造福的人们却在这方面影响了他，于是他便相信这些财富是从剥削人民而来的，是不道德的。他也觉悟到赋予他以生命的上帝的意志是禁止他剥削人民的。但他不明白仅仅不剥削人民是不够的，而是应该帮助大家建立这么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能使社会消灭阶级分化，从而也消灭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他的关于道德的学说完全是消极的：‘不要动怒。不要荒淫。不要咒人。不要斗争。这就是我所说的基督教教义的本质’。

同时这种消极的道德，与一些人人们所讲的那种‘首先要‘为民造福’的积极的道德学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如果甚至这些人现在也居然把托尔斯泰看做自己的导师，看做自己的良心，那么这只有一个解释：痛苦的生活环境动摇了他们对自己和对自已的学说的信心。这种事情当然是非常遗憾的。但我们希望不久又是另一种情形。”

列宁激烈地反对崇拜托尔斯泰主义。他在研究这个问题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以前，托尔斯泰学说的批判成分实际上有时候还能给人民中的某些阶层一些利益，纵然托尔斯泰主义具有反动的和空想的特点。比如说最近十年吧，这就不能够了，因为从80年代到上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向前迈进了不小的一步。而在我们今天，在上面所说的许多事变结束了‘东方的’不动性之后；在我们今天，当路标派的有意识的反动思想，这种在狭隘的阶级意义

上和自私自利的階級意義上的反動思想，在自由資產階級中間那樣廣泛傳播的時候，——這些思想甚至傳染了一部分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並造成了‘取消派’，——在我們今天，任何人如果能把托爾斯泰的學說理想化，想袒護或沖淡他的‘不抵抗主義’、他的向‘神’的呼喚、他的號召‘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他的‘良心論’和普遍的‘愛’的教義、他的禁欲主義和無為主義的說教等等，這些企圖都會發生最直接和最深刻的害處”。①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托爾斯泰學說的評價。

當然，不可否認，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嚮往於托爾斯泰的思想的。但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為人民幸福而鬥爭的戰士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杜勃羅留波夫和別林斯基等人的作品大大地吸引住了我們，他們都親身經歷過苦役、監禁、流放和流亡。

同時這樣的詩歌如普希金紀念十二月黨人的“致西伯利亞的囚徒”，也對青年起了革命的影響。雖然這些詩歌在“合法的”刊物上也登載過，但如果警官到了游藝晚會上，也是不允許朗誦這些詩歌的。

在常常朗誦的普希金的詩里，還有：

我坐在潮濕的牢獄的鐵柵邊：

一頭在束縛中飼養大了的年青的鷲鷹。

①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122頁。

而在尼基金的詩里則是：

在古老的坟堆上，在辽闊的草原上，
蹲着一只鏈子鎖着的鷺鷹。

人民英雄的歌手涅克拉索夫，在青年当中特別有信仰，他的“复仇和痛苦的繆斯”无情地抨击了貴族資產階級社会，号召人們进行反对压迫和专制的斗争。在他的詩歌中，流傳最广的是“鐵路”、“在俄罗斯誰能快乐而自由”、“俄罗斯女人”和其他許多詩。人們常常朗誦的是“在大門口的沉思”：

把这幢房子的名字告訴我，
这房子我从来没有見過。
不論你种田打粮的人在哪一方，
試問俄国的农民在哪儿誰不低声哀伤？

但是，这些作品只能激起了革命的热情，对于人們急待解决的問題却没有給一个答案，不能答复如何才能馬上推翻可恨的沙皇制度和半农奴制度。只有馬克思主义的書籍和我們当中参加了秘密組織而讀过这些書籍的人們，才能对這些問題作出解答，才能知道唯一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是要首先組織和团結工人階級来进行群众的革命斗争。布尔什維克的報紙“明星报”也帮助了工人們的馬克思主义思想意識的形成。

随着“明星报”的問世，革命的輿論开始报导第三届国家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情况。社会民主党代表在杜馬會議上所发表的演說，在資產階級的報紙上几乎是不登

的，即使登載，也只是一些“危險最小”的摘要，並且往往是歪曲了的。現在，宣傳工人代表團的活動及其發言的意義是特別大了。

根據 1907 年 6 月 3 日的法令而選舉出來的第三屆國家杜馬，明顯地帶着黑色百人團的性質。絕大多數代表是地主、貴族、大官僚和工商業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在 437 人中就占 310 人。在杜馬中的工人和手工業者總計不過 11 個人。

各黨派在杜馬的席位各有若干，也是明顯不過的。在全體代表中，最右的政黨（黑色百人團）和接近他們的民族黨有 171 人，十月黨——113 人，立憲民主黨——101 人，民主黨派（勞動黨和社會民主黨）——31 人，無黨派人士——27 人。因此，極右派、民族主義者和大地主、大工商業巨頭——十月黨人——的 284 個代表就形成杜馬的第一個人數最多的保皇黨，他們主張杜馬成為沙皇專制制度的助手。十月黨同俄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政黨——立憲民主黨——的 214 個代表形成第二個人數最多的保皇黨。

社會民主黨黨團最初在杜馬中有 18 人，以後有 3 人退出了這個黨團，而另外有一個人則因為政治案件被人控告而開除出杜馬。

黨團的大多數人是孟什維克，所以這就烙下了他們在杜馬活動的相應的印迹。黨團的主席是孟什維克契赫伊澤。孟什維克利用他們的多數，從機會主義的前提出發，認為黨團應該是杜馬中的民主反對派的領導者，而不是揭露沙皇

政府、杜馬及其右派的真面目。党团还犯了另外一些錯誤。

可是在地方上，特別是我們在彼得堡的人，当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互不干涉地进行各自的政治工作的时候，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虽然有重大的意見分歧，但还想在杜馬中結成一条統一戰綫。此外，进步的工人在这个时期也要求保持这种統一團結。

在反动年代成立的召回派使党团与党的領導机关相互之間的关系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糾紛。杜馬召开以后，情况甚至发展到这种程度：召回派同社会革命党人在工会中一起鼓动人們反对供給党团在質問时所需要的材料。

杜馬中占多数的右派保皇党方面对党团的深切仇視以及杜馬主席团方面的吹毛求疵，使党团的活动甚感困难。当然，社会民主党所提的質問都遭到了否决，而党团也不指望这些質問能够被占多数的保皇党通过，它所以提出这些質問是为了再一次地向劳动人民揭穿黑色百人团的杜馬的真相。例如，社会民主党党团对逮捕第二届国家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判决他們苦役的事屢次提出質問，但这种質問每次都遭到了黑色百人团和資产階級多数派的否决，但社会民主党每逢有适当的机会总是在自己的发言中一再提到沙皇政府可恶的专橫暴戾的行为。

1911年2月，社会民主党党团对1905年革命被鎮压后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区所进行的討伐提出了質問。这个質問揭露了沙皇走狗所导演的血流成河的駭人听聞的慘剧。立宪民主党沒有一个人在这个質問案上签名，而当这个提

案提出討論時，全體杜馬，除了社會民主黨和勞動黨以外，都投票反對。

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們往往因為發言義正辭嚴而幾次被剝奪參加杜馬會議的權利。有一次會議上，社會民主黨得到勞動黨的支持後，企圖談一下告密的問題，因為第二屆國家杜馬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就是有人告密才被判決苦役的。右派分子咆哮如雷，而主席則利用他的職權，起初不斷地打斷演說者的講話，以後就索性取消他的發言權。結果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兩個成員，包括契赫伊澤在內，被禁止出席好幾次的會議。停止出席的那些人被勒令發表聲明。但當契赫伊澤上了講台時，黑色百人團的代表雅庫波維奇神父竟大聲地叫他：“猴子！”契赫伊澤回答說：“神父，你叫我猴子，但你還是用金十字拴着的猴子哩，無恥！”但他的回答對黑色百人團的神父不發生作用，後者仍舊咆哮如雷。

杜馬中右派的叫囂與謾罵，不只是對社會民主黨而發，而且也用來對待其他的左派，特別是對勞動黨。有一次，勞動黨的托米洛夫對兵役制的草案發言。他說：“我們的士兵只學會一件事：只要在檢閱時整齊地走幾步和喊一聲‘您好’，就可使那些尸位素餐的人們心安理得了。但這種檢閱對誰都沒有好處，這種檢閱在戰時是派不來用場的。假定你們想打勝仗的話，那麼你們應該取消檢閱，那時好處可能多些。”^①右派首領普里什凱維奇立即站起來粗暴地叫

① “明星報”，1911年11月3日。

道：“把这个坏蛋赶出去，畜生。”但托米洛夫还是不慌不忙地講下去。普里什凱維奇呢，还在辱罵发言人，要求禁止他講話。普里什凱維奇的蛮橫无礼是史无先例的，結果引起了左派代表們的公憤。

对于我們在党組織內工作的人說，杜馬的几个政党——由公开支持专制政体的极右派：黑色百人团、民族党、十月党、进步党起，到自夸为自由主义反对党的立宪民主党止，他們的策略成为我們反对六三法令和杜馬本身的很好的宣傳資料。立宪民主党同一切右派集团一起投票贊成船只（包括軍艦在內）撥款，贊成政府預算，贊成增加軍隊和“軍事实力”，贊成政府貸款，贊成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等等。但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在答复社会民主党党团关于迫害工会組織的質問时却說，对这些組織的迫害和取締，只能在它們不參與政治并同社会民主党断絕关系的时候才可停止。这样一来，由于杜馬的贊許，搜查工会和工人文化教育团体以及逮捕积极分子的勾当便繼續进行了。在当年的“明星报”和以后的“真理报”上，登滿了警察襲击、搜查和逮捕的各种新聞。有时，资产阶级的报刊也登載这种新聞。

* * *

尽管黑暗反动，可是革命又开始春到人間了。在許多工业城市和区域，掀起了罢工运动的浪潮。工人群众开始表現积极，大家都感到工人运动的新的最高潮是为期不远的了。

我必須停止在教員訓練班的学习。一方面，这是因为

我不能按时交学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在各团体的工作几乎占去了我的全部业余时间。我同我的上级冲突后，不得不放弃互助贷金协会的工作。

我临时做了一个搬运枕木的短工，但大约两个月以后我就做了工商业代表大会常委会的统计员。在这里工作的，有许多孟什维克的知识分子，也有当时知名的保险学家卡·阿·考莫罗夫斯基。他用丹斯基的笔名所出版的两卷“工人的保险”，是1912—1913年推行保险运动时期的有价值的参考书。我的工作是把代表大会常委会发给各工业企业所填写的调查表收回来加以整理和分类，以便编纂专门的统计表册。

我没有同“教协”脱离关系，依然在我們組織的办事员工会当理事会理事和杂志的编辑委员。当时工会发展的迅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工会成立了几个月就已有近200个会员了。在工会理事会下设立了几个委员会，举办各种讲座和为工会募集资金的晚会。我们利用从会员当中征集来的书籍以及用会费和晚会门票收入所购买的许多新书，成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图书馆。

工会会员继续增加。但积极的布尔什维克工作者很少。在我们党的小组中有伊·阿·阿库洛夫、阿·马·班德尔、彼·伊·巴兰诺夫、维尔皮茨基、我、还有另外一两个同志。孟什维克欺我们人少和办事员政治上的落后，抢上了领导岗位。

起初，我们与孟什维克之间相处得比较“和睦”，但不

久就开始尖锐化了，最后不论在小会和大会上没有不争吵得面红耳赤的。孟什维克极不满意的，是说我们企图利用工会为党的秘密小组而工作。他们声称，我们进行的革命工作使工会放松了它的直接任务，使警察对工会猜疑起来了。

照孟什维克的意见，工会应当是不问政治，不问党派斗争的。他们说，工会的迫切任务是成立互助储金部，给失业工人找寻工作，成立训练班给会员补习职业教育，等等。至于与现存的君主政体进行的政治革命斗争，据说，这只是政党的事，并且是要在合法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句话，孟什维克高唱他们爱唱的老调：“打倒地下工作。”

下面的事实最好地说明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否定秘密工作的态度。我已经说过，为了统一彼得堡各工会的行动，成立了秘密的工会总办事处。在理事会的秘密会议上，我们提议我们的工会派代表参加总办事处的工作。孟什维克取消派却反对这样做，但因多数人赞成我们，所以他们就没参加选举。我们总办事处的党组推举和批准我为候选人。但取消派气势汹汹地证明说：工会派代表到总办事处工作，就是把工会同当时存在的地下组织联在一起，就有可能使暗探局认为我们“政治上不可靠”。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决议做去，所以我就开始到总办事处去工作了。

到总办事处工作的一共有七个人，因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若干工会没有派出自己的代表。当时在总办事处中的几个人是：鲍利斯·伊万诺夫——代表面包工人，若尔涅罗

維奇——代表鋸木工人，列伯节夫——代表紡織工人，阿·考尔舍娃和阿·尼基弗罗娃——代表“真理报”，还有在几个工会担任法律顧問的拉普欽斯基和我。

因为上述几个工会派到总办事处去的所有代表都是布尔什維克，所以在討論問題时用不着化很多時間。不論对什么問題：工会出版的杂志的傾向性也好，給圖書館選購圖書也好，在工会會員中做报告或組織討論也好，討論党的宣傳鼓动工作也好，討論某一个企业是否适宜于罢工或討論选拔一些人去执行一些具体的決議也好，所有这些問題的解决和执行都在有利于工会加强政治活动和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解决了。总办事处在它存立的期間，領導了彼得堡工厂的好几次罢工。

为了使总办事处能够开会，有时必須一个一个偷偷地跑到离城很远的奥哈特的黑河对岸，在林子里开会，在林子里解决我們工作中的問題。会后便雇船过河，趁天剛亮的时候装做散步的样子一道进城。在大家兴高采烈有說有笑的当儿，渡船迅速地在平滑如鏡的河面划过。进城后，大家为了尽量不引起暗探的注意，赶快分散到空曠的街道上。

1911年年底，同志們提議要我到工人的文教团体教育社去工作。我同意了。这个团体主要是为納尔維区的工人服务的，其中包括普梯洛夫厂的工人。該区工人的业余活动能否活跃起来，就要看教育社工作得怎样。

教育社的社址設在里日斯克大街60号，它占着一間偏僻的小房子，要从院子里爬上一个黑洞洞的樓梯才能进屋

子。这时教育社因为没有积极的工作者，所以工作没有什么生气，几个委员会没有进行工作，而图书馆的工作也搞得非常凌乱。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委托我首先整理书籍，所以我就和几个同志把书籍加以整理、分类并编了一个图书目录。

教育社设立了几个委员会，常常举行講演会和晚会。工作慢慢活跃起来了。我们决定把社址迁到靠近普梯洛夫厂和其他许多工厂的纳尔维大街。不久社员增加到500人。我们很高兴。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知识分子，甚至无政府主义者都觉得有“工作”的地盘了，于是开始混入教育社。在报告和講演有关革命运动的问题时，在各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我们布尔什维克小组常常是胜利的。通常，工人们大多赞成我们的提议，打消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提案。

但随着工作的开展，警察的搜捕也就厉害起来了。搜捕的原因，据事后了解，是奸细的告密。许多半公开和被人盯梢的同志，有时只能侥幸地没有被捕。暗探常常无耻地在教育社房子旁边的街道上守候着。

有一次不知怎么，有一个暗探盯上了我们的两个同志——彼得堡大学的学生。这两个同志住的很远，住在彼得堡那面。起初他们走直路，但快到彼得堡那面时，便开始绕小胡同和能通行的院子走了。暗探也紧紧不舍地跟在他们后面。大约是夜里一点钟吧，四周静悄悄地没有一个行人。当学生们走进了一条顶黑顶冷落的胡同时，突然站住了。这

个暗探几乎撞到他們当中的一个人身上。不能再迟疑了。于是他們就一齐动手，在暗探头上打了几拳，把他打倒了，把他的嘴塞起来了，他們狠狠地揍了他一頓，才很快地躲开。

对工人組織的迫害凶起来了。最初我們还想避免在社里开政治性的大会，但这种會議是很需要的，不开毕竟是不行的。这是大家都明白的。因为 1911 年已显示出了工人运动发展和活跃的气象。罢工运动蓬勃地扩展起来了。因經濟要求而发生的罢工，多半带着进攻的性質，所以結果是工人获得部分胜利或全部胜利。

如果注意一下那时所公布的几年来的罢工統計数字（当然这数字是很不完全的），那么就可以看出罢工斗争是怎样迅速地日漸增多了。举例來說，在工厂檢察局管轄的企业中，除了铁路工人、矿业工人、电車工人和其他几种工人而外，在 1909 年罢工 340 次，参加罢工的工人有 64,166 人；1910 年罢工次数减少到 222 次，参加者也减少到 46,623 人。但到 1911 年，罢工次数增加到 446 次，参加罢工的工人增加到 105,110 人。与 1910 年相比，1911 年的罢工运动增加了一倍多。

1912 年 1 月，我們党在布拉格召开的全俄代表會議指出，俄国的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代表會議的決議指出，必須在党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八小时工作制和沒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下进行和扩大政治鼓动，全面支持群众所发动的运动并加以扩大。

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唯一敢于把用革命手段将俄国改造为民主共和国这个迫切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政党。所以，它已开始引起所有想把祖国从三百年来的沙皇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国家的人们的注意，是不足为奇的了。

大家都看出，1912年将是革命运动新的高涨的一年，工人群众与专制制度决战的时候已不远了。

三 連納慘案和彼得堡对它的响应

1912年4月6—7两日，在彼得堡的工会和工人协会里盛傳着沙皇政府下令枪杀西伯利亚工人群众的消息。虽然可靠的消息还没收到，但这些消息已在工人当中造成了相当紧张的状态。

4月8日，“明星报”上第一次登出了关于沙皇政府滔天罪恶的消息。在最醒目的地方，在社論的上端，用黑粗綫排了一个志哀的框子，其中写着：

在連納金矿

打死 270 人

打伤 250 人

在題为“文明的手段”的社論中說：“在俄国工人运动的一部凄惨的历史上，充满了毫无人性而且是蓄意暴虐无道的罪行，把人命当作儿戏，用血手写下了血淋淋的一頁：为夸耀資本，为維護政府的尊严起見，竟枪杀了連納金礦的一群善良的工人。

打死 270 人，打伤 250 人！

死者的热血不复沸騰，伤者的痛苦不能減輕，殘廢者的

創傷不能治好。但冷靜的頭腦應該說冷靜的話，以便死者的血沒有白流，而是對偉大的工人解放事業有所貢獻。必須使連納的血的悲劇得到適當的處理，必須調查肇禍的主要原因，必須指出鐵的邏輯所暗示的那些結論……。‘死者既不需要挽歌，也不需要眼淚！’追悼連納烈士的最好辦法，莫過於俄國無產階級進行堅決的、自覺的、有計劃的組織工作來爭取這麼一個條件：使屠殺成為徒勞無益和不可能的事”。

在第二篇以“血的恐怖”為標題的社論中最後這樣說：“誰……要是想反抗流血那天的恐怖行為，誰就應該為國家的完全的民主制度而鬥爭。這就是一切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唯一正確的行動路線。”

“明星報”因為在當時的形勢下發表了這樣大胆激烈的文章而被沒收了，但是這几期當中的一部分還是從印刷所里運出去散發了。對連納慘案保持沉默的資產階級報紙，後來也不得不得對這件事登載了一些簡短的報導。

連納槍殺案的消息，使俄國的無產階級義憤填膺。“明星報”編輯部收到了來自俄國各地工人組織表示抗議的決議書。報紙上新辟了一個專欄——“連納槍殺案”。決議書多得無法在報紙全部登載，只好登出一些摘要。

當時在“明星報”編輯部工作的莫·斯·奧爾敏斯基後來回憶起來說：“最初，決議書都登出來了，但以後就只能把他們列舉一下或摘要刊載。同時還必須非常注意書報檢查員的要求，把最露骨的句子刪去。但是在‘明星報’的第33

期上还是忘了删掉疏浚机修理厂在決議書上所写的这么一句话：‘我們号召大家……拿起武器来坚决地宣布我們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我們发现这句话的时候，这一期报纸已有一半拿出印刷所了。号召‘拿起武器’必然要遭到政府方面非常严厉的迫害。但检查員却草草地检查了一下，把这句话忽略过去了。一般說来，連納事件发生时，彼得堡居民的心里深深地回忆起了1905年秋天革命的那些日子。”

“明星报”把追悼連納金鑛事件的文章和通訊繼續登載了很久。甚至也登出几首詩歌。其中有一首笔名为“工人”的歌子是这么說的：

在連納

高高的山头屹立在渺无人烟的沉默之中，
黯淡、凄零而又沉慟；
他們的装束永远伤心严肃，
表明石头滿腹的忧愁。
春风吹来，告訴他一件新聞，
在那遙远的西伯利亚边境。
无辜的鮮血汇成河流，
原始森林里阴风颼颼！
春风对他說，工人为爭取人权，
牺牲在遙远的西伯利亚荒原！
他們为富人淘金开鑛，
自己只落得一个死亡！

4月11日，国家杜馬討論了社会民主党党团所提出的

关于連納慘案的質問。內务部长馬卡罗夫出来答复。他在国家杜馬右派的掌声中宣称：“从前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这个回答象閃电一样迅速傳遍了全俄国。工人极为憤慨。开始了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运动的怒潮席卷了俄国的各个城市和工业区。俄国遭受了許多年反动的折磨后，又迎接1905年以后无产階級群众革命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了。

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政党必須出版工人日报。这一点工人自己早已在写給“明星报”編輯部的信中說过了。4月10日，在“明星报”上登出了工人日报“真理报”从4月15日起出版的启事。

“真理报”第一期在1912年4月22日出版了。从这一天起“明星报”停刊。“真理报”是靠俄国各地工人的捐款而創办的。布尔什維克的“真理报”的思想鼓舞者和組織者是列宁。

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为出版工人日报的問題爭論了很久。孟什維克主張工人日报成为“无党派”的报纸。这种“无党派”的报纸所以合乎他們的口味，是因为他們能够把取消派的观点偷运到这种报纸上去。布尔什維克严辞痛斥了这种观点，認為工人报纸不可能是无党派的和政治上没有主見的，因为工人應該把报纸看做自己的领导者，而领导者則應該指示斗争的目标和手段。“明星报”开始登出了为工人日报募捐的号召。孟什維克希望用“无党派的”思想迷惑工人，所以他們也号召工人把捐款交到孟什維克的周报“生活事业”編輯部来发行无党派的报纸。但孟什維克錯了，

因为“无党派的”思想不能引誘工人，結果孟什維克收到的捐款与布尔什維克所收到的捐款比較起来，少得可怜。

孟什維克取消派失敗后，即企图掀起一个把初出版的“真理报”放在工会和文化教育协会監督之下的运动。他們想用这种手段把报纸抓到他們的手里。但“真理报”回答他們說，对政治报纸的監督只能由政治組織(指政党)来負責。

在“真理报”創刊号的社論“到分界綫了”中說：“我們的报纸是在这么一天出版的，这一天可以公正地說，是把俄国工人运动划分为两个时期的一个分界綫……。

似乎是沒有出路了。牆在前面擋着，面对着牆壁束手无策。只有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对自己才有信心……

然而，在1912年4月在牆上冲破了一个缺口。当然，是无产者的两只結实的手冲破的。”

“真理报”同“明星报”一样，不得不經常迁就檢查条例，使自己的口气“和緩”一些，但是这并未使它不經常遭到罰款或沒收。

“真理报”出版以后不久，孟什維克取消派也开始出版他們的“光綫日报”。这样一来，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就在广大群众面前、在公开的报纸上繼續下去了。

四 1912年彼得堡工人的五一示威游行

連納慘案使工人階級又一次痛切地感到經濟改善的斗争是与爭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风起云涌的运动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性质。我們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維克小組和委员会的积极工作也在这方面起了推动作用。

但我們党組織的屢遭破坏和党员的經常被捕，妨碍了革命工作的开展。往往地方党組織沒有任何领导。所以他們常常接不到“上級的”某些指示。一切工作都决定于地方的积极性。情况往往要求在組織和政治方面采取独立的行动。如果这种行动发现錯誤，也要在工作过程和进行中加以消灭。

那时我除了为几个工錢白天需要在机关工作外，仍然担任着办事員工会理事和杂志編委的工作，担任着彼得堡秘密工会总办事处的代表和納尔維区工人文化教育协会教育社的理事。我把极大部分時間用在教育社的工作中。我們把教育社内的党小組于1912年年初改組为納尔維区的党委会。参加党小組和后来的党委的，除我以外，还有本区几个企业的几个男女工人：卡·列麦尔、普·普列娃雅等，总計有七、八个人。当然，改組党小組为党委会的事，我們沒有征求过別人的同意，而且事实上当时也沒有一个可以

征詢意見的人。

五一快到了，要準備五一示威遊行，就必須採取一系列的組織措施。但當時彼得堡委員會的成員已被逮捕，新的委員會尚未建立。負責籌備五一示威遊行的是社會民主黨的個別小組。各區成立了五一籌備委員會（當然是秘密的），參加這個籌備會的有我們秘密的工會總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們。對布爾什維克組織和小組的要求，是要他們來領導工人在反動年代以後的這個第一次的五一示威遊行，並在我們黨提出的口號下來進行。

內務部和警察廳鑒於五一的到來，預先在4月6日就向各省省長、各市市長、各憲兵隊和暗探機關發出秘密電報，要求他們在五一快到的時候特別注意工人的情緒，並將已發生的一切風潮及其原因立即報告警察廳。

在彼得堡，在五一的前幾天，搜查和逮捕就加強起來了。但我們還是準備了五一示威遊行的事宜。我們按區域在若干工會及工人文教協會事先分別舉行了秘密會議，在會議上討論了籌備五一罷工示威遊行的組織問題。

五一前的一星期，我們就先在科羅敏斯克區的一個半地下室的茶館里“預定了”一個“房間”，借茶會的名義召開了秘密會議，在會上討論了彼得堡工人五一示威遊行的問題。這次會議的7個參加者之中也有我在內。

會議按照秘密集會的一切規矩來組織。在茶室的進口處通常總是擠着許多人，所以我們也派一個同志混在裡面。我現在不記得他拿着一個怎樣特別的標志，但不是上衣袋

子里高高凸出一条手帕，就是挂着一条領带。跑来开会的人相信这个人正是他要找的人以后，就趁别人不注意的当儿走到他跟前說一个暗号。答話的人也就趁机会告訴他怎样进“房間”里去。在“房間”門口，放着一張小桌子，旁边坐着另外一个喝茶的同志，来开会的人也向他說个暗号以后，就进去开会了。通常在这种茶館里，晚間永远是人多嘈杂的，而这就便于我們的这种“行动”。

我們的會議名为“圣彼得堡一切有組織的工人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社会民主党市中心小組、社会民主党彼得堡工人小組、社会民主党統一小組以及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組等組織的代表。五一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也出席了。會議的目的是討論号召彼得堡工人宣布五一总罢工和到街上举行示威游行的傳单。由于准备得特別秘密，沒有一个奸細或暗探发觉这个會議。會議開的时间很短。大家听了事先起草好的傳单的底稿，提了几个修改意見后，就很快散会了。

离开五一沒有几天了，大家都为了印制傳单而忙着。德·伊·格拉斯金和另外一个叫做特洛菲姆的同志負責与加耶夫印刷厂的布尔什維克工人联系。三天以后，几包傳单已經印好和包好了，都送到了彼得堡那面私人开业的維茨霍夫斯基医师^①家里。維茨霍夫斯基的房子是适宜于寄存傳单的，因为装成病人到他那里去不会有人怀疑。从維茨霍

① 維茨霍夫斯基是布尔什維克党的积极工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前綫陣亡。

夫斯基的房子里把傳单一包一包地轉送到各区和各工人組織。这样就出現了列宁称为俄国工人运动史上和我們党史上最重要文件的1912年五一傳单^①。傳单上是这样写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告彼得堡工人書。

同志們！五一快到了。这是俄国无产階級再次檢閱自己力量的一天，是俄国无产階級向敌人挑战，向革命的全俄国、农民和青年学生发出兄弟号召的一天。

同志們！一年来罢工运动的怒潮以及最初听到連納屠杀消息后由于义憤填膺而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吼声表明，俄国工人同从前一样，又勇敢起来，强壮起来了，又准备作无情的、最后的斗争了。

同志們！五月一日，这是革命运动的日子。大家都要从工厂走出来，在全世界面前再次宣布我們的正义要求。讓立宪會議、八小时工作制和沒收地主土地成为我們的口号吧。早晨到工厂后不要做工。各工厂召开群众大会，把我們的要求作为決議通过吧。

現决定白天两点到三点鐘在涅夫斯基大街的阿尼契科夫桥和喀山广场之間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

同志們，請記住下面几点：

一、被武力驅散的人們要再接再厉地重新打进涅夫斯

^① 見“列宁全集”，第18卷，俄文版，第93頁。

基大街，尽量不要离开。

二、要重新集合到紧密团结的队伍中来，要高举我們的紅旗。你們身边是沒有武器的。

打倒沙皇政府！

打倒六三专制宪法！

民主共和国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圣彼得堡一切有組織的工人代表會議。

社会民主党統一小組。

社会民主党市中心小組。

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組。

社会民主党圣彼得堡工人小組。

五一筹备委员会代表。”^①

我們大家在茶館的“房間”里在短時間的會議上集体編写的这个簡短的傳单，在組織 1912 年五一工人群众示威游行中有极大的意义。稍后，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上提到这个傳单时写道：

“傳单本身反映出社会民主党在首都相当混乱的情形，因为在宣言上签署的不是彼得堡委员会，而是社会民主党个别的小組，甚至还有社会革命党的一个工人小組。我們党在俄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况正是如此，领导的委员会和中心机关的成員虽然經常被捕，但是幸賴各种工厂的、工会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1912年6月4日。

的、区的和分区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的存在，即那些永远使自由主义者和取消派憎恨的‘支部’的存在，他们也就又经常恢复起来了……。

彼得堡委员会成员被捕后，登上舞台的必然是由于警察的意志而摆脱憎恨取消派的‘领导中心’的那些支部，正因为如此，才使上述的传单具有一种特别典型的性质和特别重大的意义。由于在每个革命者眼前呈现出了这么一个悲惨的景象，支部的独立生活就表现出来了。支部不得不在警察拼命的追逐下——在五一前简直是发疯了——仓促集合自己的力量，建立联系，恢复‘地下的工作’……。

他们很明白，无产阶级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中联合起来的意义，因此把社会革命党的工人也吸收进来了……。”

列宁继续写道：“我们从这个富有教育意义的文件中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所提出的一切口号都被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接受了，并且留下了俄国新的革命的第一步脚印。”①

五一前夜，传单已散发到了彼得堡的各个工厂。

工会内的几个党小组也发了传单。但这些传单份数很少，只有几十份，而且也只是给本行业的工人看的。

五月一日是阴天，差不多同秋天一样，但这并未阻挡住彼得堡的工人。风平浪静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据市政府办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俄文版，第93、94、95页。

公厅的官方消息，是日中午 12 点钟以前，彼得堡已经有 10 万工人罢工。事实上，罢工人数远远超过此数。

从黎明起，无数工人小组和青年学生就开始不断地冒着不息的倾盆大雨来到了市中心的大街上，尤其是涅夫斯基大街。我同另外几个参加筹备五一示威的同志，也从早晨就到了涅夫斯基大街的阿尼契科夫桥和喀山广场之间，站在在这里集合的工人小组中间。

沙皇政府看到示威游行要开始了，于是惊慌失措地从大清早就把许多队警察和宪兵集结在涅夫斯基大街的各个十字路口上，而应付激变的预备队则埋伏在一些房子的院子里。

上午十点钟快到了，在涅夫斯基大街上原先分开站的工人小组，开始合并成几个大队。到处都飘扬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这时，就在这种地方出现了一种屡见不鲜的场面：骑马的警察和宪兵冲到人群当中来赶散他们，逮捕他们。

在城里的每一个地方，特别是在工人区和中心街道上，也是聚集着警察、宪兵的步兵大队和骑兵大队。为了使示威游行的人们不能汇合起来，在街道的十字路口，还安上了许多警察岗位，把工人们撵到中间的街道上。在几个地方，比如在石岛大街，就发生了与警察的严重冲突。

示威游行的大队拿着红旗，喊着口号，唱着革命歌曲，沿着彼得堡的街道前进。他们在一个地方被警察驱散了，立刻又到另外一个地方集合，所以游行不但继续下去，而且还

不断地卷入了許多新的群众。一部分示威游行的人穿过里弄到意大利街；而另一部分則分成两队，一队到涅夫斯基大街和叶卡德琳娜运河的拐角上集合，另一队到米海伊洛夫斯基街集合。

不久，三队示威游行的人分别从叶卡德琳娜运河、米海伊洛夫斯基街和圣叶卡德琳娜教堂的院子走进意大利街后，就在米海伊洛夫斯基广场上会师，并整队在意大利街游行，向卡拉万諾伊方面前进。当游行队伍走到司法部的大厦前时，即高举起了“打倒专制和沙皇！”的紅旗，同时也就在这个当儿高唱起“起来，起来，做工的人們！”

下午4点鐘，由450个到500个工人和学生組成的游行队伍从苏涅罗夫广场向特罗伊茨克桥进发。示威游行的人們唱着“起来，起来，做工的人們！”高举着三面紅旗向彼得堡那面挺进。

示威游行带着鮮明的政治性质。它的主要的口号就是“打倒专制政体！”

工人和青年学生的游行一直繼續到天黑。警察和宪兵用馬鞭和馬刀乱打游行的人。当天大肆逮捕。五一以后，市长下令发給全体步騎警察官兵每人15卢布，以奖励他們对工人五一示威游行的镇压。

1912年5月1日，在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城市及工业地区也发生了罢工。这一天，全国罢工的工人在30万以上。在这一天，俄国无产阶级显示了自己的政治覺悟和团结。甚至黑色百人团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認示威游行是成功的。从

資產階級報紙上所登的文章，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對工人的五一示威遊行已心驚膽戰到了極點，深怕再會重演。

僑居國外的列寧，警覺地注視着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他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評論俄國無產階級的五一示威遊行時寫道：

“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已經發展到很高的階段。在1905年，它是由群眾的罷工和加邦發動的請願開始的，但在1912年，儘管我們黨的組織被警察破壞，但運動是由群眾罷工和高舉共和旗幟開始了！個別‘支部’和零散的工人‘小組’不管處境怎樣嚴重和困難，還是做了他們應該做的事。無產階級成立了自己的‘五月委員會’，拿着革命的綱領起來鬥爭，這個綱領是注定要把全人類從僱傭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的那個毫無愧色的階級的綱領。”^①

工人階級同專制制度和資產階級鬥爭的新階段來臨了。

資本家也向工人宣戰了。彼得堡的廠主協會向它的全體會員提出了一個秘密建議，主張不僅不發給工人罷工期間的工資，而且還要對罷工的工人處以罰金。理由是：如果罷工期間工資照付，就會“使工人當中的騷亂更加猖獗，同時也會給將來開一個不良的先例”。不久以後，彼得堡的廠主協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決不減少任何工作時間，包括夜工在內；罷工期間不付工資；不承認工人的任何代表和負責

① “列寧全集”，第18卷，俄文版，第96頁。

人，不論任何問題，不許工会和工厂外面的一般組織出来調停和干涉；各厂不得依照已經公布的罢工工人名单从正在罢工的工厂中招雇工人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决定并未吓倒工人，而是成为工业企业中新的罢工的原因。

无产阶级的团结也随着革命运动增强了。在“真理报”上不断地刊载着編輯部收到新的捐款后的賬目，这些捐款，是工人在他們企业中为罢工工人捐助的。

沙皇政府加紧迫害工人及其組織。成千的暗探分头在城里的街道上到处打听和逮捕“暴动分子”。有些奸細打进了地下組織，把它們的秘密泄露給暗探机关和宪兵司令部。政治案件相繼发生，参預者都被沙皇法庭判处徒刑、苦役和死刑。

革命运动波及到海陆軍中了，虽然影响还不大。在近一年来，为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解送到法庭的已有波罗的海艦队和黑海艦队的几十个水兵。沙皇政府殘酷地惩治他們，其中許多人被判处絞刑。不久以后，駐在塔什干的工兵团爆发了起义，但很快就被鎮压下去；15个人被絞死，112个人被处以流刑苦役，97个人被送到犯人劳动大队。报纸上充满了政治犯遭受可怕虐待的消息。

为了抗議沙皇政府惨杀水兵和侮辱监牢中的犯人，掀起了政治罢工的怒潮，結果沙皇政府被迫把若干水兵的死刑改为苦役。

尽管五一以前逮捕了彼得堡委员会的成員，我們党組織的积极活动还是在繼續下去。但由于逮捕的事层出不穷，

因此不論彼得堡委員會或我黨在俄國的其他一些組織，都不能視為長期固定的組織。這時黨組織同區委和支部還沒有完全建立起嚴密的聯絡網。如果有時費盡心計在某一區域建立了這種聯繫，那麼，在“司空見慣”的逮捕之後，原先已經建立起來的聯絡網和聯繫又被破壞了。所以往往是由失掉聯繫的同志成立一些小組來組織黨的工作。^①

當時彼得堡的孟什維克取消派還繼續存在着所謂主動小組。這個主動小組打着“積聚無產階級力量”的幌子千方百計地阻礙罷工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所以在事實上它是助長了專制制度的高壓政策。

因為這個時候新的彼得堡委員會尚未最後建立，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建立我黨彼得堡中心的問題。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第四屆國家杜馬的選舉運動開始了。必須為實

① 許多人對這個問題有興趣，問在革命以前，黨員有沒有黨證，是不是也進行黨員登記。

不只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甚至在整個沙皇時代，一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以前，是不可能對黨員的人數作比較精確的統計的。黨處在地下的狀態中，同時由於積極的工作人員常遭逮捕，因此地方組織的人員常常變動。根據沙皇的法律，凡加入社會民主黨的人，均被褫奪一切公權，判處三年苦役，並於苦役期滿以後，即終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不經過苦役而褫奪一切公權後就被流放了。由於這種情況，所以足資證明入黨的文件——黨證，是沒有的。黨員和各個組織的任何名冊也同樣沒有，因為分發黨證和編制名冊都是笨拙地違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則。

現我們的基本要求而進行組織工作和開展宣傳。根據布爾什維克——區的黨組織和工會的工作人員——的倡儀，成立了布爾什維克的彼得堡中心小組。

但這個小組並非始終保持着這個名稱，例如同是這個小組印發的某些傳單，却用過以下幾種署名：“社會民主黨聖彼得堡主動小組”或“社會民主黨聖彼得堡工會工作人員小組”。我記不得為什麼要這樣做，我想准是為了保守秘密吧。這個小組基本上是由積極組織彼得堡五一示威游行的同志和工會總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組成的。參加這個小組工作的工人是：拉茲日文、祖布科娃、格拉茲金、辦事員工會會員阿庫洛夫、工會總辦事處法律顧問拉普欽斯基、我和另外幾個同志。

小組是秘密成立的，工作是極秘密地進行的。傳單的印刷是由幾個只與組織的某幾個人取得聯系的同志進行的，而且任何人都不得曉得他們，他們也不曉得其他任何人。小組會議通常都是在各個區召開的，而且開的次數很少，只解決極重要的問題。

在我們小組存在的整個期間，用它的名義發了10種傳單。我們學會了很好地把這些傳單散發到彼得堡的工人中間去。這種工作同印制傳單一樣，是非常危險的，所以需要特別謹慎。有一次，我們的組織在瓦西里耶夫島召開秘密會議時，有人送來了幾包才印好的傳單，當然，這是違反保密原則的。但時間不允許我們爭論，也不允許追究犯錯誤的人。結果決定出席會議的每一個人都帶走一包傳單，在

第二天散发到各区的工厂中去。

我当时住在旧彼得戈甫大街。我从瓦西里耶夫島步行到沙道瓦雅街后，准备下一段路坐电車。天已晚了，在电車站上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人。我想抽一支烟。但我正从上衣的口袋里掏烟盒时，大衣領上的一个鈕扣突然掉了，于是十多份傳单就落到大街上。微风正要把它們吹到各方面去。离我不远站着一个人，幸而他什么也沒有发觉。我赶紧把正要飞散的傳单收拾起来，坐上开到站台的一輛电車走了。

但我的遭遇還沒完哩。我快走到我住的那幢房子时，远远地望到大門旁边站着一小队警察。我絲毫也不怀疑警察是到这里来搜查我的房子的，是在等看門的人开門的。为了躲避逮捕，我馬上跑到馬路对面向前走了几步。我走到拐灣的地方又往后看了一看，却看見有一輛电車在我住的那幢房子跟前停下了，警察們也上車去了。这样我才知道，看样子，他們是派到叶卡德琳戈甫公园去捕人的，是在这里等候电車的。我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房子里的人們都睡了。我把傳单带到儲藏室，藏在木柴堆下面就去睡了。第二天我把一包傳单平平安安地送到了納尔維区，然后分成几小包交給几个同志立刻散发。

五 第四届国家杜馬的选举。

11月15日的示威游行

第三届杜馬解散后很快就开始的第四届国家杜馬的竞选运动，差不多一直繼續到秋天。依照选举法，全俄国只有六个省——彼得格勒省、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叶卡德琳諾斯拉夫省、科斯特羅馬省和哈尔科夫省——得由工人选举团各选代表一名。

所有这6个省都选举布尔什維克为第四届国家杜馬的代表。

孟什維克——6个代表——是在小市民和小資产阶级的支持下在城市选民团中选出来的。

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彼得堡省的工人选民团中竞选，因为不論哪一个比孟什維克更右的政党都不敢輕易在工厂当中插手。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不論是在彼得堡城外森林中召开的秘密會議上，不論是在初选代表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选举代表的程序是：先由全体工人大会选举初选代表，次由初选代表选举复选人，而最后由复选人选举正式代表。选举的结果是：在初选代表大会上，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出的六个复选人中，有三个是孟什維克。关于誰的候选人應該当选为正式代表的问题，最

后只能在复选人的省代表选举大会上决定；在这次大会上投票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阿·耶·巴达耶夫获得了多数票。布尔什维克在其它五个工人选民团也获得了胜利。

在布尔什维克彼得堡中心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参加市第二选民团的竞选运动；参加第二选民团的有小商人、工业家、房客、店员和领有营业执照的手工业者，也有靠薪水或靠国家、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福利机关的津贴生活的人。立宪民主党的米留柯夫、罗基切夫和什加列夫经常由这个选民团选出，工商界的职员多半投票赞成他们。

社会民主党所以在这一选民团的竞选运动中提出候选人参加竞选，主要的目的是想在工商职员和小资产阶级中间进行宣传。但怎样在这个选民团的选民中进行宣传呢？当然，布尔什维克不能在公开的选民大会上当着警察和侦缉队、便衣侦探的面宣传自己的口号。必需要另想办法。决定发几千份传单，照工商业职员选民单上的住址把传单寄给他们。

我们买了许多信封，等把传单印好以后就由几个同志按地址寄出去。为了使同一笔迹的许多封信不使邮局怀疑起见，我们把几千封信分开投到全城的信箱里。

我们尽可能地吸收许多群众去参加立宪民主党和我们搞的选民大会，把这些大会的情形通知了工会和文化教育协会。

关于在市选民团提我们的候选人的问题是很困难的。

候选人要有相当的财产资格，年龄不能少于25岁，但这两个条件，我们许多工作人员连一个也够不上。同时为保密起见，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提名为候选人的。另一方面，候选人必须是有名望的人。

为了从立宪民主党手里拉走工商人员的票，我们打算提店员工会书记安托什金为候选人。但是在卡拉什尼考夫交易所大厅里召开的选举大会上，虽然有我们邀请来的许多观众，但绝大部分还是粮食商人和其他的商人，所以安托什金竞选不过立宪民主党的这些巨头们，如米留柯夫和罗基切夫。我们的其他候选人索柯洛夫、克列斯丁斯基和契赫伊泽也没当选，这几个候选人是我们同党中央的代表们开会后决定提出的。

第四届国家杜马定于1912年11月15日开幕。

为对6月3日的选举法和黑色百人团资产阶级的国家杜马表示抗议，为对沙皇政府的一切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表示抗议，曾经在布尔什维克彼得堡中心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于杜马开幕之日宣布罢工，并号召彼得堡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

关于在这一天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问题，在11月15日以前老早在彼得堡工人当中讨论过了。拥护我们党的人都为这次罢工示威展开了广泛的宣传。但孟什维克却又想利用一切办法来破坏我们计划中的罢工。彼得堡的侦探局也并没有睡着。他们得到我们准备示威游行的消息后，就周密地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破获示威游行的组织者。但

由于我們严守机密，偵探局找不到我們的綫索。

杜馬開幕前三天，我們发了傳单，在这个傳单上說到了沙皇政府的新陰謀，它又企图阻止工人推选自己的候选人到第四届国家杜馬中去，說到了它的新决定，它又要把在杜馬講坛上講話的人交付法庭。傳单中声称：

“工人群众不能够而且也不應該对这种藐視人权和摧殘人权的事情保持沉默。杜馬開幕的那一天——11月15日，他們應該集結队伍到街上去……

我們要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

我們要求用国家和厂主的錢来办理真正的国家保險，把这种保險普及到各种雇佣劳动当中！

讓这些要求成为国家杜馬中工人階級代表为人民的自由艰苦斗争的指針吧！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們在这些要求的周圍团结起来，动员党员群众为真正实现人民的代議制以及滿足工人階級和破产农民的一切社会經济要求而坚决斗争吧！

同志們！你們大家在11月15日一致停止工作吧！大家列成整齐严密的縱队，展开紅旗向塔甫里切斯克宮前进吧，提出要求和热烈抗議那种剝夺我們杜馬代表的言論自由的选举‘解說’吧。

打倒沙皇政府，打倒貴族地主和强盜資產階級！爭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万岁！……

八小时工作制万岁！……

沒收地主土地，把土地交給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①

傳單由我們社會民主黨聖彼得堡工會工作人員中心小組和彼得堡的另外兩個布爾什維克小組署名發出。大部分傳單在第四屆國家杜馬開幕前兩日已經散發到彼得堡的各工廠。此外還做了口頭的宣傳。

孟什維克作了反宣傳，企圖破壞彼得堡無產階級的示威遊行。但他們在一切工人區域中都碰了釘子。於是他們的聖彼得堡獨立小組就決定施展那種卑鄙無恥的伎倆。

11月13日孟什維克在“光綫報”第49期上提出了下列的“警告”：

“我們接到社會民主黨聖彼得堡獨立小組署名的一份通知工人的文件，小組通知工人們說，關於在國家杜馬開幕之日舉行罷工的消息完全是造謠。不論哪一個有權威的工人組織都不會做這種號召罷工的事。現在各處散佈的謠言，是別有用心的人企圖利用工人高漲的情緒。‘小組’堅決警告工人要提防這種到處流傳的荒誕無稽的消息。”

當我們讀了孟什維克報紙上的這種啟事後，我們痛恨的心情簡直難以形容。但孟什維克還不肯這樣來罷手反對示威遊行的勾當。翌日，11月14日，在“光綫報”上又發出了一個新的“警告”，其中說，據說在彼得堡工人當中流傳的號召11月15日罷工的宣言，“它的來源是不能不使人們懷

^① “1907—1917年彼得堡布爾什維克的傳單”，第2卷，1939年俄文本，第70頁。

疑的。”这个第二次的“警告”在結尾中說：“我們請大家注意昨天‘光綫報’上所登載的圣彼得堡獨立小組的警告，同时再一次地請彼得堡的工人不要响应輕举妄动的号召。”

孟什維克很清楚，他們在工人群众当中是沒有威信的，因而他們的“警告”也是收不到預期的效果的，于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企图愚弄剛来彼得堡开会的社会民主党出席第四届国家杜馬的代表。

他們大家几乎都是在杜馬開幕以前才到彼得堡的，因此还不明白事情的經過。于是孟什維克就利用这种机会，主張社会民主党党团对这种預先計劃好的罢工示威用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登一辟謠的启事。

在11月14日的“光綫報”和11月15日的“真理報”上都用党团的名义登出了如下的启事：

“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馬党团接到一个消息，据說，在彼得堡各工厂已經散发了許多傳单，号召在11月15日国家杜馬開幕之日举行示威游行。現在，社会民主党党团認為必須声明的是，根据它現有的消息来看，上述傳单不是由社会民主党彼得堡的哪一个有权威的小組发的。”

党团的这个声明是考虑不周的，錯誤的，但錯誤是在于把它发表。但同时也要归罪于我們，因为如果我們能及时通知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們，想来孟什維克是得不到他們的支持的。

我們在筹备人的紧急會議上，決定坚决要求“光綫報”編輯部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否認他們登的启事，同时限“光綫

报”立刻答应，而对党团则要求他们在杜馬开幕以后答应。

为了同“光綫报”編輯部談判，同志们推派了我。我到編輯部后，在那里突然碰到了当时有名的孟什維克叶紹夫。我代表組織严重地要求他迅速在报上否認他們的卑鄙言論。我非常激动，右手插在口袋里。这可能使叶紹夫認為我是带着武器的。叶紹夫听了我的头几句话已吓得臉色蒼白了，于是他就从座位上跳起来前言不搭后語地吞吞吐吐地說，明天他就在报上登好了，說完立刻从屋里跑出去了。結果，我等了他半天，什么也沒有得到，只得离开了編輯部。

第四届国家杜馬开幕前，我急得通夜沒有睡着。早晨剛剛天亮我就爬起来穿好衣服到了集合地点。到处显然都是非常活跃的气象。在城里的中心大街上，警察和宪兵来回巡邏着。

不到早上十点钟，在市中心，尤其是在国家杜馬开会的塔甫里切斯克宮的区域，已开始出现了許多队唱革命歌曲的工人。看到这种情形真令人喜欢，因为尽管孟什維克发表了內奸的言論，但彼得堡相当可觀的一部分工人还是罢工了，这不仅表現出了他們对杜馬的态度，而且也表現出了他們对整个6月3日法令的态度。从街上示威的人們当中可听到喊这种口号的声音：“打倒专制！”“打倒六月三日的杜馬！”

我和几个組織示威的同志不問戒备森严到什么程度，終于打进塔甫里切斯克宮里。这里，示威者分成几队集合

起来，高呼革命口号。騎馬的警察宪兵飞奔到各方面去驅逐人群。

但这时在塔甫里切斯克宮被选为杜馬主席的地主罗将考还大言不慚地表示在杜馬占多数的保皇党对皇上忠心耿耿哩。黑色百人团馬尔考夫第二高呼：“专制制度万岁！”“烏拉！”立宪民主党的米留考夫紧握着十月党人罗将考的手，庆賀他当选为主席。

国家杜馬开幕那天的罢工运动規模很大，如果不是孟什維克挑撥离間的話，它可能汇合成一个总罢工。

根据报纸上所公布的官方消息，那天在彼得堡罢工的达三万人；事实上罢工的人数比这多得多。

那天的罢工示威喊着布尔什維克的口号，再次証明工人群众是急于想推翻可憎的专制制度的。

参加罢工最踊跃的是維堡区。这里罢工的工厂有：五金工厂、奥黑丁斯克紡織厂、“涅夫卡”厂、帕尔維安尼、厄利克索、列斯涅尔、海尔加德、切舍尔、渥洛宁以及其他許多企业。“第尔瑪斯公司”停工。在彼得堡那面罢工的有：維佛尔司厂、海司列尔厂、卡尼和克洛尼厂以及几个大印刷厂的工人。奥斯波夫皮革厂、考里比电机厂的工人也响应罢工的工厂。在沃斯涅先斯克大街，有国际臥車公司的工厂、彼得罗夫皮鞋厂、“舒刻尔特公司”的工厂。在旧村，甘茨凱維奇和謝苗諾夫鋸木厂的工人罢工。

这一天，在莫斯科的工业区和俄国其他大工业中心也都罢工了。根据莫斯科工厂主协会的調查，在杜馬开幕之

日，即11月15日，在莫斯科有十八万八千人罢工。警察拔出軍刀驅逐示威游行着，并发生了逮捕和搜查的事件。偵探非常积极地偵緝布尔什維克。

孟什維克对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否定态度，在孟什維克“光綫报”的一篇文章中表现的非常露骨，他們在这篇文章中竟把工人的罢工斗争說成是“罢工迷”和“政治力量的浪费”。因此饶有兴味的事情是，应该指出孟什維克和黑色百人团对这一問題的臭味相投的观点。黑色百人团的“新时代”在一篇文章中把工人的政治示威叫做“无謂的举动”，說无产阶级把自己的物质精神力量消耗了。这个事实再次說明孟什維克是多么深入地陷在机会主义的泥潭了，多么反对采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了。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說到孟什維克取消派对11月15日有組織的行动所发出的叫囂时写道：“常常罢工能使工人厌倦。那时就一定要号召举行为时极短的罢工和极有准备的示威。但11月15日的事件恰恰表明，示威运动是迈进了新的一步！。

你們取消派不是虛心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因為你們把11月15日事件的意義很明顯地估計錯了），而是抱着下流的自由主義者的態度說革命宣言是‘政治上的無知’、你們是重彈自由主義政治的濫調了！”

列宁繼續說：“現在請工人們評斷的是當革命的罢工和示威已經到了爆發和發展的時刻，而取消派還出來反對它，還在合法的報紙上大罵秘密的宣言，試問他們所說的與黨

‘團結’的花言巧語有什么价值呢!!”①

列宁在进一步說到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对11月15日的示威所持的立場时写道：“示威的日子选的是很好的！无产阶级天才出众，善于把黑色‘国会’的开幕典礼同首都馬路上的紅旗对立和对照一下！……

自由主义取消派的‘光綫报’‘警告’不要参加这次示威游行，这倒真不愧为工人事业的叛徒。

但社会民主党党团怎能也来‘警告’呢？它怎能墮落到立宪民主党的水平而离工人的水平很远呢？人們怎能服从它的个别团员呢？它怎能干出这种可耻的事呢？……

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整个地犯了痛心的、惨痛的錯誤。”②

上述的事件过了几天以后，我們通知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馬的党团說，我們主張弄清楚已发生的誤会。談判的結果，党团同意召开一次會議来解决这个問題，在那次會議上邀請了布尔什維克彼得堡中心小組的代表們参加。

大家推举我和伊·阿·阿庫洛夫同党团談判。在討論这个問題的过程中，我們查明党团原来是被人迷惑住了，同时，党团的成員們，其中有以契赫伊澤为首的大多数孟什維克的代表也承認了他們这种作法的錯誤。孟什維克代表們所以承認錯誤，只能有一个解釋，就是他們根据策略的理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俄文版，第444—445頁。

② 同上書，第396—397頁。

由，認為不能在杜馬活動的一開始就和布尔什維克彼得堡的組織衝突。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打消誤會。

我們繼續主張黨團在報紙上否認他們的啟事。黨團的成員們反對，認為這樣做定會破壞他們在工人羣眾中的威信。問題一直討論到夜半的下三點鐘，但是還沒有做出任何一個決定。當時孟什維克提議選舉一個委員會來解決這個問題，同時選入這個委員會的完全是布尔什維克的代表。這樣我們就結束了與杜馬黨團的第一次會談。

因為在黨團住的那幢房子周圍經常站着偵探，所以我們的某一個同志就替我們在離房子很遠的地方先雇好了一輛馬車，然後請我們從一個“漆黑的”走廊當中走到房子外面坐馬車走了。

下一次與布尔什維克的代表會見時，我們當中不知是誰還堅決地要黨團在報上否認他們自己的啟事。對於這個要求，代表穆拉諾夫答道：“我們做了一件蠢事，在報上登出了這樣的啟事，但現在你又要叫我們犯第二個錯誤，因為倘若我們在報上否認，那麼除破壞黨團的威信外，我們是什麼也得不到的，反而使偵探從這件事情當中看出我們與秘密組織的聯繫。”

我們同意這種理由。後來從穆拉諾夫的一次私人談話中知道，布尔什維克的杜馬代表和“真理報”以及黨中央的代表都反對用黨團的名義發表這種聲明。同時，就在這次會議上，我們雙方同意把我們的布尔什維克彼得堡中心小組解散，第一，這是因為在既成事實面前，它不能夠用舊名義

繼續存在下去，第二，这是因为我們党的彼得堡委员会这时又开始建成并开始工作了。最后代表們約定他們到工人大会上演說时順便做一解釋，說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承認它的啟事是錯的。

11月15日的工人示威游行过去之后，偵探局和警察厅还对我們組織的参加者繼續枉費心机地調查了很久。但这次調查的結果是不大的。他們只肯定拉普青斯基是参加我們的組織的。拉普青斯基是真被捕了，但由于偵探局沒有可資起訴的証据，所以他只被放逐了事。

我們小組取消后，我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在納尔維区的文化教育协会“教育社”，这个协会到这个时候已展开了积极的活動，在工人当中已很聞名。在理事会的定期改选中我被选为教育社的主席。

1912年冬教育社大大地展开了工作。为使社会民主党第四届国家杜馬代表与彼得堡的工人接近，我們和其他的文化教育协会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給我們的會員做过几次报告和講演。由于这种关系，在这些工人組織的領導者之間常常发生爭执。显然，参加布尔什維克党的人們愿意請布尔什維克的代表来講演，反之，孟什維克則主張請他們的代表講演。但我們的协会“教育社”的領導权是操在布尔什維克手里，所以邀請代表的問題就不費唇舌順利地解决了。第一个到我們区里講演的是彼得罗夫斯基。講演会定在一个星期天举行，題目是“工人的保險”。会场挤滿了人。

六 1913年的五一示威游行。逮捕。监狱

1913年的春天到了。

这时我在建筑工程师协会工作。我的工作是在监督包工头，因为他们在接收供应商送来的建筑材料时往往和后者狼狈为奸，黑心地进行盗窃。在五月一日以前，我一共在那里工作了两星期，薪水在当时很多，每月150卢布。

在这一年中，工人在1月9日和連納慘案紀念日的罢工示威游行比前两年更带有战斗性质。这就预告五一运动的规模，一定要超过前一两年的运动规模。

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准备纪念自己节日的事，对暗探是秘密不了的，所以五一前夕可能发生大批的逮捕。这种灾祸也会落到我头上。

后来检查伪警察厅的档案时也证明，关于我可能被捕的危险不是无根据的。因为4月18日伪警察厅副厅长維沙里奧諾夫向彼得堡伪偵探局局长报告时，就已提到我是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組織中最努力的工作者之一。

只有暂时躲开彼得堡是能够避免被捕的。但我不愿意离开，所以我就决定在五一以前的几天离开我的住所，暂时不要身份证搬到巴兰諾夫的家里，因为巴兰諾夫同我都在办事員工会党小組內。

彼得·伊万諾維奇·巴兰諾夫那时帶着一个大家庭住在彼得堡市郊新村的一小幢木造房子里。他对同志們极表同情，富于感情。我在革命后遇到他时也是如此，虽然他那时已是一个大人物，苏联空軍的司令員，以后又是重工业人民委員部的副委員長。

为了筹备五一，我同巴兰諾夫通常在晚上很晚才一道回到新村，回来的时候，大家早已睡熟了。我們悄悄地脫了衣服，钻进被窩一霎眼便睡着了。

但五一终于来了。我同巴兰諾夫一大早就跑到示威游行的集合地点。这一天从清早起彼得堡就罢工了，据官方的統計，在25万人以上。

“真理报”的五一特刊洋溢着工人群众日益高漲的革命运动的战斗精神和他們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在“斗争的一年”一文中总结了1912年五月一日到1913年五月一日的工人的革命斗争。最后在文章中說：

“工人群众积极性的加强，他們觉悟程度的提高以及馬克思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組織在他們当中影响的增长，这些就是馬克思主义者一年来工作的主要成績。由于有工人階級的运动，俄国立刻起死回生了……資产階級的政党惊惶失色地談論起‘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机了’……所以工人階級在进入无产階級运动的新的一年的时候，必須要睜大眼睛展望到，未来是要他們受严重的考驗的，重大的任务是摆在他們面前的。社会各階級力量之間的斗争势必以更加尖銳的形式展开。”

五一这天，警察和宪兵大队在全城巡邏。在許多十字路口上，特別是在市中心，警察的崗位把工人們分“隔”在小胡同里，不許人們成群結队地在一起，不許发动示威游行。到处都发生了工人和警察的冲突。

尽管有警察的警备綫，罢工工人和青年学生还是分成小队和单个地逐渐深入市中心。中午不到，已經有許多由一二百人形成的小队伍，听到了革命歌声。騎馬的警察从这头飞奔到那头，拿着馬鞭去追赶示威的群众，但这些群众在一个地方被冲散后，立刻又到另一个地方集合起来。同时与1912年不同的地方是，今年的示威游行非常勇敢地去抵抗警察。但未发生枪杀示威游行者的事件。警察宪兵的这种遵命而行的“奴才”行动，可由这种事实來說明，就是政府感到工人充滿战斗精神，所以不敢使用武器，怕的是轉变为更尖銳的斗争形式。

在这一天，俄国的其他大工业中心也发生了罢工和示威游行。

約摸到午后三点鐘，在涅夫斯基大街上示威游行的人增加了好几倍。我和巴兰諾夫在馬廐街附近遇到了社会民主党的杜馬党团：巴达耶夫、彼得罗夫斯基、沙高夫、契赫伊澤、馬林諾夫斯基等等。

在劝业場对面的人行道上，聚集着約100个工人。其中我看到許多認識的同志，于是我也走到他們跟前。我身上藏着一面紅旗，我把它掏出以后高高地举了起来，于是我們大家一致唱起“馬賽曲”。

突然在靠近我的一群人当中，我看到不知誰把一个警察的全副軍装都剥下来了。警察拾起扯掉的皮带，伸手东抓西抓，乱抓身边示威游行的人。他也来抓我了，但我使劲推开他跑了，不过我头上也挨了他几拳。在这一瞬間，一队騎馬的宪兵冲到群众里来了。随后还出現了徒步的警察。警察和宪兵重重包圍起来，把我掀倒在人行道上，并开始拳打脚踢，放平馬刀打我。有几分鐘我不省人事了，但我醒过来以后还觉得有人繼續打我。

群众从两方面涌上来了，看样子是想救我。警察們有些着慌，招架不住了。我趁这个机会想冲出警察的包圍圈，穿过涅瓦大街向劝业場跑。但警察和宪兵成群地来追我。我还没来得及跑到对面的行人道上，追我的宪兵长官已先用馬刀向我背上砍了一刀，同时不知誰又推了我一下，結果我又倒在地上。我已經不能再进行自卫了。

其中一个野蛮的警长还抓住我的头发硬往人行道上拖，但这时恰巧国家杜馬的两个代表巴达耶夫和彼得罗夫斯基来到打人的地方。巴达耶夫和彼得罗夫斯基声明他們是国家杜馬的代表后，要求停止毆打。几个警察把我从大路上拉起来，抓着我两手慢慢地带到附近的警察分局。为防止他們在路上和到分局里再打，巴达耶夫和彼得罗夫斯基也跟到警察局。

到警察分局后，他們叫我躺到沙发上，喝了一点牛奶解毒。我觉得左手很痛：手是被馬刀的刀刃子砍伤了。

两位代表竭力抗議警察的野蛮行为，要求警察分局长

把當場經過的情形寫一個證明文件。但什麼也沒有得到。

我被宣布逮捕。

5月4日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彼得羅夫斯基描寫彼得堡五一事件的文章：

“五一那天，我也到街上去踴躍。在屋裡坐不住，想和同志們一道慶祝我們的勞動節。在涅瓦大街上有許多人，很熱鬧，但群眾是很特別的：很多工人和青年學生，涅瓦大街上的太太們和浪蕩公子們，却幾乎連一個都沒有。

但大約在午後3—4點鐘，在勸業場對面有一小群工人，約100人，唱起了工人歌曲。當時高舉起一面紅旗。步騎警察立刻飛也似地趕上去，把集合的人們沖倒和沖散了。

好多警察打一個遊行示威者的事，引起我們的注意。他們拖他到人行道上的時候，拼命用拳和馬刀打他，而在被毆者想逃跑的時候，又抓住他繼續毒打。

據這個被打的人在警察分局說，他的名字是茨維特考夫。我們向巡官和警察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這樣打他？’他們回答說，他，茨維特考夫，曾打了一個警察，并向巡官射擊。但當場搜查他時，並未發現任何武器。毆打時我和國家杜馬的代表巴達耶夫提出抗議，但警長全不理會。我們要求當着我們的面把當場經過的情形寫一證明，這一點他們也拒絕了。

在警察分局有許多被捕的青年，他們非常飢餓，要求喝水。但也只是在我們堅決請求後，警察才派人去拿麵包。

最和平的工人示威遊行群眾在勞動紀念日竟遭受到這

样的牺牲。看看俄国首都警察这种野蛮的禁止示威游行的手段和大家所知道的经常打人的事，真使人大吃一惊。

当然，警察蛮横地打人并不能取消工人的节日。昨天几乎包括了首都全体无产阶级的罢工已经证明，无产阶级是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进的，虽然遭受到牺牲和反击，可是还能够纪念自己的五一工人节。”

列宁评论 1913 年工人的五一示威游行时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写道：“自 6 月 3 日政变后的连纳事件和第一个坚决的革命工人运动的高潮过去以后，已经一年了。沙皇的黑色百人团和地主，成群的官僚和资产阶级庆祝罗曼诺夫王朝充满掠夺、鞭打入侵和俄国屈辱的三百周年纪念。但他们振作起来开始自己的‘工作’时，也不敢相信自己了，并丧失了过去反革命的力量和第四届杜马的力量。失望和烦恼笼罩着自由主义协会，这个协会虽还无精打彩地胡诌改革的号召，但同时又承认甚至这种改革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俄国工人阶级的五一运动——起初是在里加请愿，而以后是旧历五月一日在彼得堡的坚决行动——呢，那末，这个五一运动却象在忧郁暗淡的阴天里所发出的闪电一样穿过了天空。

彼得堡的五一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全俄国无产阶级的五一运动，再次很明显地向人们证明，谁要是有眼睛和耳朵，谁就可看到和听到现代俄国地下革命工作伟大的历史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的唯一革命组织彼得堡委员会，甚至使资产阶级报纸在五一运动以前，就象在 1 月 9

日以前一样，就象在罗曼諾夫王朝三百周年紀念日以前一样，就象在4月4日一样，不得不指出这个事实，彼得堡委员会的傳单又在工厂接連地出現了。”^①

在逮捕的那天晚上，把我关到了斯巴斯克監獄。关在这里的許多政治犯，常常为了等候审判，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在獄里有单人住的小牢房。窗戶很低，同时为使政治犯不能利用它，还用密密的鉄絲网做的幕擋着它。

我到斯巴斯克監獄时，里面已經关着24个因为参加五一示威游行而被捕的人。他們关在两間大牢房里，一間在二层楼上，另一間在三层楼上，窗子都是向着一个又暗又小的四边形的院子。

我被关到二层楼的牢房里。

两个牢房里关的人，都是19岁到25岁的工人和青年学生。我已23岁了。被捕者的政治信仰和党派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有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維克，有无政府主义者，有两三个孟什維克，也有沒有任何党派关系的人。后者几乎占被捕者的大半数。在我們当中甚至还有一个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名字叫米列尔，父亲是將軍。

大家心情愉快，沒有一個人抱怨参加了五一示威。大家后来感到无聊沉悶的，只是沒有書看，不能散步。不久我們就碰到另外两个問題：因監獄伙食很坏，許多被关的人都开始鬧腸胃病。我們开始提出抗議。看守照我們的要求，喊来了看守长，我們要求他改良伙食。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俄文版，第191、197頁。

不久許多同志开始接到外面送来的东西，以后又允許我們在看守长的監視下接見亲属。我也接見了当时住在彼得堡的一个兄弟。以后慢慢曉得在屋里能活动些什么了。我們想通过看守弄两份报纸，但沒成功。唯一的消遣是討論政治問題，同上层楼的同志們递条子，他們用一条綫拴一个紙条从上面的窗口吊下来递給我們。

有好几星期，就在这种單調的生活中过去了。

好象是五月底的一个早晨，把我提到監獄的办公室了。看来我的案子已归宪兵司令部办了，因为宪兵司令部派了一个宪兵上尉来問我。我要被按刑法第 121 条办了，这样就有关到大牢的危險。

宪兵首先調查我被捕那天的情形。显然，我說我是偶然过路时被捕的，同时对警察忍无可忍的行为表示憤慨。当然，我說的这一切，宪兵是不会相信的。它装作殷勤的样子，甜言蜜語地劝我“坦白承認”。他特別注意的問題是，我在什么地方、并且怎样認識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馬代表阿·耶·巴达耶夫和格·伊·彼得罗夫斯基的。我說，我根本不認識他們，看样子，代表們是偶然从涅夫斯基大街路过时看到警察无理打人才出面干涉的。审問繼續了 40 分鐘，只是在我郑重声明，此外再連一句別的話也沒有时，才結束了审問。

我回到牢房时，同志們紛紛問我。我向他們詳細地說了一下宪兵上尉狡猾的手段，他企图套我的口供。

6 月初，我們所有因参加五一示威而被捕的人，都被判決了 3 个月的徒刑。

几天以后，監獄里傳來了一個消息，說有一個政治上壞得出了名的將軍要視察彼得堡的監獄，並且在日內就要來我們這裡。我們青年們決定對這個將軍來一個“恭候光臨”。

我們立刻把這個問題通知了上一層樓的同志們，並與他們約定，這個將軍到牢房的時候，大家都把臉朝下躺在床板上。

有一天看守在早晨查牢房時宣布，中午 11 點鐘我們要把東西收拾一下，準備迎接將軍，並且要收拾得整齊齊，使人們一看就知道我們監獄里是挺有秩序的。看守說：“不然，我就不高興了，你們也一定要倒霉了。”

我們向看守保證“忠實”履行，但是監獄的看守和其他行政長官一有陪伴着將軍走到我們牢房的徵象時，我們馬上就爬在床鋪上，把頭鑽到枕頭下。門咣咣響了，門打開了。大家聽到一聲口令：“立正！起立！”我們照舊爬着。將軍大發脾氣，吼叫起來，他要立刻搜查我們的牢房，他要抄走我們的香煙，他不准我們的家屬探監，也不准送東西。他說完這些話以後立刻轉身走了。一霎時我們從床上起來，一致唱起“馬賽曲”。關在樓上的同志們也是一樣。

這事過去以後的第二天，開始叫我們“分開”住了：有的關在單人牢房，有的解到別區的監獄。我在深夜裡被解到納爾維區的一個最討厭的監獄。

監獄的看守長或大家所說的看守，對我很凶，馬上命令人們把我關到刑事犯住的地方。我開始抗議，但看守長氣勢洶洶地說他沒有空的屋子。

看守把我帶進牢房了，但我剛踏進門檻，一群刑事犯便把我圍住喊起來了：“知識分子”，“政治家”，“叫他宣誓，宣誓！”①

我不睬他們這一套，滿不在乎地把圍着我的人們推開，狠狠地罵了他們一頓，于是我就走到床鋪跟前坐在一個空位子上。我認為我的滿不在乎的神氣，特別是我的一頓責罵，使我沒有被他們欺負，因為隨後他們中間就有人這樣講了：“干什么找人家的麻煩，自己不看一看這是對誰！”一群小無賴散開坐到自己的位子了，以後不僅沒有哪一個敢找我的麻煩，而且反而由於我經常和看守鬧事，就連刑事犯們對我也相當尊敬起來了。

第二天我開始同這一群人熟起來了。

在屋裏關的犯人共分三等，同時最高一等的人看不起最下一等的人，可以隨意命令他手下的人們。

下等的人是小偷、扒手。中等的人是比較大一點的強盜。上等的人是敢破門而入打劫住家和大商店的大強盜等等。

除這三種人以外，還有些終身的流浪者，他們曾經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來回到俄國後又被捕了。在這些人當中可以看到一種變態的心理和非常奇怪的脾氣。我最初想同他們結識，結果很好。在流氓“無賴”當中有許多生病的，其中還有生傳染病的，所以同他們在一道用公共的杯盤吃飯是極不衛生的。流浪者比較乾淨。他們見我為難，邀我到他

① 這是刑事犯的話，即把對每一個初到監獄的人所施行的一種野蠻的侮辱人的儀式叫做宣誓。

們的“桌子”上吃飯，我同意了。

几天以后，我調查清楚在对面的二层楼上关着我們的四个同志，也是从斯巴斯克監獄解来的。我請看守把我写的一張条子遞給他們。他同意了，并且第二天还把他們的回条交給我。似乎这就是斯巴斯克監獄上层楼与我們用綫通信的同志們。

我給他們第二次写条子了。在条子上是这样写的：我已向看守长說过，很想搬到他們住的牢房里去，希望他們也幫助我。他們答复說他們每天也是这么想，但看守长絕對拒絕。我坚决想达到这个目的。

每天晚上查牢房后，刑事犯們要当着看守长的面唱“修身”和“主，救救我”的歌。自然，我是不做这种滑稽剧的，所以刑事犯們一“祈禱”，我就躲到一边去。現在我想大大冒犯看守长一下，給他一个难看，所以在祈禱时我便走到牢房对面的牆角，坐在床鋪上背对着“祈禱”的地方。看守长斜視了我一下，但他无权强迫政治犯祈禱。

这样我一連搞了几天。看守长耐心地沉默了几天。但好象是在我給同志們递第四次的条子的时候，在这个条子上說，因为我的一切办法都用尽了，什么結果都沒有，所以我必須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希望他們也不要畏縮。但这一次，看守却騙了我，他把紙条交給看守长了。

我被叫到办公室。看守长一見我就气狠狠地喊叫起来了。他說我在犯人当中做宣傳工作，一定要把我整得五体投地，等等。我从容不迫地站在他跟前，把手插在衣袋里。

但这使他更加冒火，又向我大叫起来：“跟我說話，两只手要貼着褲縫！”我答复他說，我不高兴这么做，“啊！好胆大！把他关到单人牢房，三天三夜！”我声明說，你現在强迫我服从吧，但我是彼得堡報紙的工作人員，我出了监牢以后，一定要把我在监牢里所看到的一切岂有此理的事登在報紙上。

我拿起大衣跟着看守到了单人牢房。这是一个磚砌的光綫微弱的小牢房，長約一公尺半，寬一公尺。当然在单人牢房里沒有任何桌椅的。犯人必須在磚地上睡和坐，同时因为房子很小，睡覺只能灣起腿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照平常那样睡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老鼠鬧的很凶，常常从洞里钻出来以后打我身上跑过去。在单人牢房里关的犯人，每天只給一杯水和400公分黑面包。

第二天約摸夜里两点鐘，突然房門开了，看守长进来了。

“喂，怎么样，不好吧？”他面对着我問。

“自然，不好，”我答道。

“有知識的人”——他繼續說——“竟敢这样調皮搗蛋！”

我对他說，不管叫我向誰屈膝都是办不到的。我繼續对他說，我明白，你是因为一个犯人当着你下屬对你耍这种态度不开心了，但这只能怪你自己。

这次談話以后，看守长不仅下令把我从单人牢房里放出来，而且还和政治犯关在一道。他跟着我到了牢房，并且坐在床鋪上开始說，本来他是个好心腸的人，假使我們将来不象在斯巴斯克監獄那样鬧事，他会對我們很客气等等。

单剩下我們自己的人以后，我們开始想他为什么提前从单人牢房放我出来和对我們大談“人道”的事了。最后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威胁过他一次，我要在報紙上揭发監獄里万惡的制度。

我們的牢房很大。五个人住在一起还舒舒展展的。但其他条件沒有值得夸奖的地方。几乎在一个半月当中得不到外面送来的东西，我們餓得憔悴不堪，同时也沒有書看，沒有烟抽，沒有其他日用必需品。換洗的衣服也沒有，从前留下来的“遺產”，在我們衬衣的衣縫里已經开始爬得滿滿的。在这种地方要消灭这种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我們消灭了多少虱子，但一躺在木床上便完全徒劳无益了，因为过两个鐘头虱子又开始更加厉害地咬我們了。

六月底的一个深夜里，看守跑到我們牢房通知我們大家准备出发。半点鐘以后，他們把我們帶到監牢的院子里，最后由大队的警察又把我們押回到了斯巴斯克監獄。

后来我們知道，所有由斯巴斯克監獄解到彼得堡其他監獄的同志們，現在也都关在这里，关在隔壁的单人牢房里。因此，我們大家又聚会在一起了，不过現在是每两三个人分住一室。只能在因事走出牢房后，才可在走廊内会面。

有一次我們听說在頂头上的一个牢房里，由审前拘禁所解来了两个新的同志。其中有一个同志就是維·米·莫洛托夫，他在監牢里已改了名字。

由于在監獄里沒有專門散步的院子，于是我們要求把我們的牢門每日开两小时，这样我們可以在走廊里“散步”

了。斯巴斯克監獄里的犯人比其他監獄里的犯人們自由些。我們甚至能用巧妙的法子開會，討論和做報告。特別使我記得清楚的，是在一個大熱天里開得很久久的辯論會，當時莫洛托夫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的許多原則問題，而反駁他的是一個新聞記者——社會革命黨的特魯托夫斯基。當然，參考書籍是沒有的，所有的報告人都是全憑記憶。

當然，並非每個地方都象斯巴斯克監獄這樣“自由”。在俄帝國的大多數監獄里，常常拷打犯人，只要互相交頭接耳就要重重地處罰。然而我們是關在首都所在地的中心監獄里，並且在首都剛才發生過工人的示威遊行，此外在這裡還有工人的報紙。無疑地，這些情況使監獄當局不敢對犯人橫施肉刑。

我就這樣在監獄里過了整整一個夏天。在8月，我們開始被逐步地釋放。有一天也叫我帶“東西”到辦公室，並且告訴我說，我是放出去歸警察看管的。當我們在院子裡走過一幢房子而看到我們住過的牢房時，同志們爬到鐵絲網跟前高聲唱：

嗨，同志們，我們必須從此分開，

讓你們遠離這倒霉的監牢……

我們向留在牢里的人們告別後，馬上就離開這個把一年的大好韶光消磨了的“倒霉的監牢”。然而因為我吃不消突然吹來的一股新鮮空氣，我的頭開始暈起來了。我只得蹲在牢牆跟前的石凳上，等稍微舒服一些後，起來走到我的老朋友彼·耶·斯米爾諾夫的家里。

七 在第四届国家杜馬旁听。

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分裂

有一次，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送了我一張国家杜馬开会时旁听的“来宾証”。我在指定的時間到了塔甫里切斯克宮。这个宮起先是叶卡德琳娜二世給她的寵臣波节姆金·塔甫里切斯克公爵特別建造的，以后有一个时期做了亚历山大第一的行宮。国家杜馬未召开以前，这个宮已空了半个世紀以上。但我最感兴趣的，不在于这个宮的本身如何，而在于見識一下沙皇“議會”开会的情形。同时杜馬的許多領袖，特別是“陛下的反对派”立宪民主党的米留考夫、罗基切夫和什加列夫，我也在彼得堡城市选民团的竞选會議上見過，甚至听过他們的演說。但我感到兴味的是看看全体杜馬會議的整个情形，因为这个會議血口噴人地講了无数坏話，从沒有对人民通过一項有益的決議和法案。一个代表——民族党的領袖苏里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們的目的，是使群众安心，因为杜馬已替他們說話了。”实則相反。杜馬里講的話越多，群众越不安心，他們相信杜馬完全是帮沙皇政府說話的，杜馬大多数人怕民主运动和民主改革就象怕失火一样。

我坐的地方是左边的包厢，从这里可以望清楚作为会

場的整个白色大厅。代表們都坐在圓形劇場式的安乐椅上，面前安放着一个桌子。在他們前面的一个台子上，高高地坐着一个大胖子杜馬主席、十月党人、地主姆·維·罗将考，在他的两边坐着副主席和主席团的成員們。代表們講話的講坛設在主席座位下面稍低的地方。

在极左边坐着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一小群人，計 13 人，在他們的右面是劳动党的 10 个代表。这就是在杜馬里所有与杜馬的黑色百人团多数党和沙皇政府对立的人們。

我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时，會議已經开始，全体代表也已經坐好。有一个人在講坛上講話。最初我注意的是代表們当中的許多神父，他們穿着黑袈裟，脖子前带着十字架，黑压压的大半坐在极右面黑色百人团的中間。极右派的一个首領、狡猾的黑色百人团员查美斯洛夫斯基脊背对着講坛站着，指手划脚地向坐在他們后排的团员們做指示。它的另一个首領，即以在杜馬中的飞揚跋扈和攻击左派时所采取的流氓手段轟动一时的普里什科維奇，脑袋光秃秃的正在講坛旁边急得团团轉。只有极右派的第三个首領馬尔考夫第二装腔作势地坐在他右排的座位上。

起初一个一个講的都是拥护右派政党代表的话。大厅里比較安靜。但是快散会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一个代表走到講坛上面了。大家都傾耳靜听。在右翼和民族党的中間开始活动和爭吵起来了。演說者越講下去，吵鬧的声音越高。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代表开始講到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其后他提到不久以前在尼古拉耶夫罢工中屠杀

工人的事件時說，如果在首都彼得堡的警察還是這樣的蠻橫，那麼俄國工人是在什麼條件下為自己的起碼權利而鬥爭就很明白了。右邊坐的人開始鼓躁，打斷演說者的話。在中間也喧嚷着表示不滿。普里什科維奇開始光火了，一会儿跑到講壇跟前，一会儿又折回去。羅將柯打斷演說者的話，要求他講話“不要離開本題”。結果，社會民主黨的代表被完全取消了發言權。

這個事件使我更親切地認識到我們的代表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參加杜馬的。

宣布休息後，我到食堂待了一会儿，後來見到許多代表來了，於是我就回家去了。

我在杜馬會議旁聽時，從外表上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代表們之間的关系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但在實際上，社會民主黨黨團已經不一致了。甚至我還在獄中的時候，就聽說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已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我們根據當時偶然帶進監獄的幾個片斷的消息也可知道，在1913年春夏兩季，黨團內部日益尖銳的矛盾已經導致黨團內部一部分人公開反對另一部分人了。現在，發生破裂的真象大白了。

起初，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共有6個布爾什維克和6個孟什維克。過後不久，突然從伊爾庫茨克來的一個代表馬尼考夫加入了孟什維克（後來孟什維克把他開除，說他是“可疑的社會民主黨分子”）。因此孟什維克多了一票。他們利用這種多數，竟不顧布爾什維克的抗議，又允許由華沙來

的一个代表雅格洛也参加了党团，并享有发言权，其实这个人从来也不是社会民主党党员。

布尔什维克代表们的一切活动，一开始，就是遵照着1912年布拉格一月代表会议选出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指示和领导的。反之，孟什维克的代表们则与所谓“八月联盟”，即孟什维克取消派的组织委员会发生联系。

孟什维克的杜马党团利用多数，执行了他们的取消派路线，而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所提出的双方平等的要求则时常被拒绝。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给公开站在取消派观点上的“光线报”写文章。当时孟什维克的7人小组在“光线报”上责备布尔什维克闹分裂。布尔什维克在“真理报”上的详细答复中，说明了杜马党团的真相，描述了孟什维克及其分裂政策和庇护取消派的真面目，并把这件事提出来请觉悟的工人评判。

“真理报”上的公告发出以后，工人小组和各组织都通过和发表了許多反对孟什维克7个代表的决议。在許多决议中都无条件地要求孟什维克放弃他们的特权或服从全“马克思主义党中央”，即当时为避免书报检查所指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

“光线报”只收到不多的几个决议是拥护7个代表的，同时其中有許多是伪造的，所以后来都又由工人自己否认了。

但孟什维克绝对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是在党团工作中享

有平等权利的一方。当时布尔什维克公布了下述的一封信来答复他們的7个代表：

“尊敬的同志們！

我們在10月16日党团會議上交給你們的声明中，已經直截了当地声明，繼續一致努力的那些条件，是我們唯一可能接受的条件。

但你們在10月25日的回信中，甚至也断然拒絕了我們的这一切要求。

我們認為必須通知你們的是，从今日起我們成立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馬的独立党团，但还是建議你們與我們經常共同商量，以使用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在杜馬講壇上采取共同的行动。

阿·耶·巴达耶夫、罗·維·馬林諾夫斯基、
克·姆·牟拉諾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
佛·尼·沙摩伊洛夫、尼·尔·沙格夫。”^①

其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們在“真理报”被警察查封后出版的“为真理而斗争”的报上公布了一个告全体工人書。在这个告工人書中指出，党团内部的两个部分早已就是社会民主党内的两个互相斗争的派別：一派忠于无产阶级旧的旗帜上所写的旧口号，另一派則以部分的要求偷偷代替这些旧口号，执行了使工人运动服从于自由主义的政策。其次指出，孟什维克的7个代表是公然执行取消派的路綫的，

① 1913年10月29日“为真理而斗争”。

尤其是在報紙上互相發表了最初的几封信以后，已經公然以整个杜馬党团的名义声明联盟的自由就是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战斗口号了。

布尔什維克反对取消派的这种新的表現时，是这样来結束他們的告工人書的：“同志們！甚至我們現在決定成立独立的党团，即成立社会民主党党团时，我們也还是主張我們今后在每一次发言前和提出每一个問題以前，請他們与我們共同商量并共同决定演說人和口号，我們还是警告他們尽可能地不要在杜馬講壇上发表原則上不一致的言論，还是要尽可能地使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保持一致的行動。但我們不能讓人来謾罵和抹煞我們的口号；我們認為为了替工人階級服务，現在維護这些口号和防止人們抹煞这些口号是我們的責任。

同志們！我們現在不論是在杜馬里面或是在杜馬外面，不論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都要单独地保护我們的旗帜了。在这种責任重大的工作中，我們請你們援助我們。

阿·耶·巴达耶夫、罗·維·馬林諾夫斯基、
克·姆·牟拉諾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
佛·尼·沙摩伊洛夫、尼·尔·沙格夫。”

这样就結束了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第四届国家杜馬中的一致行動。从1913年秋天起，布尔什維克党团与孟什維克党团在杜馬中分头工作而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只服从布尔什維克党中央指示的党团了。

八 奸 細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以后的年代中，沙皇政府为了与革命运动进行斗争，曾广泛地利用了偵探和奸細。警察厅和偵探局利用个别心甘情愿死心踏地干奸細勾当的分子組織了大批的偵探和告密者，这些分子，不只在社会各阶层里有，遺憾的是，在工人当中也有。

所有这些便使得我們組織的活动复杂化，但防止奸細鑽入我們当中是很困难的事。往往人們認為毫无嫌疑的人，恰恰就是奸細。

事后查明，在我們当中也有一个奸細——尼·波·波格丹諾夫。波格丹諾夫从前是个大学生，但由于参加革命运动，屢遭逮捕，所以沒有讀完彼得堡大学就到一个事务所服务了。波格丹諾夫和他全家住在彼得堡那面海塞列罗夫斯克巷的一幢单独的小房子里。他在当时有被認為研究革命运动理論問題的最好的圖書室，同时我們也認為他是对馬克思主义有修养的人。因为当时我們同志当中很少有人住一幢单独的房子，所以我們常常到波格丹諾夫家里“閑談几句”，有时也在他房里举行新年“联欢会”。

我們同志常常到波格丹諾夫家里去的有伊·阿·阿庫洛夫、德·伊·格拉斯金、尼·姆·什維尔尼克、伊·姆·雅

尔莫里克，他們都是在組織中做秘密工作的，而某些同志如什維尔尼克，还是彼得堡委員會的委員。不錯，在波格丹諾夫家里會見時不談秘密的話，但是从个别的語句中房主人也可听到一些消息。

表面上波格丹諾夫很謙虛，做作得很象樣，誰也沒想到他就是一個奸細。雖然他在很長的期間沒有受到過迫害，但我們是這樣解釋的，他雖在工會工作，但那時他沒有參加秘密組織，因此引不起偵探的注意。曾經有一個時期，在彼得堡的地下工作人員當中流傳着波格丹諾夫與偵探局勾結的消息，而從流放地逃回彼得堡秘密住了一個時期的雅·莫·斯維尔德洛夫甚至也警告阿庫洛夫必須對波格丹諾夫小心。但因証據不足，很難斷定波格丹諾夫就是一個叛徒，而且常常有這種怪事發生，偵探局為了陷害某一個人時，還故意地對我們最忠實的同志放出了這樣的謠言。但斯維尔德洛夫警告以後，我們許多同志再不到波格丹諾夫家里去了。

偵探局怎樣能收買波格丹諾夫為“秘密工作人員”呢，這是一個秘密。查明的只是，波格丹諾夫不是常干奸細的。他除了供給偵探局情報外，常冒充為理論知識豐富和對地下組織工作有實際經驗的人被利用去訓練偵探同革命運動鬥爭：給他們講演當時所存在的地下黨的綱領和實際活動，每月得到一筆優厚的獎金——200 盧布。

1917 年二月革命時，波格丹諾夫正在“烏爾康”工廠的傷病互助會擔任秘書的工作，在廠里很有聲望。他同其他

許多奸細一樣，鼓吹摧毀彼得堡的偵探局，這個偵探局，大家都知道，是被火燒了。但偵探局的“秘密人員”名單突然落到伊·阿·阿庫洛夫手里。波格丹諾夫被揭發并被逮捕了。在臨時政府時代，他同他那一伙人都被釋放，死於1919年。

根據這個名單還發現了其他許多奸細，其中有彼得堡有名的地下工作人員米隆·切爾諾馬索夫以及阿布洛西莫夫。米隆·切爾諾馬索夫曾混入“真理報”編輯部。布尔什維克黨有名的活動家莫·斯·奧里明斯基回憶當時的情況時寫道：“……大約從6月（1913年）起，米隆·切爾諾馬索夫就混到編輯部來了，造成這麼一種經常性的沉重的空氣，當時組織上雖感覺到有些不大合適的地方，但總摸不清毛病究竟在哪裡。根據各種跡象來看，似乎切爾諾馬索夫負的責任，是要使報紙倒台，這是很自然的：破壞報紙和使報紙在工人眼中名譽掃地。但非常好的一件事是，儘管他們對付我們時所用的一切壓力和經常逮捕的方法，其目的顯然是在於讓切爾諾馬索夫變成報紙的唯一支配者，但這個目的（從內部搞垮報紙）沒有達到。”結果，切爾諾馬索夫因有奸細嫌疑於1914年1月被辭退了，當然理由是不能說明的。

社會民主黨第三屆國家杜馬黨團的成員、奸細維·耶·蘇爾卡諾夫也給我們帶來不少損失。在第三屆杜馬任期已滿而被解散之後，他與彼得堡委員會和第四屆國家杜馬中的布尔什維克黨團保持聯繫。他一心一意地想逮捕黨團。

在1914年11月，他同一个奸細罗曼諾夫一道，把工人代表和党工作人員在彼得堡附近小湖召开联席會議的地点告訴了警察厅。

罗曼·馬林諾夫斯基也是因为作了一个最大的奸細才出名的。他是一个不简单的工作者，做过莫斯科五金工会書記，曾由工人选民团推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馬的候选人并正式当选为莫斯科工人的代表。

我和馬林諾夫斯基見過許多次面，并且也和他談过話。他装成一个忠实的布尔什維克。但人們总觉得他有些“奇怪”，比如他在杜馬发言时，有时就把党团所通过的演說，漏掉重要的一部分。但我們的代表在当时那种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却未引起怀疑。

只是到革命之后才肯定我們組織的許多次破坏和某些同志的被捕，是馬林諾夫斯基一手干的。事后查明，馬林諾夫斯基于1913年曾把秘密住在彼得堡的雅·莫·斯維尔德洛夫和約·維·斯大林出賣給警察。斯維尔德洛夫是在杜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的房間被捕，而斯大林是在卡拉什尼考夫交易所大厅的工人晚会上被捕的。馬林諾夫斯基許多年来伪装为革命的布尔什維克。他不仅做了布尔什維克杜馬党团的主席，并且能爬到我們党的最高机关：他在布拉格代表會議上被选为中央委員。

根据革命后被捕的伪警察厅长伯列茨基的口供，馬林諾夫斯基是“偵探局的紅人”，而伯列茨基的助手維沙里奧諾夫則称他为“深知党内情形和忠誠服务的最得力的工作

人員”。馬林諾夫斯基神通广大到这种地步，他能把杜馬党团的党内文件交伯列茨基看过之后再退轉回来。

馬林諾夫斯基从 1907 年起就开始他的叛党活动。在 1910 年他做了莫斯科偵探局的暗探，每月收入 100 卢布，而做了杜馬代表以后，开始由警察厅每月支取 500 卢布的薪金，再后每月增为 700 卢布。他除薪金外，还得到过“特别奖金”。要知道馬林諾夫斯基因这种叛变行为得到多少“奖金”，只要把他的“工資”同紡織工人的工資比較一下就够了，工人每天做 10 小时半到 11 小时的工作，每月才一共拿到 18 到 20 个卢布。

我們从档案材料中得知，伯列茨基下台后接任伪警察厅长的德茹考夫斯基怕人們揭露馬林諾夫斯基这个丑角，以及揭露他因此而必然要干的丑恶勾当，曾經要求馬林諾夫斯基退出杜馬，离开俄国。馬林諾夫斯基突然背着党团悄悄地把他的代表委任状丢下后，从警察厅領了 6,000 卢布的出国旅費在当天离开俄国了。

孟什維克取消派为破坏我們的队伍，趁馬林諾夫斯基突然秘密退出杜馬的机会，发动了口头的和書面的恶毒攻击，暗示这是布尔什維克党团的一件“不体面的事”。我們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才击退了取消派的攻击。我們的杜馬党团严正地指責了馬林諾夫斯基的出走，几次三番地通过“真理之路”报向工人解释取消派对整个党团的造謠誣蔑。尽管孟什維克使尽一切力量，也不能动摇工人群众對我們党的信心。

馬林諾夫斯基的事只是到了二月革命后才徹底揭发的。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他被动员到军队里去,其后又被德军俘去。十月革命后不久他马上回到了苏维埃俄国,于是就在国内被捕。馬林諾夫斯基被控告到特别革命法庭,判决枪毙。

九 保險运动和伤病互助会

我从牢监里出来不久，就参加了当时在彼得堡所发生的保險运动，从1913年秋季起就担任什图德尔工厂伤病互助会的秘書工作。俄国沒有真正保护工人利益、不受厂主侵犯的工厂法。虽有几种“法令”和“条例”，但实质上都是保护厂主的利益、防止工人侵犯的，而不是保护工人的利益、防止厂主侵犯的。

在工作時間方面非常紊乱，在許多地方，尤其是在小工厂里，厂主能随便强迫工人工作。真的，在大工厂里，根据工业章程，工作時間不得超过11小时半，而在星期六和节日前的一天不能超过10小时，但額外的工作使这种制度也等于零。

关于手工业作坊中职工們的工作時間，在上述的工业章程中說，手工业作坊虽不属于工厂檢查之列，但它的工作，每一昼夜亦不能超过12小时，同时在这个時間以內，还必须給工人一点休息時間。季节性的生产，工作時間达14小时。

1906年11月15日和1907年9月12日的法令規定店員和其他工商人員的工作時間，每日由12小时到14小时。

至于說到工人和職員殘廢后享受救济金的权利問題，

那么那时的法令只是說到少数的工厂企业，同时也只是临时发一次很少的救济金。关于工人灾禍保險的固定法令，一般說来，当时是沒有的。

“工人問題”在群众性的革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引起政府当局的注意。1912年國家杜馬提出了工人保險法案，或所謂“工人疾病保險”法案。社会民主党当时激烈地批評了这个法案，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当然它的草案是被否決了。工人保險法案在杜馬通过后，于1912年6月23日由政府采納。

根据这个法案，俄国第一次成立了伤病互助会。但不是对全体工人群众都尽义务的。例如小厂的工人就不一定享受到这种保險。工人在20人以上30人以下的企业，也只有用蒸汽鍋爐、电力发动机或其他发动机工作的企业，才能参加伤病互助会。

因此，当时在俄国的約1,300万雇佣工人和職員中，根据那时的統計，約1,000万无产者是与义务保險不相干的。

这个法令規定，仿效德国的榜样成立伤病互助会。互助費須由工人的工資中扣除，同时每扣工人的3个戈比，厂主也須添加2个戈比。

設立伤病互助会的企业，工人須在200人以上，同时比較小的企业須联合成立总的伤病互助会。

业务管理由厂主和工人負責，在伤病互助会理事会中，工人的代表应多一票。政府不得不在法令中定出这么一条，是因为由工人方面扣除的会費比厂主变的会費多些。

厂主的代表，通常由对厂主忠实可靠的人担任，有时是警察。工人的代表在工人的大会上选举，但这个大会，依法不是由全体工人参加，而只是由工人和职员的代表参加，并且这些代表不能超过100人。厂主們也可参加大会，而且工人們每有三票，他們就有两票。大会主席由厂主或他的代表担任。有时厂主想表示一下他的“誠实”，放弃了这种“权利”，这时主席就由大会选举，但这确实是少有的。在伤病互助会理事会中也是这种情形。救济金是发给会里生病、受伤、生育和死亡的会员。

各省为对伤病互助会进行总的管理和领导，依法成立了省的保險委员会，委员为省长1人、官吏7人、地方自治会的代表2人、市杜馬的代表1人、厂主的代表2人、工人代表只有2人。

保險总会为最高机关，其委员是：工商部长1人，官员15人，彼得堡市杜馬代表1人，彼得堡地方自治会代表1人，厂主代表5人，工人代表也只有5人。

起初，在极“左的”革命分子中間发出了必須抵制这种法令的呼声。布尔什維克立刻站在明确的立場上。我們党認为这个法令是很不能令人滿意的，但同时認为必須积极参加保險运动和利用它来达到組織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的目的。

1912年12月在克拉科夫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和党工作人員的會議上，通过了下列的关于保險运动的決議：

“必須对政府和資本家强迫工人不經工人大会通过而暗中选出参加伤病互助会的全权代表的企图，进行最坚决的和齐心协力的斗争。

工人應該到处以事后呈报的方法来爭取举行集会，以便預先推定合乎他們愿望的全权代表候选人。

工人應該举行革命性的群众大会，以抗議那些随保險法的施行而来的暴行和侮辱。

在一切場合下，都必須預先从小孚众望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当中拟定全权代表候选人的工人名单，并且在举行任何集会都办不到的地方也要齐心一致地通过这个名单。

會議認為抵制全权代表的选举是不适宜的和有害的。資本家目前主要是在致力于不使工人建立工厂中的某些无产阶级的細胞組織（工人伤病互助会就是这种应当建立的細胞組織）。抵制行动在目前会使工人分散，并只会对資本家的上述計謀有利。

一切有关实施保險問題的鼓动，必須与关于沙皇机关全部实际情况的說明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同时要說明我們的社会主义原則和革命要求”。①

尽管在1912年6月23日早已通过了保險法，但彼得堡的第一个伤病互助会只是到了1913年3月31日才在涅夫斯基关外的硬脂厂开始成立。該厂的行政方面和工商部

① “苏联共产党(布)关于工会問題的決議”第一册，工人出版社1954年版，第52—53頁。

的代表也出席了互助会的成立大会。接到了工商部部长和国会若干委员的贺电。工商部工业司司长李特維諾夫—法林斯基、保險法的倡議者在成立大会上致了祝詞，他在祝詞中說：“伤病互助会成立后，俄国工人生活的新紀元开始了，工人伤病时可怕的物质困难情形，从今是大大減輕了。”

一个工人起来回答了李特維諾夫—法林斯基，他說，工人不希望这个法令带来救济，他們参加伤病互助会只是想为自己的未来展开斗争。

演說完毕后，行政上邀請工人吃飯，当然，工人們是拒絕了。

彼得堡的另一个伤病互助会是于1913年秋季在什图德尔鋸木厂成立的。这个厂的工人們提議我做他們的秘書。

当我到工厂时，他們把我領到办公大楼二层楼上为伤病互助会准备的房子里。不久就召集互助会劳資双方的理事們开会。

理事会由5人組成：其中由工人选举的3个人是波格丹諾夫、安得留申和舒米洛夫，由厂主委派（人們叫他們为委任官）的两个人是厂长格罗奇尼柯夫和會計主任艾伯尔林。理事会开会了。在会上除討論其他組織問題外，还决定請我担任秘書的职务。厂主的代表們提議由他們的走狗来担任，反对我为候选人，但因理事会的工人代表坚决主張提我，于是他們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見，放弃了表决权。这样，我就被确定为秘書。

第二天我开始經營賬目，整理會議記錄和清点該厂工

人和厂主交来的会费。

在什图德尔工厂的工人只有 800 出头，所以用不着請专门的會計，而是由我一个人兼管銀錢出納事宜。几乎在每次會議上解决理事会劳資双方代表之間的各种問題时，都会发生激烈的爭論。資方代表常常因为自己力量薄弱退出了伤病互助会理事会的會議。有一次，按期取款时，我对厂主說过，他派到理事会的代表对我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什图德尔答应我以后“劝告”他的忠实的奴仆，但他們的行為并不見改正。

在彼得堡的其他工厂也逐漸成立了伤病互助会。但随着互助会的成立，厂主与工人之間因爭夺伤病互助会的权力而发生的斗爭也激烈起来了。关于秘書一职，即关于互助会的实际領導人的問題，引起了极大的爭論。理事会的工人們利用自己在理事会占多数的情况，决定聘請自己的人做秘書，厂主的代表則通常提出他們自己的候选人。为这件事的斗爭常常關到决裂的地步。

布尔什維克的公开杂志“保險問題”写道：“職員應該合于什么要求并且到哪里去找适当的職員呢？首先，伤病互助会的職員，就自己的信仰說，應該是站在階級的观点（因書报檢查和保守秘密关系，杂志不能提出党性——著者注。）上的，应好好地研究工人运动問題的。很明显，单使互助会的秘書懂得一些簿記和保險法是不够的。厂主和工厂檢查員也是知道保險法的，但是工人們并不能依靠这些先生們去办自己的事。

伤病互助会的职员首先必须是政治上成熟和对工人事业绝对忠实的人。他不仅应成为保险家，而且每每就是工人的活动家。”^①

由于社会革命党抵制伤病互助会，所以各政党之间为在互助会里扩大影响的斗争，主要是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政府关于工人保险的这种小恩小惠的法令，孟什维克已经心满意足了。孟什维克一方面企图保证自己在某些伤病互助会中的领导，另一方面却不象我们党这样地提出革命的任务，而是要在那里同厂主进行“有效的”合作。他们为了在工人的保险问题上实现自己的妥协政策，就拚命使伤病互助会的秘书成为他们自己的同志，但他们只在彼得堡很少的工厂中达到了这个目的。真的，在初期，孟什维克得到了这种优先权，因为他们队伍当中有不少知识分子是对这种工作有必要的知识的。但不久，秘书工作开始由搞文化教育运动和职工运动的人们来担任了，于是孟什维克就日益不能使他们的人再担任伤病互助会的秘书了。尤其是我们早先组织的办事员工会已从自己的队伍中提拔出许多伤病互助会的工作人员。

伤病互助会是工厂中的工人支部，吸引了许多进步的工人。凡布尔什维克担任秘书的地方，都进行了党的工作。党组织通过伤病互助会与工厂中最进步和最可靠的工人建立了联系，逐步地吸收他们加入了党。

^① “保险问题”，1913年第2期。

工人需要弄明白各政党之間現存的分歧，因之非常重要的是要秘書能向工人解釋他們所不了解的問題。當然，这就提高了我們党在無产階級中的影响。

政府开办伤病互助会的目的，是想軟化工人和調和他們与厂主之間的利益，但不久就看出，結果完全相反。階級矛盾更加尖銳。保險运动逐漸表现出群众性的，乃至于革命的性质。

有一次，在一个激烈的會議上，厂主的代表們——會計艾伯尔林和厂长格罗奇尼柯夫——因为对疾病救济金的数目和发放的手續問題表示不同意而賭气地站起来走了，声明他們以后再也不参加理事会的會議了。显然，我們很高兴他們走，因为只要工人代表都出席了會議，就够法定人数，我們将来就不需要再浪費時間同厂主的奴才們作无益的爭辯。但这次會議以后，在工厂的大門口，甚至在工厂里面常常出現形迹可疑的人，这些人不論他們伪装得怎样好，但一看就知道是干哪一“行”的，用不着特別費腦子去想。

工人們常常到伤病互助会办公室“談談”。但我們发现有人注意我們后，为了避免警察的襲击起見，就劝同志們沒有特別要事暫時不要多到伤病互助会来。

行政上因不知道我的詳細情况，坚决要我把我的名字、父名和住址告訴他們。我知道他們这种要求的真正目的，当然，我拒絕了他們。事后調查清楚，我的这些情况是警察分局需要知道的，因此警察分局最后决定派副局长到伤病

互助会的会址来亲自問我。

当警察局副局长进伤病互助会的办公室时，我正拿着一个名单給工人们发放伤病救济金。他客气地要我为他挤出几分鐘时间来告訴他一些他所要了解的情况。我回答他說，我現在正在忙着，沒有空和他談話，同时我馬上指出，我認为他在法定的办公时间来伤病互助会办公室是違反了警規，干涉伤病互助会的內政。

但警察局分局长更加坚决地要我停止发錢，要我把他要問的情况先告訴他。我为避免麻煩，說出了我的名字、父名和住址。

这一幕讓工人们看到了，他們回到車間里把这件事詳細地告訴了我們的同志們。这件事过去沒有好久，馬上就来了几个最积极的工人，他們說这是會計艾伯尔林搗的鬼。我明白，如果对这件事不搞出个結果来，那末以后警察可能更加无理地进行干涉。所以我就提議工人们停止工作，大家都到工厂賬房間找艾伯尔林出来講話，同时警告厂主如再有这种現象发生，一定要采取更坚决的手段。对这个問題简单地交換了一下意見后，我的提議通过了。

午飯休息前半个鐘头，約有 800 个工人停止工作，一齐到工厂賬房間跟前。从群众中可听到这样忿怒的叫声：“艾伯尔林給我們出来，艾伯尔林！”

为了进行談判，工人们推出了一个專門的代表团，代表团要求艾伯尔林出来向全体工人講一講他搗乱的道理。

——用独輪車推他走，丟到护城河里去。你忘記 1905

年从厂里推你走的事了！①——工人发出这样的吼声。

艾伯尔林听到账房跟前的鬧声和指名罵他的声音，吓得不敢到院子里来。少頃，厂主什图德尔亲自出来了。他愁眉苦臉地要求工人們饒恕他。代表們向什图德尔說明了事情的經過，要求他为了避免发生更严重的糾紛，采取各种措施，保証厂里以后不发生类似的告密行为。工人們声明：“我們聘請了我們的秘書，我們就要用我們所能采取的手段来保护他，直至罢工为止，如果这件事情过去以后秘書被逮捕了，那末一切責任都要艾伯尔林自負。”

什图德尔回答說，他沒有叫他的管理人員告密的意思，但假如有过这种事情的話，那末今后他可保証決不再犯。

——至于逮捕秘書的可能性，那末我認为这是不会的——什图德尔在結束时說。

这样提出保証后，工人們就开始散了。

翌日，我見到管理人員时，大家对我殷勤起来了。艾伯尔林非常客气，所有为伤病互助会要求的事，都无条件地照办了。

有一次，會員大会开会前，那个副警察局长又到伤病互助会办公室里来了，他要求我不要在大会上講話，只照着正式的报告讀一下。我們决定对警察的这种蛮橫无理的行为

① 1905年艾伯尔林被工人們用手推独輪車从厂里推出来，本想把他丢到护城河里，只因他一再哀求，才把他丢到河岸上。

在報紙上呼吁。大家推我把这件事的通訊送到“保險問題”杂志。这个通訊发表了。

杂志編輯部还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警察局副局长”。文章中說：“該区分局长干涉彼得堡什图德尔厂伤病互助会的工作。由下面所載的通訊知道，上述的警察局分局长曾两次跑到伤病互助会理事会的办公室調查互助会秘書的身份，最后并且說，在今天的大会上，如伤病互助会的秘書不在那里講話而只是照理事会的报告讀一下，才能允許他出席大会。”^①其次文章中又說，警察依据 1912 年 6 月 23 日的法令，甚至可以勒令大会散会，但他沒有任何权力監視理事会的活动。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保証我們經常不受警察方面的专橫暴戾。已經使我造成一种很难再指望长期的自由自在的情况了。但这是在当时所不应多想的，因为我猜不到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候又会請我尝鉄窗风味，同时尝鉄窗风味的時間又有多久。

那时正是社会政治生活非常活跃和到处需要党的工作人員的时候，所以我不可能把自己的活动仅限于参加保險运动和工厂伤病互助会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也是重要的。我又开始到納尔維区的文化教育协会“教育社”和办事員工会工作了。

我邀請几个在斯巴斯克監獄一道住过的难友、彼得堡

^① “保險問題” 1913 年第 5 期。

大学的学生参加教育社的工作。他们也拉我参加学生的工作，因为那时在学生中正为教育部长卡索的反动行为发生风潮。这位大亨，在部长任内，以对中小学的若干反动措施而闻名，他解聘了高等学校的许多进步的教授，其中包括一些大学者在内，而以不学无术的反动分子来代替他们。

1913年秋季，彼得堡医学院的学生因反对卡索的反动措施和大学生要穿军服、佩短剑的规定而发生了罢课。学生当中的民主分子为表示抗议，宣布罢课，拒绝穿军服。但在医学院读书的资产阶级子女，或当时所谓的“白衫党”却洋洋得意，夸耀他们穿的新制服和腰间佩的短剑。学生们把“白衫党”从自己的队伍中逐出，撕掉了他们的肩章，抢走了短剑，因此常常为这件事打架。

有一次，我偶然参加了学生的一个晚会。参加这个晚会的有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和伯斯图什夫斯克高级女校的学生。在这个晚会上，在舞蹈的许多节目中还插着朗诵和合唱，同时朗诵的诗和合唱的曲子是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最流行的：“我坐在湿牢的铁窗旁边”、“听罢”、“晚钟”、“船夫曲”、“指给我这幢房子”等等。晚会正在大厅里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来了10—12个医学院的穿着崭新的礼服、佩着肩章，腰间挎着短剑的“白衫党”。我一看这种情形就知道要出什么事了……果然原先坐着的人们，连女学生们在内，马上都从座位上跳起来一齐喊“白衫党滚出去！”大家集合起来把这些不速之客推出了大厅。吵声由近而远，一会儿吵到楼梯上，其后又从楼梯上闹到院里去了。人们在他们背后用套鞋

和泥块打他們。可以想得到，这次事件以后，他們的时髦服装和肩章大概是变成什么样子了。

有一次在星期天，我偶尔到了瓦西里耶夫斯克島上的劇場，那里已由市长批准邀請前“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員——有名的什里塞尔獄的囚犯尼·阿·莫洛索夫做科学講演(題目我忘記了)。我到的时候，劇場里已挤滿了人，多半是男女学生。大家都兴奋地等候講演人。大家一看见莫洛索夫登上講台，全場不由得欢声雷动，掌声四起，致使莫洛索夫很久很久不能講一句話。他默默地站着，会心地微笑着。但两个警察分局长看到群众对莫洛索夫的这种暴风雨似的热烈欢迎后，立刻跑到台上把莫洛索夫从台上拖走了。以后他就再沒有露面。开会的青年們恨透警察的蛮橫，大家很久不肯解散。

这几次事件使我感到青年学生是起来了。当然，学生群众的思想是反对专制，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但他們的“革命”斗争限于召开晚会来朗诵热爱自由的詩歌，参加研究馬克思主义理論問題的秘密講演会，組織示威来反对政府的反动措施等。当然总的說来，学生运动是带着进步性的，但同真正用来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方法，还有很远的距离。

十 第二次被捕。在候审室

省保險委員會和保險總會的工人代表的選舉定于1913年12月22—29日舉行。

政府認為幾個工人代表夾在一大群工業家和官員當中是會被湮沒的。此外，沙皇政府還禁止召開選前大會，希望這幾個工人也要用“秘密”選舉的方式產生，而使革命分子不能打入最高的保險機關。

工人代表堅決要求當局答應他們召開選前大會，無論如何不參加“秘密”選舉。他們向市長提出了准許召開彼得堡全體代表大會的問題，但被無條件地拒絕了。

當時由彼得堡的布尔什維克組織提議，決定召開彼得堡各廠代表的秘密大會。代表什圖德爾廠參加這個大會的同志們推舉的是我和傷病互助會理事會理事工人波格丹諾夫。會議的召開按保密規則進行和布置：所有出席大會的人都告訴了口令，而會場則直到最後才確定。

我坐的電車還沒走到開會地點的那一個車站，我就先小心謹慎地下來步行了。在我要進去的那幢房子（五金工會分會）旁面，站着幾個形迹可疑的人，但因為是在夜間，所以我弄不清楚究竟是偵探還是住在這里面的人。我把這幾個人的情形告訴了與會的同志們，但他們對我說，在房子附

近的街上站着的，是我們的兩個同志，是準備出危險時向我們報警的。

在工會的房子裏有 31 個人開會。幾乎彼得堡的所有大工廠都派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到會的人們開玩笑說，這次大會是工人代表蘇維埃。凡是五金工會以外的人，都發了該會的一張會員証以防萬一。

大會到很晚的時候才開始，差不多到夜里 11 點鐘。主席是一個五金工人，布爾什維克斯·彼·麥德威節夫。議程上列的問題是：討論保險總會的候選人，討論如何在保險總會的實際工作和一般保險運動中執行布爾什維克黨的路綫。

我們剛開始討論議程上列的問題，我們在門外放哨的人們便跑進來說，他們要凍僵了，同時因為外面沒有發生任何危險的先兆，所以他們就決定進來烤火了。但偵探狡猾得很。10 分鐘還不到，門就突然嘩然一聲開了，兩個警察分局長拔出手槍帶着約 40 個警察沖進房裏大叫：“舉起手來！”为了不連累同志們和熟人，大家都開始当着警察的面撕碎了字條子和住址。警察大怒起來，叫我們不要這麼做，但誰也不理睬他們。

警察見我們沒有武器，便放心仔細搜查起來。他們把我們大家分成幾組（每組幾個人），開始翻我們的衣袋，搶去了小冊子、筆記本以及他們所看到的一切東西。警察當中的便衣偵探特別起勁。搜查完以後，把我們帶到隔壁的屋子去，派武裝的警察看守着。搜查差不多一直繼續到早晨 4 點鐘。過後，增援警察的軍隊開來了，于是把我們大家押到了

彼得罗夫区的監獄。

除我們當中的一個婦女而外，我們大家都被關到事先準備好的一個牢房里。同志中有人開玩笑說，現在保險安穩穩地繼續不斷地開會了。大約閑談了半小時，大家因一夜沒睡感到疲倦了，所以我們決定躺下來睡覺。

第二天是節日，有些同志的妻子和家屬知道我們的下落后，都帶了東西來探望。但被允許接見的只有少數人。我們得知，我們被捕的事已經有人告訴社會民主黨第四屆國家杜馬黨團了，黨團已立即向內政部長提出質問。

翌日，來看幾個被捕者的家屬說，工業家們因感到彼得堡工人表示不滿，並宣布要以罷工來威脅他們，因而被迫派代表請求內政部長釋放我們。聽說內政部長對這些代表好象是這樣回答的，在大會上逮捕的人們，除了幾個人以外，將來都一律從獄里釋放。真的，在第三、四天上，除了我和加蘭尼、麥德維節夫以及另外一個同志以外，全都釋放了。

但在工人當中極不滿意的情緒還繼續着。選出的代表拒絕參加選舉，結果把選舉的日期推遲到1914年3月2日。選舉是在極不利于我們宣傳的條件下進行的，但布爾什維克究竟被選進保險總會和彼得堡委員會了，他們已照黨的指示去要求實行全面的社会保險了。

許多同志被釋放以後，當局便陸續傳我們4個被捕的人“帶着東西”到監獄辦公室。在辦公室我們才知道我們這幾個人是要被送到審前拘禁所了，這不是突如其來的一個不吉利的消息。因為在全體被捕者之中單只扣留我們4個

人不放，这个事实便表明偵探局和警察厅是有意叫我們真正坐牢了。

办完了例行手續后，便凭签字把我“移交”給专为押解我来的两个宪兵。他們坐在馬車的两边，而我則象要人似的坐在他們的中間。馬車的窗子上挂着窗帷，从窗帷里什么都看不見。我們在彼得堡街上轉弯摸角地走了很久，最后才到了什巴列尔納雅街上审前拘禁所的門口。

从馬車里下来，宪兵把我帶到監獄的管理处，又凭签字把我“移交”給看守們。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問我的話都問完以后，一个看守帶我到牢房去。我們順着一條无尽头的走廊和鉄楼梯走着。路上到处都安着鉄門。在每一道鉄門跟前站着一个人看守，他放我們走过去，立刻把鉄門又关上，插上很粗的門門。最后我們走到一个单人的牢房跟前。在这个时候，在我們旁边出現了一个帶着一大串鑰匙的看守，他放我進門后，馬上把牢房的鉄門鎖起来。

剩下我一个人以后，我把四周打量了一下。屋里有一張小鉄桌子、一把鉄椅和一張鉄床。所有这些家具都安在墙壁上，不能移动。在紧挨天花板的地方，高高地开着一个鉄絲网做的小窗戶，所以白天从窗戶里也只能透进微弱的阳光。在牆角靠窗子的地方，装着一个馬桶座子，上面吊着一个水箱。在对面的墙上安着一个小面盆，在面盆上面发出了金属水龙头的光。設備非常周到，什么事囚犯都不需要到牢房外面去。

晚上7点鐘，我听到每个牢房跟前都大声喊着“吃晚

飯”的聲音。門上遞飯的小窗戶開了，乒乒乓乓地聲音響了起來。我也拿起桌上放的一個鉄飯碗，由看守帶着的一個送飯的刑事犯把粥盛到里面。“晚飯”吃過後，我坐在床上沉思了一會兒：明天又開始新的一年了，1914年開始了。

我翻來復去地想起了往年過年時和同志們自由團聚的情形。每次過新年時人們總是有很多的希望。往常過年時，我們總是期望來年革命運動的規模更大些，但1914年，我想一定能來個真正的“革命的早春”。過去的一切涌上我的心頭，全身發熱起來了，不由得從床上跳了起來，高聲喊了一聲：“革命的早春萬歲！”突然在門上的“窺視孔”里不知露出誰的一隻眼睛，接着看守說：“開什麼玩笑呢？是睡覺的時候了！”

我當時毫不懷疑1914年將要帶來人類史上的一次最大的毀滅性的戰爭，同時把戰爭中的損失，合起來計算一下，一定相等于過去1,000年來在歐洲歷次戰爭中所遭受的損失。我在牢房裏坐臥不安地轉了幾個圈子，開始躺到硬鉄床上。

第二天，我在天明一醒來就馬上聽到隔壁房間里有人在牆上敲了幾下招呼我。監牢的常識我早已在斯巴斯克監獄學會了，所以我現在就和同志們“談話”。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給我賀年，問我叫什麼名字，為什麼被捕，及至我回答了以後，他們大家又把牢裏的規矩告訴了我一次。有幾個人警告我說，以後敲牆壁通話時要小心，因為常常可碰到專門分散到許多牢房當中住的奸細。

我隔壁两个牢房对我模棱两可的答复，使我有一奇怪的印象。但以后我調查清楚，所有的政治犯都是同刑事犯插在一起住的，这就是要阻碍政治犯們直接交談。我的隔壁也是一个刑事犯，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件事直爽地告訴我。

敲牆壁是严格禁止的，“談話”是偷偷的。到了第三天，我和看守吵了几句嘴。那时我不过輕輕地敲了一下水管，看守便打开递飯的小窗子阻止我談話，并且警告我說，下次如再这样，他一定报告看守长关我到单人牢房。

在这个新的地方习惯了，我开始想怎样充实孤独无聊的生活了。在审前拘禁所有当时認為相当不錯的一个圖書室，因为一切进步的出版社都認為把他們出版的書籍寄一两本到这里来是自己的責任。因此，圖書室大大扩充起来，虽然有一回把書籍总地清查了一次，但毕竟还保留下不少好書。我問清楚了借書規則后，就把給我的一張借書条子填好，第二天收到两本書。

另一种消遣，就是在監獄院子里每天散步一次，約10分鐘到15分鐘。在監獄的院子中間有一个同火警了望楼一样的高“塔”，每天輪流带单人牢房的人到那里“散步”。在塔周圍半徑的地方，圈着一道圍牆，这道圍牆形成了18个栏柵。在这些栏柵里犯人們也一个一个的散步。散步时卫兵在塔周圍巡邏，警覺地監視着散步的人們。

在这些栏柵中，有几个是能从我住的牢房里望到的。我知道爬到窗戶上了望是絕對禁止的，如果卫兵警告以后还

不从窗口馬上跳下来，卫兵是有权向犯人开枪的。但我还想望一下同志們，所以有一次我就抓住鉄絲网爬到窗戶上去。恰巧卫兵发现了我，他先是高声喊叫，繼則喀啦喀啦地推枪門。我看到这种情形，急得轉身跳到地板上。时常有犯人不听警告，不离开窗口而被卫兵打死的事。审前拘禁所的厚墙里面包含着不少的悲剧。

但尽管是用重重的牢墙把我們隔开，可是我們还是觉得相互之間有某种特别的、只有孤独的犯人才能理解的联系。在漫长的深夜里，当全牢寂靜无声，有时只有看守的慢步打破寂聊的时候，人們的神經簡直緊張到了这样的程度，只要听到有一点点叫声，全体犯人都會馬上奔到自己的門口。

我被捕后的两个月，在这同样的一个夜里，突然听到从远处傳来了断續的凄慘的呼救声。在这一瞬間，好象一声口令似的从每个单人牢房里发出了鈴声。但因为按了第一次电鈴后，受信机跳出来了，再按不响了，于是跟着鈴声就来了一片敲打鉄門的声音。大家敲了很久，及至看守走到每个牢房跟前安慰大家几句并說明这是一个到医院的病人喊叫以后，人們才停止敲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誰喊的救命声，我們不得而知。大概是看守毆打一个犯人吧！也許是要把一个判了死罪的囚犯拖出去，因此他喊出了救命的呼声。

在我进牢后的3个月头上，把我喊到办公室去了，最初是帶我到偵探局审問，几天以后又帶我到宪兵司令部审問。

在偵探局只問了幾分鐘。他們問我叫什麼名字，什麼職業，參加過革命組織沒有等等。

審問以後給我拍了照片。當我等着回去的時候，在我等候的那個房間里進進出出的至少有 10 個暗探，他們恬不知恥地拚命假裝在寫字台抽屜里尋找什麼東西的樣子，從頭到腳打量了我一下後很快地就出去了。這樣就可使偵探們差不多“認識”了所有解到偵探局的囚犯。

在憲兵司令部約等了 4 小時。我在一個小房子坐了一個半小時，最後才提我審問。一個憲兵帶我到憲兵上尉的辦公室，這個憲兵上尉客氣地讓我坐下，他自己還照舊忙他的公事。他辦完公事以後，掏出一包煙來，一邊點火，一邊也遞給我一枝。我謝絕了。

——“嗯，你怎麼會跑到我們這裡來的？”——他突然問我。

——“你比我更清楚——”我答。

——“是啊，我們現在了解清楚了——”好象沒有注意我的回答，他說。——“你已經參加了革命組織了。你這樣年紀輕輕的，前途遠大，可是你就這樣毀滅了你自己。我歷來總是為誤入歧途的青年們惋惜——”他接着說。你大概以為我是一個凶惡的反革命吧！其實我也是個革命家，不過，顯然，只是不象你那樣罷了。你呢，青年人，火氣一來就想一下子把什麼都毀掉，但我認為凡事都要慢慢的來。凡事都有它一定的时候。

憲兵同政治犯開始作這種親近的談話，是想騙取他所

要知道的消息。我覺得與他作任何討論都感到要作嘔。我請求他直截了當地轉到本題，說明提我到憲兵司令部的原因。憲兵上尉見從我口里得不到什麼，於是就把一份訊問表交我簽字，然後按了一下電鈴。我就跟着他喚進來的一個憲兵出去了，那個人把我領到一間空房子里，在這間空房子里有些穿便衣的可疑的人竄來竄去。他們叫我坐下又用閃光給我拍了几次照片，隨後叫我按了手印，又送我回到審前拘禁所。

又過起白天單調無聊，黑夜陰森寂寞、度日如年的生活了。沒有再提我審問過。在1914年上半年，我出了監獄，被剝奪了“在俄帝國58個地點”居住的权利。同我一道拘留在監獄里的另外3個同志，也是這樣判決的。

在“58個地點”中包括着大大小小的城市，其中當然有彼得堡和莫斯科。後來，這些“地方”又依據內政部特別的命令增加到100個。政府採取這種手段的目的，是在於禁止我們和工人接觸，和“政治上不可靠”但又沒有充分證據來定罪的人們接觸。

出獄時，獄里的人問我到什麼地方去。我想了一下說，我要到里加去，因為不知道為什麼里加不包括在“禁地”之內，所以里加便成了從彼得堡放逐的不可靠的人們的避難所。限定我3天以內出境，離開彼得堡，但我不捨得與它分別。因此我經過一番考慮並和同志們商量了一下後，決定搬到彼得堡市郊小湖的避暑地，因為當時在那裡也住着“阿瓦斯”工廠的幾個同志，並且同我一樣都是被逐出彼得堡和

“若干地点”的。

我在小湖租了一间小屋子，决定头一个时期决不到彼得堡去。每逢星期日，有时在一星期以内，还有同志从彼得堡来。有时有一大伙认识的学生和青年工人来了，于是我们就在郊外许多湖泊交错的地方漫步游行。因此，这个地方就获得了小湖的称号。

在下一个星期日以前，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于是我就读了许多书，或者到附近的一个小湖去蹓躑一下；沿湖是一片葱翠稠密的松林。这里还有一片公墓。在松树之间隐隐约约地现出了坟墓上的十字架和纪念碑，而在十字架和墓碑的前面有死者的亲属精心制造的“长明灯”。我从小就讨厌纪念死者的一切东西，但湖上的大好风光和松林飒飒的声音，却使我心曠神怡，结果我沿湖岸蹓了很久，完全忘记了这里原来是一个公墓。

但我欣赏湖景的日子不长。在我来到以后的第三个星期的头上，女房东告诉我：“你知道吧，青年人（她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和父名），你不在家的时候，警官已来过两次了，他什么都问到了，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干什么的。”我说：“我不是同你说过的吗，我是休假的，在这里休息的。”“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回答他的，——女房东说——但他又来了。”

为了避免麻烦，我马上收拾东西搬到靠芬兰边境的列瓦绍渥车站。那时我搬家是没有任何困难的：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提起唯一的一只装东西的皮箱就走了。

不久同志們介紹我到“帕尔維埃尼安”工厂的伤病互助会担任秘書。我同意了，于是化名为茨維塔耶夫开始工作。但我还没有很好地熟悉工作的情形，就有人告訴我厂主派在伤病互助会的代表兼理事会主席，是与偵探局有关系的，同时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常常来看他，很注意秘書的行动。因此为了不再尝鉄窗风味，我不得不离开“帕尔維埃尼安”工厂。

一星期过后，工人們請我当了“斯考洛哈德”厂伤病互助会的秘書，該厂設在莫斯科关，当时工作的人約有5,000人。在这里，我参加了布尔什維克党的地下区委会，开始参加了被捕以来中断了的党的工作。

十一 工人运动的高漲。七月事件。 战争的爆发

与1913年相比较，1914年的革命运动已向前远远地迈进了一步。1914年1月9日在彼得堡约有14万人罢工。那天的罢工运动也席卷了俄国的其他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如里加、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华沙等等。莫斯科有5万人罢工。

2月23日（3月8日）无产阶级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布尔什维克的杂志“女工”、“真理之路”以及职工会的杂志都出了特刊，内容几乎完全是纪念这个节日的。

女工克拉弗基雅·尼古拉耶娃（渥里纳雅）在“真理之路”上的一篇文章“我的庆祝”中写道：

“妇女节在俄国。这几个字有多么深刻的意义，它在俄国女工的心坎里激起多么光辉的希望。我每逢想到俄国女工和俄国妇女开始慢慢地摆脱可耻的奴隶制的沉重枷锁而稳步地但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向光明的未来迈进，即向她们能够表现出朝气蓬勃的、鲜明的自由妇女形象的未来迈进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热烈的爱和无限的喜悦。

俄国女工也决定同她们西方的同志们一道纪念自己的‘妇女节’了，所以这一天将是她们的力量、她们的斗争以及

她們努力前进、爭取摆脱政治上、經濟上和精神上奴役的主要标志。在这一天，俄国女工自己要用最簡明扼要的話說出她是怎样生活的。她回忆起自己不好修飾、不大愉快的童年，回忆起自己从几岁起就懂得了劳动和穷困。她講到她为了刹那間的狂乐而被无情的人們——木偶所糟踏所侮辱了的美妙的少女的幻想。”^①

这一天，在許多地方都举行了秘密會議，許多女工都出席了这些大会。

过了一个时期，在彼得堡和里加先后发生了惊人的事件，这些事件又使工人群众感到痛心疾首。橡胶工厂不合卫生的工作环境和他們所采用的各种次等的原料，使大批的工人中毒。在3—4天以內病倒了数百女工，因而不得不把女工們送进医院。

这种情形，在棉織、麻織工厂，在小奧赫汀斯克織布工厂，在“新阿瓦斯”厂和巴兰諾夫斯克等厂也有。在里加的“普罗沃德尼克”工厂也发生了这种事情。

在彼得堡开始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工人群众唱着革命歌向市中心挺进。示威游行的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些人受了伤。

资产阶级的报纸煽动偵探局逮捕革命工人，宣称中毒事件是由某些革命委员会制造出来的。

社会民主党党团向国家杜馬質問这件事。

^① “真理之路”，1914年2月22日。

各工厂厂主會議以宣布联合关闭工厂答复罢工运动，因此受到关厂威胁的工人竟达7万人之多，主要是金属加工工厂的工人。最大的一个工会——五金工人工会被封閉。各厂的零售商店停止卖给工人日用品。

自由资产階級一方面害怕无产階級更加不滿和革命运动的高漲，一方面又想利用工人来加强它的影响和統治，所以它便羞羞答答地装作保护工人的模样。俄帝国技术协会撥了約6万卢布来救济失业工人。不久，彼得堡市杜馬也为同一目的撥款10万卢布。①

“真理报”在这个时候写道：“工人問題又严重地影响到俄国生活的一切方面。资产階級的报纸、国家杜馬、部长會議、市杜馬、黑色百人团，进步党都忙着討論工人問題，至于工厂主們和警察更不用說了。上述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按照各自的心意来为公众謀福利。厂主协会把几万工人赶到街头，而警察則自然而然地‘分散示威游行的群众’和‘警卫’工厂。民族党和黑色百人团拚命散播恶毒的誹謗，企图使工人群众陷于混乱与失望。定出了与罢工斗争的新办法。……自由主义的报纸惊惶失措地談論这么一个事实：‘工人的力量不仅沒有削弱，不仅是加强，而且随着他們力量的加强，騷乱也随之而变本加厉起来了，过激分子的影响大大地增长了。’因此，我們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的最

① 可是工人并未領到这些錢。預算委員會在討論撥款問題时認為“沒有这种需要”，所以决定停止发放救济金。

大机关报就登載并号召工厂主們不論何人都应当‘注意这个事件的意义’。”

因中毒事件而在工人当中引起的罢工，只是遵照“真理之路”报的号召才停止的，“真理之路”报代表了彼得堡委员会的观点。

彼得堡罢工运动的新的高涨一开始就与五一紀念节联系着。从早晨起，全市已有25万余人罢工，全俄国有50万4千多产业工人罢工。繼彼得堡之后而来的五一罢工运动，广泛地籠罩了南高加索（86,000人）、里加（44,000人）、莫斯科（40,000人）、列維尔（16,000人）、哈尔科夫（15,000人）、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的罢工都与政治示威游行相輔而行。在許多年代的反动过去之后，梯弗里斯和巴庫亦卷入革命运动。

五一罢工示威游行使統治階級极度不安，普里什科維奇在杜馬的演說中公开宣称，国内的局势又很象1905年革命的前夕。

5月底，在南高加索的巴庫油田爆发了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有5万工人。罢工工人向石油工业家代表大会的理事会提出了60个政治經濟性质的要求：如增加工資，改善飲食和住宿条件，建立工人住宅区，实行8小时工作制，完全取消額外工作，以及正式承認五一节和实行普及教育等等。

上述这些要求証明了巴庫无产階級政治覺悟的提高，可是石油工业家对这些要求还是断然拒絕，强迫工人馬上

停止罢工。但罢工还是没有停止，于是企业主们便向工人宣布全体解雇。事件带着威胁的性质。司法当局支持石油工业家，开始将被开除的工人从房子里成批地赶走，而油厂当局则将工人所有的东西一律从工房搬走，捣毁了炉灶。房子里断了电，为了断绝工人及其家属的饮水，连自来水管也一律关闭了。与此同时，又加强了警察的高压政策。罢工的工人大批被捕。石油工业工人的工会被查封，工会的积极工作者被逮捕。为援助当地的警卫部队，调来了哥萨克骑兵。罢工在紧张的气氛中继续下去。

6月20日在城内发生了工人的大示威游行，参加者20,000人。调来增援警察的哥萨克骑兵冲入示威游行的队伍，用马鞭鞭打工人。全城宣布戒严。

全俄国的劳动人民都极注意油田所爆发的事件，表示自己与巴库工人团结一致，表示同情。为罢工工人进行募捐。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手段来镇压巴库无产阶级的罢工。遵照尼古拉二世的特旨，命内政部次长德茹考夫斯基将军和警察厅厅长为全权代表赶赴出事地点相机行事。对工人的新的压迫开始了。

在布尔什维克的“劳动真理报”（该报是在“真理之路”封闭后出版的）上登出了许多决议，在这许多决议中，全俄国的无产阶级一致抗议对巴库罢工工人的残酷惩罚。形势紧张万分，大家都感到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7月3日，在彼得堡，普梯罗夫厂的工人提前下工，召开了群众大会。警察马上出现，要求立刻散会；但工人拒

絕，于是警察关起工厂的大門开始用皮鞭鞭打工人，其后又开枪射击。打伤的几十个人被拖到警察分局用冷水澆醒。普梯罗夫厂夜班的工人表示抗議，拒絕工作。

关于枪杀普梯罗夫厂的工人的消息，当天晚上就象閃电一样很快地傳遍了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激起了大家的公憤。彼得堡的工人区很久沒有这种緊張状态了。到深夜里，在馬路口还看到慷慨激昂的工人群众在談論沙皇政府的公然挑衅。

翌日，7月4日，在“劳动真理报”上登出了在普梯罗夫厂发生惨剧的消息：

“枪杀普梯罗夫厂群众大会上的工人。据初步統計，死者2人，伤者50人。

昨日放工前两小时，透平間、炮塔間和其他車間的工人停工到工厂的院子当中开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工人总計12,000人。演說的工人們詳細叙述了巴庫罢工工人的情形，号召普梯罗夫厂的工友們援助罢工工人。但快散会的时候，原先从早晨就藏在工厂里的大队騎馬的警察和徒步的警察在工厂的院子中出現了。

警察开始鎮压手无寸鉄的工人。在鎮压中使用了馬鞭。指揮警察大队的軍官要求群众迅速散会，但就在这个关头却把工厂的几道大門全部关闭，无路可走了。

工人們張惶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警察开枪了。向工人連发了两排子彈。

这两排子彈打死了2个工人，打伤了50个工人。部分

工人忿而抓起石子自卫。

在工厂外面和大街上，也有毆打工人的事情发生。逮捕了65人。这些人被当局派大队軍警押到納尔維的警察分局。”

从7月4日的早晨起，在彼得堡已約有10万工人罢工。罢工者唱着革命歌曲由这个工厂跑到那个工厂，由这个作坊跑到那个作坊，使許多还来不及参加罢工的工人也停工了。

彼得堡委员会发表了“告全彼得堡无产阶级書”，其中說：

“沙皇政府的卑鄙愚弄手段达到极点。全俄国的工人阶级都已起来为人类的生存而斗争。到处都用馬鞭和枪彈、監獄和流放来回答工人的要求……一群醉熏熏的警察匪徒枪杀普梯罗夫厂的工人，只不过是执行沙皇政府的意志。彼得堡的工人阶级以自发的憤慨心情来回答政府企图对先进工人重演連納惨案的行动。我們應該向这群压迫人民的匪徒表明，工人阶级是准备还击他們的，工人阶级再也不允許他們血腥屠杀了……讓抗議和憤怒的呼声响彻全彼得堡，响彻全俄国吧！我們支持已經勇敢地展开的抗議罢工，我們号召你們，同志們举行3天的罢工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团結，来表示自己对整个沙皇君主专制制度的憤怒。……

3天群众性的政治抗議罢工万岁!!! 打倒沙皇劊子手和沙皇君主专制制度!!! 光荣和荣誉属于牺牲的同志們!!!

爭取民主共和國的鬥爭萬歲!!! 社會主義萬歲!!!”^①

彼得堡的無產階級極為憤慨。很快就表明，運動并“不
限于”3天的罷工。在7月4日的下半天，所有最大的工人
區域都參加了罷工。工人繼續與警察發生衝突。最大的衝
突發生在莫斯科區和維堡區，那里的警察向工人射擊，工人
用石子擊退了警察的進攻。

7月4日這一天，人心惶惶不安。夜里一點鐘，我回到
在列瓦紹渥車站住的地方。第二天天一亮我又回到彼得堡。
我在離芬蘭車站不遠的地方買了一份“勞動真理報”，如飢
似渴地翻閱了一下。幾乎整幅報紙都是講最近發生的事件。
在第一版上端用黑框子圍着幾個大號字：“槍殺工人的事昨
天還在繼續進行着”。在社論中說：“憤懣不平正籠罩着彼
得堡的工人區域。工人們在普梯羅夫廠的大院子里流的鮮
血使彼得堡的無產階級振作起來。原先為對巴庫罷工工人表
示同情的一小時的罷工，以閃電般的速度轉變為抗擊反動
派的總罷工，因為反動派竟敢命令他們的警察槍殺參加和
平的群眾大會的人們。現在，在數萬人的群眾大會上所通過
的決議，已決定要舉行3天的罷工了；這些決議充滿了慷慨
激昂的精神，充滿了激憤之詞。在街道上衝突頻起，工人們
被迫用一切方法來拯救自己的生命，以防警察大隊的進攻。
在彼得堡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已有幾個同志被打死和幾十

① “1907—1917年彼得堡布爾什維克的傳單”，俄文版第二
卷，第108頁。

个同志受伤。黑色百人团的报纸似乎已预感到这次事变，因此它在前一天提出问题道：‘火药袋里的火药不是潮湿的吧？’他们现在提出的这个问题，正如彼得堡无产阶级记忆犹新的1905年的‘不要吝惜子弹’的命令是一样的。现在，他们又在彼得堡大街上毫不吝惜地使用子弹了。但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已经以汹涌澎湃的罢工来证明，在无产阶级的‘火药袋里’团结、鼓舞以及决心为美好的未来舍身奋斗的火药是不会潮湿的。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又使那些企图把本阶级的幸福和权力建筑在民主的阶级的容忍上面的人们之希望化为泡影了。”

我来到了“斯考洛哈德”工厂。在市中心大街上到处都看到有一小群人在谈论事变。

“斯考洛哈德”厂与五金工厂比较起来是最落后的工厂，在这一天它还没有参加罢工。我们小组使它停工的一切努力终未得到结果。但是本区已罢工的其他工厂的工人，特别是邻厂列奇金厂的工人们，却在这方面帮助了我们。他们包围了工厂，提议斯考洛哈德厂的工人们停工。尽管工厂行政当局拚命反对，但工厂的几道大门打开了，结果厂里的5000工人群众洪水似地到街上汇合起来了。当斯考洛哈德厂的工人们跑到厂外时，其他工厂的工人们都聚集在工厂的大门两旁。

快到中午的时候，城里的工人示威游行已开始。与警察宪兵的冲突越发频繁。第二天本是星期日，但街道上的风波并未平息。在工人区，正在加紧准备一次团结一致

的示威游行来回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普恩卡莱于7月7日到彼得堡的“友好访问俄国人民”。

除彼得堡以外，罢工运动广泛地扩展到莫斯科区、里加、哈尔科夫、梯弗里斯、以及俄国的其他许多城市。在莫斯科，电车停止行驶。黑色百人团的报纸狂暴地喊叫革命已经逼近，要求警察宪兵采取最坚决的行动对付工人。

从7月7日早晨起，彼得堡的无产者已有15万以上参加了罢工。所有的工厂差不多都停工了。

传闻政府打算把1905年因镇压革命而闻名的谢米诺夫团调来帮助警察和哥萨克骑兵，但是谢米诺夫团的士兵们拒绝了。其他兵团，政府是不敢调动的，因为怕他们与罢工工人联合起来。这些传说更加鼓励了工人。

当彼得堡大街上工人举行示威游行以及同警察冲突的时候，俄国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却在幕后谈判和准备战争。7月7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普恩卡莱的彼得堡之行，就是为迅速开战准备“社会舆论”。黑色百人团和资产阶级的报纸日益公然无耻地挑拨民族的情感。但政府当局所不放心的，是怕“法国来宾”看到了彼得堡的风潮，恐怕他怀疑俄国的军事实力。国家杜马主席罗将考事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叙述这个时期的情形时说：“首都的风潮非常厉害，以致不得不派强大的武装保护总统穿过全城。”为使工人的示威游行不能在市中心举行，整个涅瓦大街和与它相连的各马路上都接连不断地布满了哥萨克骑兵、警察和士兵。他们为欢迎“贵宾”，从“俄国人民协会”、贵族、侦探和便衣警察中拉

夫似地驅趕各色各样的人裝作“人民”的代表。其后便开始了盛大的午宴和晚宴，在这些宴会上，在高呼“上帝，保佑沙皇”的声中举杯庆祝“两国人民的友好同盟”和“对共同敌人”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在涅瓦河上停泊着来彼得堡作“友好访问”的法国军舰，上面飘扬着五光十色的旗帜。

但在这个时候，首都的街道上还继续举行工人的示威游行。市内的电车停驶。罢工最齐心一致的是维堡区，那里的一切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组织示威游行，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进来。

由于工人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结果在彼得堡的其他地方也与警察和哥萨克骑兵发生了冲突。在最近几天以内，医院里收容了许多被枪弹击伤和被马刀砍伤的工人。

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公布了彼得堡市长对工人采用“最激烈的手段”的宣言。但罢工和示威游行还是同从前一样热烈。工人对警察和哥萨克骑兵的抵抗日益坚决了。

在彼得堡的街上，工人们开始利用抛锚的电车、木桶和电线竿子构筑障碍物。他们向瓦西里耶夫斯克岛的大街推进，向谢斯特罗列茨克铁路推进，使那里的火车不能行驶，向沙姆普索尼耶夫斯基大街和维堡方面的其他街道推进。

沙皇政府决定采取一切手段来扑灭革命运动。向工人区域调集了许多队警察和哥萨克骑兵。逮捕进步工人的事相继发生。

7月8日上午10时，实力雄厚的警察宪兵大队包围了

“真理报”的印刷厂和該报的編輯部，并加以搗毀。所有在編輯部內的党的領導同志均被當場逮捕。

彼得堡和巴庫的罢工运动，以及沙皇政府对罢工者的殘杀，激怒了俄国其他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在莫斯科有63个以上的企业罢工，其中有梅第奇斯基車廂制造厂、“波罗姆列伊”工厂、五金工厂等等；在7月8、9两日內，電車工人亦参加了罢工。電車一条长綫似地停在莫斯科的許多街道上。

在里加，俄国波罗的海車輛制造厂、里哈尔德·波列工厂、罗森克兰茨厂、“沙拉曼德尔厂”、“黄麻織造厂”以及其他許多工厂都举行了罢工。工人在城里的馬路上举行示威游行。

在哈尔科夫、梯弗里斯、敖德薩、阿斯特拉汗与列維尔也举行了罢工。一言以蔽之，在俄国大大小小的工业中心地点，巴庫事件和彼得堡事件都引起了工人群众的共鳴。

沙皇政府已不相信用警察的力量可以对付彼得堡的工人革命运动了，它对这件事已失掉了信心。7月10日，它把騎兵召至彼得堡，决定宣布首都进入非常紧急的警备状态。一切工人报纸連孟什維克的报纸在內都被查封。工人組織、工会及文化教育协会繼續被搗毀。

厂主协会又决定宣布同盟歇业，但由于国外事件酝酿成熟，政府便匆忙地解决了这次“冲突”。工厂主們不得不邀請工人們复工。

工人情緒高漲。大家都很满意 1905 年以来無論从革

命运动的規模或热情來說都是从未有过的胜利。工人們說，下一次該是拿起武器最后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了。而且在事实上，不論就对专制制度的憎恶而言，抑或就无产阶级群众的紀律性和革命性而言，都已非常之大，以致我們当中誰也不怀疑不久一定要来一次决定性的革命事件。然而战争开始了，沙皇制度又得以把它的寿命苟延到 1917 年。

从奥匈帝国一开始向塞爾維亞宣战并在它們的边境上发出了第一声炮声时起，黑色百人团资产阶级报纸便馬上改变口吻，高呼沙文主义。遵照当局的命令，并在沙文主义鼓动的影响下，在彼得堡的各大中心馬路上开始进行招兵，多半是从“俄国人民协会”的会员、小店員、偵探、便衣警察、貴族、资产阶级的儿女当中招募，从一部分知識分子以及普通的居民当中招募。当时这种分子很多。这一群三教九流的社会渣滓，在手里拿着三色的旗帜和沙皇的肖像在街上游行，高呼“烏啦！”“打倒德国！”“消灭德国人！”高唱着“上帝，保佑沙皇”的歌曲。他們在街上碰到行人，一定要叫他們脫帽面对沙皇的象，誰要是不服从，他們便毆打誰。

以前还对沙皇政府耍反对派手腕的自由资产阶级，現在是完全效忠于专制制度的三色旗帜了。黑色百人团散发的各种“紧急号外”不胜枚举，这更加使沙文主义者的情感火上加油。

在这些日子当中，有一次我坐电車到芬兰車站。在鑄造厂大街上有一群人拿着沙皇的肖像和国旗走着。电車开得慢了。我站在电車前头看着这些野蛮猖狂的烏合之众。

“脫帽”——突然从这些烏合之众中气势汹汹地叫着。

站在电車前头的人們，除我和另外两个人以外都听从地脫了帽子。这时又听到这群人指着我們說：“把他們拖到这里来，拖到这里来，我們就在这里惩治他們一下！”同时有十几个粮食商人、“俄国人民协会”會員向我們这方面伸出粗大的拳头。幸亏电車走快了，我們沒有被这群野兽毒打一頓。

但是在工人区域中，凡是沒有沙文主义情緒的标志的地方，黑色百人团就不敢插手。在那里，人們又怀疑又憤恨地注視圍繞着战争所掀起的喧囂，預感到战争必然会給劳动人民带来如何的不幸。沙文主义者中無論是誰要想带头到工人当中去鼓动，那末这些人多半是会飽尝几拳，抱头鼠竄而归的。

尽管地下工作的环境特別困难，彼得堡委员会在这个时期还是发出了“告全体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傳单。其中說：

“同志們！血腥的幽灵在欧洲游蕩着。資本家們的貪婪的競争、武力和掠夺的政策、各王朝之間的报复，以及在日益高漲的国际工人运动面前害怕丧失特权的恐怖心理，推动了各国的政府走上了軍国主义的道路。……

工人在彼得堡大街上流的血还未洗淨。昨天还被宣布为‘內敌’并派野蛮的哥薩克騎兵和忠实的警察来对付的全体工人的彼得堡以及同他們在一起的全体劳动人民的俄国，今天却又号召它們保卫祖国了。士兵和工人們！他們是

号召你們为哥薩克騎兵的馬鞭送死，为搶杀飢餓的农民和工人的祖国送死，为在監獄里折磨自己的优秀子女的祖国送死。不，你們必須这样宣布，我們不愿意战争……

世界工人的团结万岁！……打倒战争！打倒沙皇政府！革命万岁！……”^①

7月18日俄国开始总动员，同时宣布彼得堡进入军事状态。在房屋的墙壁上贴满了五光十色的号召参军的命令。警察局变成了招兵站，并且通夜工作着。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动员在疯狂地进行着。在集合地点的周围聚集着入伍者的家人和妻子，他们流着眼泪，咒骂沙皇和一切扩大血腥事件的祸首们。

由于彼得堡的动员，又掀起了罢工运动，参加罢工的工人，据官方统计，有27,000人。罢工的人们喊着“打倒战争！”的口号，举行了示威游行。

同时在市中心加紧了沙文主义的宣传，结果事情演变到屠杀的地步。在彼得堡捣毁了德国的大使馆，而在莫斯科，则捣毁了德国的许多工商企业。

全城开始传来了最可怕的消息。据说，在某一个地方，由于几个高级军官的叛变，我军遭受惨重的失败，结果德国海军已向喀琅施塔得挺进，而喀琅施塔得也将在今明两天内被德军占领。尽管报纸担保所有这些谣言都是德国谍

① “1907—1917年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传单”，俄文版第2卷，第113、114页。

报人員放的空气,但彼得堡的老百姓还是惊惶不安!资产阶级开始从彼得堡运走他們的財宝。

一切觉悟的工人都在研究对战争的态度問題。当人們开始說战争不可避免时,进步的工人有这样一种信念,以为其他国家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不許发生战争的。所以当我們大家最初突然听到第二国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后又是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投到他們的帝国主义政府方面时,我們大家的失望和疑惑是不难想象的。

流血事件的規模越来越大。在战场上已經发出大炮的不断轟鳴。这样,在第二国际社会党积极参加下,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下,劳动人民群众是替占統治地位的帝国主义贪婪无厌的野心互相敌对,互相撕杀的。

十二 第三次被捕与流放西伯利亚

同时，政府为了用镇压群众的手段来保护它自己，还把七月事件以来对布尔什维克秘密组织所进行的压迫和蹂躏继续下去。布尔什维克的报章杂志停刊，几乎所有的工人文化教育协会和工会都被查封。

正当沙文主义气焰万丈的时候，从国家杜马讲坛上发出了布尔什维克党义正词严的呼声。在国家杜马于7月26日召开的会议上，当杜马的一切党团，一直到劳动党为止都宣布和政府一致坚决还击敌人时，布尔什维克的党团发表了对战争态度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说：“当政府不是人民自觉意志的執行者，当人民还受着它的奴役，当战争的一切重担都压在民众肩上，当民众没有丝毫权利，当工人和农民的报刊被封闭，当工人的组织被捣毁，当监狱里挤满了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奋斗的战士，以及最后当我们刚刚遭受到了军警对彼得堡工人的枪杀的时候，是谈不上人民同政府的一致的。同时俄国的无数遭受民族压迫、并在暴力与压迫的空气中生活的民族，也谈不到他们同政府的一致。”

这个宣言虽引起了黑色百人团杜马中的多数党的愤恨，但却受到了俄国先进工人的欢迎和拥护。

随着许多积极干部的被捕，我们组织的队伍减少了。联

系被切断了。秘密工作必須格外小心。但尽管受到了这一切阻碍,从8月上半月起,工人区域的生活又开始逐渐走上轨道。彼得堡党委会的传单又出现了,在这个传单中说:帝国主义战争阻止不了无产阶级同沙皇制度的斗争,反之,它一定在党的久经考验的旧口号下加强起来。

我们的工作停顿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在一个同志的住宅里召开了我们区的党委会秘密会议,在这个区里,我参加了斯考洛哈德厂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到会的共有8人。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是讨论我们组织今后在战时新环境下的工作计划。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只是顺便谈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在我们当中引起不一致的意见。最注意的问题是伤病互助会的问题,当时我们大家决定努力使理事会中的理事和秘书尽可能地多选些我们的人。

在斯考洛哈德厂的伤病互助会中工作的,有几个布尔什维克,其中有一部分是理事。战争开始后进行党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但我们还是常常借口讨论会务把党的工作在开会时讨论一下。我的处境不大好。我在彼得堡是不合法的,每天乘火车到列万绍涅是极不方便的。侦探和宪兵时时守在芬兰车站上,非常注意出境的旅客:因为革命组织正是通过芬兰同国外取得联系的。为了不使“民主化的”装束引起人们对我的怀疑,我决定稍微“打扮的漂亮些”:买了一件新的大衣,一套衣服,开始常常穿硬领子的衬衫。

党的工作差不多需要从头整顿。许多时间都是用来恢复因组织破坏、发生逮捕和动员参军后所打断了的关系。偵

探局追捕自由活动的布尔什维克，而政府则想借故完全消灭国家杜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因为它在杜馬中的发言能推动工人群众組織起来反对战争。

政府抓住党团成员們在杜馬内的反战言論以及他們在工人当中所进行的反軍国主义的宣傳，就以叛国的罪名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成員們。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①組織立刻为这个事件呼吁。彼得格勒委员会用很大的力气才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表现了国内无产阶级对沙皇的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的忿怒。宣言中说：“在11月5日的夜間，那身上沾滿了鮮血并把为美好的将来而奋斗的民主战士杀害了的卑鄙的沙皇政府，那把无产阶级在第二届杜馬的代表和它的成千的优秀儿女用苦役折磨尽了的劊子手政府，那多少年来喝了許多人民的鮮血的政府，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代表們关到潮湿的地下室了。

专制政府竟敢这样大胆无耻地对付工人阶级3,000万人的杜馬代表。……

俄国‘宪法’的假面具又一次地被揭破了，而且在这一次是被彻底揭破了。在工人阶级和全体民主人士的面前，把成立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和召开立宪會議的問題完全提出来了。”

在宣言中进而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号召工人們举行一天罢工和群众集会来抗議沙皇地主偵探卑

① 战争开始时，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

鄙无耻的不法行为。”①

但組織总罢工的事是很困难的。政府由于怕发生罢工，早已調动大批的警察到各工厂戒备去。但我們发表的宣言却达到另一个目的：它揭穿了沙皇政府对布尔什維克党团成员們的譏諷，再一次地向全体劳动人民暴露出沙皇专制制度的丑恶面貌。

逮捕积极工作人員的事并没有停止。奸細协助着警察。我也时常看到工厂大門口有些可疑的分子。有一次，我坐的电車快走到伤病互助会办公室时，就看到紧靠办公室的門口站着两个形迹非常可疑的人。我决定再过一站下車，但他們发现我了，所以我从电車上下来时，他們已向我迎面走来。两个盯哨的偵探在一起，永远是必然被捕的先兆。街上很凄凉。要想躲避他們并使他們不更加怀疑我起見，我装成毫不注意他們的样子，一直向伤病互助会那个方向走着。两个偵探同我并排走着，突然站住了，細細地打量了我一下以后就走开了。我为提防起見，决定装几天病不到伤病互助会去。

不久，我又决定从列万紹渥到彼得格勒。这时我已同布尔什維克的軍事組織建立了联系，并从他們那里拿到了在壮丁当中散发的反战傳单。在我动身的前一夜，交給我一包号召軍隊援助无产者群众与沙皇制度斗争的傳单。这些

① “1907—1917年彼得堡布尔什維克的傳单”，俄文版第2卷，第124、125頁。

傳單是必須散发到彼得格勒警备区的陸軍部队的。

我决定在休息以后，先“空手”坐火車到彼得格勒去。我想知道一下各方面是不是都平安无事，所以我就先把傳單藏在乡下別墅的一个耳房的牆边，并抓了一些土和牛馬糞掩盖起来，准备下次带走。

晚上决定召开伤病互助会的理事會議，并由我在会上就几个問題講話。散会后，我乘電車走了，車到塞納廣場以后，我准备沿着高洛哈瓦雅街步行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公园。在光綫暗淡的一条大街上，比肩接踵的都是来来往往的行人。我还没走到市政府办公厅的大厦跟前，突然覺得有人紧紧地拉住我的一只手。我轉身一看，原来是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在离我們不远的崗位上，站着一个人武装的警察，在发生什么急事时，暗探們是可以喊他来帮助的。我没有武器，抵抗是无用的。

——干什么？——我厉声問。

——你，你……被捕了——一个偵探喃喃地說。

我請求他們說明逮捕我的原因，拿出拘票。其中一个偵探只掏出了他的偵探証，但不肯說明逮捕的理由。他們把我帶到一个最近的警察分局。在路上走的时候，两个偵探一边一个，抓住我的手。

在分局里，把我身上搜查了一通，拿去口袋里所有的东西，其后把我关到一个小的拘留室中。我从一堵比較薄的牆壁听到一个偵探給偵探局打電話，高兴地报告他們逮住我的消息。过了两小时，在夜間把我解到斯巴斯克監獄，关

在一間单人牢房里。

第二天，把我解到偵探局，当时那里已有許多被捕的人，同时还有几个同志是同我在一起做革命工作时認識的，其中有我經常会面而在法俄工厂的伤病互助会当秘書的伊万·第托維奇·莫洛索夫。

提我审問了。一个穿着便衣的偵探宣布，我的罪名是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同时声明偵探局已有关于这件事的相当材料。我要求拿出控告我的書面証据，这个官僚回答說：

——到必要的时候，我們自然会証实的。你的案子要依法处理，但因为在战时，一定要重办。

我觉得他們控告我的一切罪状都是根据偵探走狗的报告。至于我这个在 58 个地方被剥夺了居住权的人怎样又到了彼得堡的問題，不知偵探为什么一句話也沒有問我。

問罢又过了两个鐘头，他們把我从牢房提出来由宪兵解到审前拘禁所。在我住的“別墅”也仔細搜查过了，但沒有找到絲毫东西。我自己藏的那些傳单，还照旧放着沒有被发现。

这一次，我看見审前拘禁所就好象是看見了一个“老相識”一样。从前我在这个監獄里过的几个月的生活，至今記憶犹新。宪兵們把我交到獄吏的手里并把“移交”的例行手續办完后，又象从前一样，有一个看守拿着一大把鑰匙走到我跟前，喊我跟着他去。我們走过前面敞着的几道鉄門，上了監獄三层樓上的走廊，走廊的一面是伸展着的一条长鉄

栏杆，另一面是一排单人牢房明晃晃的铁门，在这些铁门上，都有一个值班看守监视犯人的“窥视孔”。最后，我们停下来了，值班看守打开一个空房间的門让我进去，砰然一声把門关上。

当天我把隔壁的两堵墙轻轻地敲了几下，我知道离开我再隔一个房間是关着斯·彼·麦德威节夫。我们社会民主工党第四届国家杜馬党团被判流放的成員們，也关在这里等候解往西伯利亚。麦德威节夫把牢监里的一切情形都“告诉”了我。似乎审前拘禁所里关的政治犯大部分是布尔什维克——专制制度最可怕的敌人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敌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党员当中被关到监狱中的，只是工人的个别代表，他们不管其领导机关的立场如何，继续努力革命工作。

大約有两个月，沒有人送东西给我或来看我，因为我沒有住在彼得格勒的亲属，而外面自由的同志們，很久不知道我被关到哪里去了。单人牢房规矩极严，沒有丝毫可能知道一些外面的消息。只要同志們用牢里的暗号偶然传达一些消息，就認為滿意了。因为 15 分鐘的散步，是在监狱院子里的一个宛如三角形的“小箱里”进行的，所以也沒有任何希望看到其他任何一个同志。我在监禁的整个期間，只有两次看到过認識的人。一次是有一个同志在我住的牢房外面敲了几下，要我赶快爬到窗口上。我立刻两只脚踏在抽水馬桶座子上，抓住铁丝网，把头伸到窗子跟前。在监狱的院子里，我看到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在一个“小箱里”跑来跑去。

但卫兵大声发出警告，并端起枪来把枪口朝向我了，結果我不得不馬上跳下来。第二次是为了一件什么事喚我到監獄的辦公室的時候，當時因為有一個看守押着我走过走廊，我便看到在一個牢房的門里面站着我們的兩個代表巴達耶夫和沙高夫。我們彼此默默地微笑點頭，表示問好。

不久，第二次傳我到偵探局審問。審問我的一個偵探長一再肯定說他們已經有了我參加社會民主黨組織的証據，一会儿用殺頭槍斃威脅我，一会儿又勸我承認，說是承認了可以減輕“罪名”。我堅決否認一切。審問完畢後，又把我解回監獄。

我在牢里仔細地思索我這次被捕後的結果可能是怎樣的，同時我也不懷疑偵探局是掌握了參加革命工作的証據的，雖然很不完全，但究竟也不在少數。

在這個時期，政府判決的案子，多半是不經過司法手續的。所以偵探局決定把其他5個被捕同志的案子（其中有伊·第·莫羅索夫）和我的案子歸并到一塊解決，同時特別請示內政部，准予特別會審我們的案子。我們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北部的危險。

偵探局長包波夫上校對我們的案子還另外附了一個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根據他對聖上忠實的奴才觀點來說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革命事件。他雖竭力低估了戰前工人運動的規模和意義，但也不得不承認，不論是沙皇政府對罷工工人的殘酷懲治，不論是對布爾什維克組織的破壞，不論是逮捕布爾什維克的首領，都阻止不住工人的革命斗

爭。社会民主党的列宁派在各地繼續展开革命工作，宣傳立刻停止战争和組織武装起义。偵探写道：“在上述時間，在我們所指的本地列宁派地下組織中进行犯罪活动的最有名最积极的代表里面，偵探局偵探要指出的是上述的亚历山大·庫斯明·茨維特科夫、伊万·第托夫·莫罗索夫和塔奇雅娜·罗基洛甫娜·罗曼諾娃。”其次在报告中說，积极的革命工作以及在本年(1915年)“‘1月9日’布置示威游行的企图，也是搜查和逮捕上述各犯的理由，因为他們是当时地下革命工作最厉害最危險的代表……”

偵探局对上述各犯所收集的以下的情报，可証明这些人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

1) 农民亚历山大·庫斯明·茨維特科夫(即庫斯明)，根据秘密偵探局現有的情报，曾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直至此次被拘，一向是在上述布尔什維克地方組織的积极工作”。接着他老老实实非常可靠地举出了我参加革命工作的一切地点和担任的职务，指出了我过去参加小組的地点和小組的名字，甚至指出了我做過何种报告，何时并因何事被捕过。

报告中說：“偵探在1914年下半年和年底以前所收集的最新的情报也一再指出，茨維特科夫从本年秋天起就担任着彼得格勒市莫斯科党区的党的宣傳組織工作，他成立了工厂小組和支部，使上述的工厂小組和支部联系起来，因此也就逐漸把已被破坏和那时并不起作用的秘密区委重新建立了起来。后来，茨維特科夫参加了該地重新建立的

区委，繼續进行他的組織工作，在重新建立的小組和团体里做了許多次有关目前政局和他所服务的党的情况和活动的报告。在耶穌圣诞节期間，上述的茨維特科夫，根据秘密偵探的报告，曾負党的使命去过莫斯科市。上述的茨維特科夫在斯考洛哈德厂伤病互助会担任秘書期間，經常手里有許多錢，这些錢是工人們指定援助罢工期間穷困的家屬和动員參軍的人們的家屬的，但他时时宣傳反对救济受伤的軍人和后备兵，劝导捐款的工人把捐助的金錢只用来接济党和工人的出版机关，說这些机关整个的是为全体无产階級的利益服务的，是能打开工人們的眼界，看清楚他們周圍的环境的。

人們根据茨維特科夫外表上的模样，給他起了一个綽号叫‘哥薩克人’。”^①

对其他几个被捕的同志，也做了这样詳細的报告。特別会审的結果，决定把我們当中的大部分同志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极远的区域，時間是3年到5年。

① 莫斯科国立中央文史館文献，Φ. 警察厅第七档案栏，1915年档案第414，第26頁。

十三 押 解

在監獄里的第五個月頭上，當局向我宣布了判決書，于是不久就把我引渡到彼得格勒的流刑苦役監獄。我在那里會到了伊·第·莫羅索夫、莫·阿·沙維尼亨和沙哈羅夫。第二天，斯·彼·麥德威節夫也解到這裡，他是被發配到土魯汗斯克邊區的。因此，我們被流放的政治犯共有5個人。其他都是刑事犯，這裡面什麼樣的刑事犯都有！有殺人犯、土匪、縱火犯，還有終身的流浪漢，他們是從西伯利亞逃回來的，現在他們因逃亡而服的懲役期滿了，所以又要流放。

在流放監獄住了兩個星期，有一天，在深夜裡，通知我們準備起解，到夜裡的3點鐘，門門響了，鐵門開了。囚犯們都站在一道，用繩子把手捆着，準備到院子裡去。押我們的士兵們在走廊裡跑來跑去，叫罵不休。最後，忙亂完了，押我們的士兵和監獄的衛兵便開始執行任務，命令全體囚犯都到院子裡。犯人們走到院子裡，站在衛兵們所列成的一個半圓形的行列裡。點名以後，武裝的士兵押着我們到火車站。儘管是在後半夜，我們這一隊裡的許多政治犯都有自己的親戚朋友和熟識的人們前來送行，並且一直送到車站。有幾個甚至偷偷地溜到囚車將從那裡駛出的裝貨月台上。在路

上常常听到卫兵們罵那些与自己的亲人互相招呼的囚犯。

同我們一道起解流放的，还有我們的一个女同志罗曼諾娃，她是从女监解到我們車上来的。囚犯們都上完了。停了一小时，我們坐的車廂同出发的列車挂鈎了，于是我們很快地就被拖着走了。先由彼得格勒到了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之后再向前去就进了西伯利亚大森林的偏僻地方。这就是我們足迹所走过的一条不能自由的路綫。

漫漫长日，度日如年；同时因車上空气沉悶，到处是虱子和犯人拥挤不堪的悶热情形，甚至連气都透不过来。夹在刑事犯当中的我們这6个政治犯，与押車的卫兵和刑事犯們，大大爭吵了一頓以后，最后才爭到了一个“車廂房間”，我們象一家人似的搬到里面。

車到沃洛果达时，由沃洛果达苦役監獄又解到我們車上一批刑事犯，这些刑事犯都是已經服滿了苦役現在又准备流放的。有几个犯人还因为“不服从監獄的长官”而带着足鐐和手铐。其中特別令人注目的，是一个曾經当过神父的刑事犯，他因为猜忌他的妻子有外遇而把她杀了，因此判決苦役。他在苦役監獄也好，到这里的車上也好，只要是能够做到的，他都愿意照顧身体衰弱和有病的人們。他特別和斯·彼·麦德威节夫要好，一路上同我們在一起。囚車上的环境，使我們感到很便于談話，所以这就滔滔不絕地談到过去的遭遇和未来的希望。火車慢慢地搖蕩着，載着我們越走越远。

火車已駛过維雅特加，沃洛果达，現在是快到叶卡德琳

堡了。我們到叶卡德琳堡時正是深夜，只好一早再繼續啟程了。大隊的衛兵押着我們走到了離火車站三公里的叶卡德琳堡流刑監獄。押我們到監獄的士兵們，一路上非常冒火。因為在這隊犯人當中，有許多病人趕不上前頭的人。他們連最後掙扎的一點力量也沒有了，頹然地倒下去了。但是押解犯人的衛兵們還是用拳頭和槍托子毆打犯人，只有當犯人們再起來走路時才停止了毆打。我們對這種虐待的行為提出抗議，但無效果。

最後，大家掙扎起來到了監獄。叶卡德琳堡的流刑監獄，同俄國的大多數流刑監獄一樣，使人非常厭惡。他們把我們這80來個人，統統關在一個不大不小的牢房裡。木板床也不夠，許多人睡在地板上，甚至還有些人睡在木板床底下。到處都是濕浸浸的、發嘔的臟東西。夜里是不可能不出事的。有些刑事犯偷竊成性，不偷是不成的。他們在大家睡熟的時候，把手偷偷地伸到身邊睡的人的包袱裡，把他們所摸到的東西都拿走了。不問他們當中的哪一個人干這種“把戲”，只要被人家抓住，結果就要吵鬧不休。

天剛剛露出一綫微光，就下令催大家到院子裡準備起程。臨走，監獄的一個看守長對囚犯點名，把應名的人與“路條子”對照了一下。看守長問行路的犯人：“你姓什麼？父親叫什麼？到哪裡去？”我們同組的幾個人也一個跟一個走過來了。他開口用“你”問我們的時候，我們第一個走過去的同志就要求他稱我們為“您”。最初看守長不注意這個要求，但我們大家一致抗議後，他才把問我們的口氣改了，

不是問“你到哪里去？”而是問“您到哪里去？”了。這只是對政治犯的稱呼，我們一走過去，他就又照原先的口氣繼續問其他的囚犯了。

押我們走的衛兵已經站在監獄的院子裡了。我們排好了隊，一群衛兵密密地包圍着我們啟程。開始上車了，火車很快地開出站去。又是漫長的倦人的日子。過了一個時候，我們穿過歐俄和西伯利亞之間的邊境。幾十年以前沒有鐵路的時光，步行的犯人們要在界碑跟前休息。現在許多囚犯不問衛兵怎樣罵詈和威脅，還是爬到有鐵絲網的窗口跟前想看看這個有意義的界碑。

離開葉卡德琳堡走了一晝夜，我們的火車已經向西部西伯利亞一望無垠的平原推進。又過了兩晝夜，平原消失，轉向西伯利亞漫無邊際的大森林；就要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了。

從彼得格勒開出的火車整整走了8天8夜才到了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我們要被解去的那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流放監獄，犯人擁擠到極點。因為春季道路泥濘不能成批押解犯人進入西伯利亞的密林，所以來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所有流刑犯，不得不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監獄等到葉尼塞河通航的時候。

在這裡集中的政治犯，包括服完苦役和法庭判決終身流放、以及按行政手續流放的人們在內，總計已達60人。我們和刑事犯分開，關在兩間較大的套房裡。除我們從彼得格勒一道來的一小隊以外，在流放監獄裡還關着奧古斯丁·

伯尔茨①、維·里·布尔采夫②、費阿菲拉克托夫③以及其他許多人。

在天朗气清的春天，我們都想从牢房里到院子去。我們看到克拉斯諾雅尔斯克流刑監獄的制度比較松一些，在全体政治犯的大会上决定要求監獄当局延长散步的时间。大家推选布尔采夫和費阿菲拉克托夫为代表与当局交涉，結果，監獄当局答应把“散步时间”每天延长到3小时。

在60个政治犯当中，有布尔什維克、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沒有一定政治色彩的人們。布尔什維克占大多数。在獄里召开的大会上，每逢对某些政治問題做了講演和报告之后，在各党派之間总要发生激烈的爭論。爭論最厉害的，是当时最迫切的一个問題，即对帝

① 奧·犹·伯尔茨，布尔什維克，1906年入党。在里加和巴庫做过重要的地下工作。1921年被拉脫維亞的資產階級政府逮捕和枪毙。

② 維·里·布尔采夫所做的一件著名的事，是揭发奸細，特别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員阿舍夫。当时我們誰也不怀疑，布尔采夫自己在1917年就是一个特出的奸細，就会公布卑鄙的誣謗別人的伪証据，把我們党的某些活动家形容为德国的偵探，而在十月革命以后，会与白党將軍們一起进行反革命的斗争。人們問他加入了哪一个党的时候，布尔采夫总是回答人說，他自己不属于那一个政党，而是对革命运动有自己特別看法的人，因而他也就是“刺杀沙皇的革命家”，但大家都知道，沒有哪一个沙皇是布尔采夫刺杀的。

③ 費阿菲拉克托夫，初为社会革命党黨員，1917年起为布尔什維克，参加过国内战争，在西伯利亚被白卫分子枪决。

國主義戰爭的態度問題。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之中，有許多擁護“保衛祖國”這個口號的人，他們認為必須在今後的作戰中支持沙皇政府，促使戰爭勝利結束。最熱烈的沙文主義者是布爾采夫和孟什維克的莫蓋拉茲。

最後，差不多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流放監獄住了3個月以後才把我們分成幾十人一隊開始陸續解到伊爾庫茨克和葉尼塞斯克。我和65個囚犯合成的一隊坐通航後的第一艘輪船被解到葉尼塞斯克。在這一隊人當中，大多數是刑事犯，其中我們政治犯只有24人。除了我們一道從彼得格勒來的幾個同志以外，在這一隊里還有奧古斯丁·伯爾茨、費阿菲拉克托夫、布爾采夫和另外幾個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流放監獄住在同一牢房的人。午前11點鐘把我們從監獄里解出來。春色美極了。解出監獄後，感到胸襟舒展，到處都是一片嬉笑。我們到碼頭的時候，城里的許多馬路上都有成群的人跟在我們後面送行，其中有許多是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住的政治流刑犯。

在輪船上，把我們都安插在最下一層的統艙里。這裡又擠又臟。輪船在葉尼塞河里順流而下，走得比較快。兩岸重巒疊障，映入眼簾，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越往前走，風光越發秀麗，遍地是處女林，復蓋着景色綺麗的葉尼塞河兩旁崎嶇不平的河岸。

我們整整的走了一天半才到了葉尼塞斯克。在閉塞和遼遠的葉尼塞斯克，人們渡過漫漫的冬夜以後把第一艘輪船的到來當做全城的一件大事。所以我們坐的船一靠碼頭，

在岸上已有成群的人圍攏來了，同時和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一樣，其中有許多政治流刑犯，甚至還有我的幾個熟人。

登岸後，命令我們排好隊伍由衛兵押到葉尼塞斯克監獄。這個監獄是真正的骯髒之地。遍地是臭氣沖天的垃圾。在牢房的牆角上放着一個馬桶，屋裡臭得難聞，當然空氣污濁到極點。地方小得連大家的木床都放不下，許多人在夜裡睡在很髒的地板上和床鋪底下。

晚上9點鐘給我們送來了晚飯，晚飯是腥臭的魚湯，飯後很多人都嘔吐起來。有幾個身體極度虛弱的犯人大鬧腸胃病，所以把他們抬到監獄醫院去了。我們叫看守請警察局長來看，但他不來。囚犯們氣極了，從床鋪上抽下幾條木板大搗牢門，希望這樣來引起監獄當局的注意。但這也無濟於事，一個人也不來看我們。第二天早晨，我們為表示抗議，大家都不吃一點東西，決定絕食。但這件事卻讓全城都曉得了，而且不久我們就得到了葉尼塞斯克政治流刑犯大隊送來的各種食品。當我們知道我們在葉尼塞斯克頂多只住兩天時，我們才聽從了同志們的勸告自動停止絕食。

因此，在葉尼塞斯克監獄只剩下一夜了，但就在這最後的一夜裡，卻幾乎同刑事犯發生了流血的事。刑事犯和我們不和睦，早在輪船上的時候就表現出來了，當然他們當中最無恥的、恬惡不悛的幾個傢伙是故意要以挑撥性的行為來挑起我們的同志來同他們衝突的。在深夜裡，看守推了一個農民模樣的犯人進我們房間裡來。這個新來的犯人才進來半小時，突然他發覺帽子丟了。他知道這是刑事犯們干

的，要求他們把帽子還他。刑事犯們不僅不給他，甚至还嘲笑他。當時費阿菲拉克托夫就指責了刑事犯們的這種行為。刑事犯一伙中的幾個最壞的家伙、殺人犯認為這是對他們的侮辱，發起火來，於是氣勢洶洶地跳起來跑到費阿菲拉克托夫面前。憤憤不平的費阿菲拉克托夫從桌子上拿起一把鐵茶壺來威脅他們。刑事犯們本來就是要同我們打架的。但我們早已抓住費阿菲拉克托夫的手了，这样就避免了一場衝突。為首的幾個家伙見其他的刑事犯不幫他們的忙，他們也就退回到他們原來的地方去了。

我們要求在5分鐘以內把帽子還來。我們限定的時間還沒有到，一個刑事犯已經拿着一頂帽子走到房間中間，同時當着大家的面遞給新來的人，說這是他從床鋪底下找到的。这样就使衝突了結了，沒有發生不幸的後果。此時，刑事犯所以讓步，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其中極大部分的人是因半刑事性質的案子罰做苦役的，與職業性的刑事犯完全不同。他們不願幫助這些“積極的”家伙冒然地來反對我們，而光是他們自己這幾個人呢，則是不敢出來吵架的。雖然表面上平息下來了，但我們決定在這一夜裡還是要小心，大家輪流睡覺，監視着刑事犯。

第二天，大家很早醒了。從早上10點鐘起就把我們這一群人喊到監獄的辦公室，宣布了流放的地点，同時也就逐站解到固定居住的各鄉去。我們的一個親熱的政治家庭開始各走一方了。一部分指定上土魯汗斯克邊區，而另一部分是到叶尼塞斯克附近的幾個鄉。我列入到安加拉河沿岸

边区很远的一个乡的那一队。連刑事犯在一道，我們共計 25 人。同我一道的有伯尔茨、費阿菲拉克托夫和斯莫梁斯基；我們从彼得堡来的同志們一个也沒有編到我們这一队来。

我們要到达的安加拉沿岸边区，是叶尼塞斯克县的一部分，由宾丘格斯克和刻日姆斯克两个乡合成，这两个乡位于叶尼塞斯克东北安加拉河的两岸（上通古斯）。

这个荒凉辽远的边区，自古就是流放地。这里的居民点多半位于安加拉河两岸的許多小支流汇合的地方。向北的两千多公里，一直到北冰洋，先是完全一片不能通行的繁密的西伯利亚大森林，而再向前去就是西伯利亚的藓苔地。由安加拉到北冰洋的海岸，在这个方向上，没有一个居民点。

最初我們要步行，过后才約有 4 百公里可以坐安加拉河上的小船。到刻日姆斯克乡区的人們还要走更多的路程。

我們大約在 12 点鐘从監獄出发。正是个好日子。春天的阳光輻射着，万象从漫长的冬眠中觉醒。春草如茵，碧芽茁茁，使人一見心喜。

押我們到指定地点去的是两个乡村警察。过了长期的押送旅行后，我們第一次感到不受監獄規矩的束縛了。在流放以前，大家不得不終日坐守在監牢里，所以我們每一个人在走出阴湿郁悶的牢房以后都陶醉在自由和新鮮空气之中了。

两輛載病人和行李的运貨馬車向監獄开来。誰也不干涉我們談話，不干涉我們和送行的叶尼塞斯克的流刑犯們

告別。

走了兩小時，叶尼塞斯克已經遠遠地落在我們背後了。我們沿路看到的村落，相距都在20—30公里之間。在居民地之間的這許多段路程，都必須在白天走，以便晚上能趕到一個歇宿的地方。

我們走了兩天，在一個很大的村子考爾希諾遇到了兩個政治犯。其中有一個同志溫巴烏姆聽說我們這一隊人要來了，特來“驛站”找我們。他聽說我們這一隊里有3個布爾什維克，他還請我們到他住的地方吃茶。這是我進監以來第一次在一個自由自在的房間里享受到的自由。

溫巴烏姆·格列高里·斯皮里道諾維奇于1910年被判決終身流放，他從彼得堡被放逐後，一直就在西伯利亞。當時才知道，我和他于1907年早已在科洛敏斯克區的工人文化教育協會里見過面了。溫巴烏姆在斯托雷平反動的黑暗年代，在彼得堡化名為“瓦連廷”做黨的宣傳的工作。他受過高等教育，能自由閱讀幾種外國文的書籍，是一個歷史專家和外交專家，而且記憶力非常強。

在我們來到這裡的幾天以前，溫巴烏姆正從彼得格勒的親屬那里接到一個包裹，所以我們就大大地吃了一次他煮的可可茶，我們已很久很久忘記了這種東西的味道了。我認識的許多人，他也熟識，所以我們倆就回憶起彼得堡的往事，回憶起自己在那裡的工作，想起了老朋友們，這樣半夜就過去了。

我們回到“驛站”的時候已很晚了，我們的許多人都已

入夢了。第二天早晨又起來赶路，每天都是如此。我們非常疲倦。

我們在路上已經走了5天了，但安加拉河還沒有望見。所有這幾天，我們都是順着石子公路走的，這條公路有許多地方象鄉間的道路。許多鄉村已走過去了，其中包括最大的鄉村考爾希諾和馬克拉考沃。現在我們要从公路轉彎向安加拉河岸的漁村前進了。我們順着雜草叢生的村間小路和羊腸小道走着，四面八方都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古木參天。林中蔓草縱橫，使行人無法探尋大森林的奧秘。

往常在俄國森林中聽到的婉轉的鳥語，在這裡完全聽不到，只是死沉沉的一片寂寞。這種寂寞，只是偶爾在猛禽和野獸吼叫的時候才被打破。這裡的野獸覺得自己很自由，不怕行人。在我們一隊人前面几公尺的地方，就有一只熊從我們大家面前不慌不忙地走過去。

有時在通過彎彎曲曲的小道時，我們這一隊人就拉成一條起伏不平的鍊子。許多地方都有山擋着，每過峽谷，大隊的前鋒從後面是望不見的。曾經不止來過一次的囚犯們，特別是流浪者們說，這種地方最容易逃跑。這點，帶我們走的兩個鄉警也是知道的，所以他們盡量把一切囚犯控制在他們的視線以內。雖然在押送的途中，沒有護照、沒有金錢，沒有衣服，逃跑幾乎是無希望的事，而且逃犯往往是又被擒獲，但有些人還是要冒這種危險。

有一次，在下半天，彼此悄悄地傳布着這麼一個消息：應該準備逃跑，應該把大隊拉得更加長些。一個曾因逃走而

被抓回来的刑事犯已准备好要逃走。有几个人已经离大队向前走远了，但后面的人故意停顿不前。想逃的一个人便抓住这个空子以及乡警走到对面山顶的机会，往旁边一闪，躲藏到林里最深的地方就不见了。大约过了两小时，乡警才找到逃犯，但天已很晚了。

天快黑了。这一天我们约走了 50 公里，长途的跋涉使流刑犯们精疲力竭，走得很慢。但大家希望的一件事，最好是快些赶到有人烟的地方，吃饭休息。

我们走的一条小道，一直通到一个山上。我们用半小时的功夫便通过峡谷爬到山顶，并从山顶上望到一个小村子——新村，这里总计只有 5 家居民。这个村子位于一个很大的幽谷之中，四周环绕着森林繁茂的小丘。暮色苍苍。到了目的地，我们这几个政治犯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们许多人只喝了几口茶就立刻倒下睡了。

我和奥古斯丁·伯尔茨嫌屋里烟气熏人，走出院子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欣赏一下美丽的西伯利亚大自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至今还记得这个孤僻的小村子和这非常冷静的一夜。天上群星闪烁，在黑暗的夜晚，还勉强看得出被不能通行的针叶树铺满了的西伯利亚丘陵。在幽静的深宵，还听得到山间小溪淙淙的流声。

我和伯尔茨被西伯利亚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吸引住了，沉思了好久，倾听着静静的溪流，在脑海里依次地浮现出这样一种思想：这里，万籁俱静，没有人来搅乱西伯利亚庄严纯洁的大自然的酣睡，但是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

片刻間还有什么东西沒有想到的呢！

彼得格勒地下革命的未来事业已在工人群众当中成熟了，真想再回到我們那个遙远的老家去。但已經到大半夜了。于是我便突然打断了夜色沉沉中陣陣涌上来的忧思說：“還沒到睡覺的时候嗎？”“是的，大概到了”伯尔茨不高兴地回答，好象我打断了他的心緒，他似乎还生气哩。我俩在小村子走了一会，默默地回到了小屋。小屋很黑。我們的全体同志都早已睡着了。为了不打破沉寂，我們一声不响地躺在地板上，垫了伯尔茨的一件囚犯穿的长袍很快地便睡着了。

我們早上6点鐘起床，喝了些茶又上路了。今天必須到安加拉。路程比較短些，約25公里。午后两点已經进了河岸上的一个村子。大家决定不在这里耽誤時間，希望馬上到河那边的一个大村庄——漁村，好好地休息到第二天早晨。安加拉河流到此地，寬約一公里半，所以坐船渡河也大約化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漁村是宾丘格斯克乡的大村鎮之一。有200多戶人家。村里有两个小学，几个私人开的小商店和合作社。我們在这个村子里，第一次看到了許多政治流刑犯。他們打听到我們来的消息后都到岸上来迎接我們。大家一見如故，非常热情，馬上招待我們住在他們的房里，每个房子两三个人。

时候还早，大家决定看看这个村子和流刑犯的生活。从漁村同志們的談話中知道，他們这一队不十分团結。这里有社会革命党人，有孟什維克，有无政府主义的激烈派，有布尔什維克，还有一些政治信仰不坚定的人們。这样成分复

杂的一队人，自然在他們当中是不会团结的。遺憾的是，我們到漁村总計不过几小时，当然弄不清楚他們当中誰是誰非，摸不清他們爭吵的原因。

分手睡覺时已經很晚了。早晨大家都到河岸上集合。再往前走，我們只能走水路了，因为在稀有的几个村庄之間沒有其他任何道路。

我最初到安加拉时，它的壮丽的景色使我惊奇不已。这条美丽、奔放和多水的河流，同西伯利亚的許多其他河流一样，在当时还完全沒有开发。只有几条载送流刑犯的小舟偶尔在河里划过。从河岸两边的悬崖絕壁起，展开了西伯利亚一望无垠的大森林，其中聳立着森林密布的丘陵。我情不自禁地想，这个沒沒无聞的边区，将来还有很大发展前途哩。

我們一队人分組坐在四只小船上。因为河水流得很快，在安加拉河上航行根本用不着木桨。逆流而行的唯一可能，是船靠岸行走，并由人来拉繩。在西伯利亚汹涌澎湃的河流上，这是一种平常采用的最多的航行方式，而撑船拉繩則是安加拉沿岸边区老百姓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有趣的是，女人們拉着繩子靠岸拉繩，而男人們則坐在船上掌舵。我們馬上注意到这种非常奇怪的风俗，責备起掌舵的男人們，同时还建議他們和女人們調換一下工作。但那些用了很大力气才能劲一下舵的人們就馬上暗笑了起来。很明显，他們是把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职责来完成的。当时几个流刑犯自己替妇女們去拉繩子，叫她們休息。

天阴沉沉地下起雨来了。从清早起，雨就稀稀拉拉地

下着，但快到中午时暴风雨来了。从下游来的一阵狂风呼呼地吹着，卷起了很大的浪潮。在狂风吹得最厉害的时候，船被浪涛打到岸边。继续前进很困难。几只船想撑起帆来顺着风向前进，不再拉纤，但这种尝试“结果”几乎把两只船翻了，因为它们离岸太远了。我们大家都被雨水淋得透湿，但没有一个人想到岸上有树的地方去避雨，等候雨停，因为雨没有很快停止的征象。

大雨使得我们用了很大的力气，直到黄昏才赶到安加拉河对岸的一个村子——兔子村。大风依然吼着，河里的潮水涨了，因此农民们无论如何不答应在浪涛猛烈的时候把我们划到对岸。当时费阿菲拉克托夫和一个刑事犯出来掌船，两个人开始向对岸划去。我们捏着一把汗注视着他们，他们的船一到中心，突然被打得向各方面乱转。最后，船过了河的中心，勉强地看到它象是一个黑点子靠在那面的岸上了，我们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从他们开始渡河到现在已经大约过去两个小时了。风暴开始平静下来，河水也已平稳。我们大家决定过河。拼命地摇了一个半钟头，我们才到了对岸。我们进村后住在几个农家的小屋里，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天一亮又出发了。

在船上已经坐了6天。雨后天气晴朗。有时一天能行40公里。从渔村出发后已经过了10个村子，其中有兔子村、杜鹃村、可怜村、愁苦村。这都是些很难通行的荒野酷寒的地方。这些隐没在一片汪洋似的西伯利亚大森林里的贫苦的小村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为悵惘的印象。1910年

早被流放到安加拉的布尔什维克党最老的活动家尼·里·麦什梁考夫講到这些地方时写道：“两岸的几个小村子，彼此相距很远。听了他們这些村子的名字就够惊人，如杜鹃村、可怜村、愁苦村……但当你沿着这条荒野、遙僻、人烟稀少的河岸走时，你自然会联想起愁苦村只有愁苦，可怜村只有可怜，而杜鹃村只有杜鹃，同时这种穷途无路的苦悶也会使你自己惊叫起来。”^①

我們走过几个这样的村落，到了卡麦基村。这里住着三个政治流刑犯，其中有我在彼得堡时認識的彼得堡五金工会書記阿·斯·基塞列夫。我們要在卡麦基住到第二天早晨。在这里住的政治犯很少，他們的屋子容不下我們大家，大部分人都住在农民的屋子里。

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住在基塞列夫家里。他花很少的錢租到一个单幢的小房子。房子的設備很簡陋，家俱粗笨，两个坏了的方凳子，一把三只腿的椅子。在桌上和柜子里放着書籍和旧的报刊。我們一直談到夜半。同我来的一个同志先走了，我留在基塞列夫屋里住了一夜。

一清早我就到我們同行的人住的房子去了，因为我們全体要从那里一道出发到河岸去。这里已給我們准备好船只。这一天我們走了两站路。不到中午我們就到了曼夏村，換了船再走，到了伊尔基涅沃。到伊尔基涅沃时正当下午

^① 尼·麦什梁考夫：“我們在流放地是怎样生活的”。1934年，俄文版，第84頁。

5 点鐘。这里住着两个政治流刑犯，一个叫波罗尼斯拉夫·丹尼耶里，一个叫安娜·尼基甫洛娃^①。他們听見我們要来的消息，都到河岸上来等我們。時間还早，我們大家决定喝些茶再走，到对岸离伊尔基涅沃 14 公里的宾丘格鎮去。到宾丘格时天已經完全黑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乡鎮。当时在鎮上大約住着 25 个政治流刑犯，他們热忱地欢迎我們，即刻領我們上他們自己的屋里休息。可惜当时天已很晚，我們不能詳細地看看流刑犯的生活环境。

我住在此地流刑已滿的布尔什維克斯·維·馬里雪夫的房里。馬里雪夫过去在彼得堡“真理报”編輯部当秘書时我曾見過他。

第二天中午不到，我們已过了雅尔克村而最后到了該乡的行政中心包古查恩。县警察局长也駐在这里。

从叶尼塞斯克出来已在路上走了 15 天多了，我們当中有些人已經在这里最后結束了发配的旅行。第一天我們到警察局长那里听候分配。我被指定到伊尔基涅沃，伯尔茨到宾丘格，費阿菲拉克托夫到非基諾。其余的同志則同刑事犯們再向前进，到剌日姆斯克乡。

在分配我們到乡村居住时，他們凭签署向我們宣布：无权离开固定居住的村庄，不准帶猎枪，不准参加乡村的集会，不准进行教育活动等等。一句話，我們的生活沒有任何

^① 波·丹尼耶里——先是一个激烈派，后为布尔什維克党党员。安·尼基甫洛娃——布尔什維克。

权利，只能在乡警的监视下各自在孤零零的小村子范围内度过“自由的监禁”。一切手续办完以后，天已黑了，于是我们就在包古查恩等到第二天。

包古查恩镇虽是该乡的行政中心，但它的面积比宾丘格和渔村小些。这里有一个医院，是为宾丘格乡的全体居民服务的，但事实上，这个乡的面积比法国的领土还大。要得到一些必要的医药救护品，须走好几百公里，夏天坐船，冬天坐雪橇。所以很明显，这乡的多数居民事实上完全得不到医生的服务。

我们在包古查恩住的时候，这里约计住着 10 个政治流刑犯。他们同住在其他村庄的人一样，都是用很少的租金在农民家里租赁一间很小的屋子。真的，包古查恩的流刑犯有自己的两间破烂的老房子，但一间是给路过包古查恩的政治流刑犯作寄宿舍用的，另一间是作公共食堂用的。

我们到包古查恩的那天，包古查恩的同志们正准备安葬他们那里的一个同志。我们也决定参加送殓。第二天早晨 10 点钟，大家把死者的棺材抬到坟地。在路上我们都唱着“你牺牲了……”。突然乡警跑来，把我们一群人驱散，并记下了大家的名字。送殓后的一小时，警察局长命令所有划定居住地的人，立刻各人回到各人的地点。结果整个“安葬的事”就草草完毕。关于这次事件的经过，警察局长报告了省长，而省长又转告了警察厅，并呈请把参加送殓的人由包古查恩“重新安置到”土鲁汗斯克边区。但很显然，警察厅认为这里也不比土鲁汗斯克边区好些，所以拒绝了省长的请求。

十四 伊尔基涅沃村

我和奥古斯丁·伯尔茨的路程是走回头路。我們沿河而下，很快地在当天晚上就到了“自己的”村庄。

伊尔基涅沃的同志們——波罗尼斯拉夫·丹尼耶里和安娜·尼基甫洛娃非常热烈地招待我。我暂时住在丹尼耶里的屋里。第二天，他給我准备好洗澡水，把爬滿虱子的汗衣完全都調換了。同日他們幫我向一个农民租到一間房屋，同时也在这一农民家“搭伙”。我觉得我是在自己的“家”里。

伊尔基涅沃村位于一个高坡上。这个高坡比安加拉河岸高出几十公尺。居民約有 80 几家人家，不平衡地分布在 5 条交叉的小街上。靠村的一条伊尔基涅沃河，流入安加拉河。它的两岸都是悬崖絕壁，上面籠罩着一片稠密的針叶树。远处高聳着一些森林密布的高山。

我已經說过，从伊尔基涅沃向北到北冰洋岸是再也沒有一个居民点的。在西伯利亚大森林最偏僻的地方，住着一小群北通古斯的游牧部落。他們的人数和他們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得而知。通古斯人操着本族的言語，但大部分会說俄国話，虽然說得不好。通古斯人是巧妙的猎人，熟悉西伯利亚大森林內的情形。他們住在兽皮做的帳篷里，每个帳篷住着几家人家。通古斯人对人非常客气、和霽、老实。跑到

西伯利亚大森林做生意的商人們，就巧妙地利用他們的这种性格，特别是忠厚老实的性格，而强盜似的掠夺他們。

自然，安加拉沿岸的居民在文化水平方面比通古斯人高出許多，但也很落后。当地的居民对城市和城市的文化有一种非常模糊的印象，所以我們講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情形时，他們都觉得这是海外奇談。有一次，一个 25 岁的小伙子同我攀談起来，他向我提出这样的問題：“伙計，你告訴我，俄罗斯城有多大？”我向他解釋說，俄罗斯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其中有許多大城市。显然，他听我說話时就不很相信我，所以他也就絲毫不相信我的話，而抱着疑惑的态度走了。

十五 政治流刑犯合作总会

自从我到安加拉沿河村以来，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在这个期间，我已经熟悉了政治流刑犯的生活情形。

政治流刑犯一群一群地分散在安加拉沿岸大大小小的村庄里。当局不准他们离开自己住的地方到别处去，管束一群政治流刑犯的乡警特别注意这件事。但是不和其他同志来往是生活不下去的，往往政治流刑犯不经批准就从自己住的村子走了。这种“自由”离开的行动往往招来对“犯規”者的禁閉，而在驛站的警察局“拘留所”里关上7天7夜。

每村乡警的人数要視政治流刑犯的多寡而定。因为在伊尔基涅沃村一共只有3个人，所以最初在我们村里没有一个乡警，他的职务是由村长和百人长兼任。起初，百人长每天照例要我窗戶跟前两次，用棍子敲几下窗櫺来招呼我，如我答应了，他才相信我沒有逃跑。他只要看見我在屋里就很滿意地走了。百人长早晨来时，常常正当我吃早飯的时候，桌子上放着一个滚开的茶炊。这种訪問終于使我討厌极了，所以我就威胁他說，如果再不改变这种习惯，我就要澆他一身开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到我窗戶跟前，而是去問房东了。

为了互助和保卫自己的利益，凡政治流刑犯超过5个人

的村子，都成立了流放者协会。只有那些陷害过别人的人，才不准他加入流放者协会。倘若协会的会员有令人特别不能容忍的某种行为，照章要完全开除会籍。

这些流刑犯协会又联合为全安加拉沿岸边区流刑犯合作总会。总会的领导机关为理事会和检查委员会，委员由各协会的代表大会选举。很显然，所有这些组织都是秘密成立的，而代表大会是极秘密地召开的。

合作总会的宗旨，除团结流刑犯以外，还有一个经济的和政治教育的目的。自由捐助的金钱和物品均交给理事会，由后者分发给最穷困的人。当然，财物有限，对人的帮助是极少的。是的，按行政手续流放的人，每月可由政府领到7个卢布的囚粮，但显然，这对于维持我们起码的生活是非常不够的，况且这些钱还不能按期领到，当中要隔很长的时间。靠劳动来贴补我们的生活也不可能。因为地方贫苦，这里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所有的农民都是人口很多的大家庭，用不着再添人手。所以流放的移民在自己的村里住过一个时期以后，都想领一张迁移证到靠近城市的另一个地方或到金矿里去，因为那里能找到工作。我也是按行政手续流放的人之一，所以很难得到迁移证。

十六 流刑犯的成分

政治流刑犯的成分非常复杂，所以合作总会几次三番地想用一切办法来弄清楚流刑犯的“真面目”。但这些计划终未成功。我来到以后不久，在1915年春天，根据布尔什维克被流放的第四届国家杜马党团代表们的提議，对全叶尼塞县发出了一个調查表。总计在全叶尼塞县和土魯汗斯克边区約有380个政治流刑犯^①。收回来的調查表只有141份，占全体流刑犯的88%。但是这些不完全的統計材料也是很有意义的，能使我们判断一下流刑犯的“面貌”。

在填表的141人之中，有129个男的，12个女的，其中带家眷的53人，单身汉88人。有21个填表的人，家眷是在俄国。

流刑犯中25岁到40岁的人占多数。20岁到22岁的人只有7个，50岁以上的人有10个。

流刑犯中俄罗斯人較多，共計72人，其次为犹太人——24人，拉脫維亞人——16人，波兰人——11人，其余都是其他民族的。

流刑犯的社会成分很复杂，这里有工人，有职员，有大

^① 列入通报的这个数字，其所根据的資料来源不明。

學生，有教員，有醫師，有新聞記者，有中學和高等學校的學生，但多數是工人。在填表的全體人員中，工人有80個（占58.3%）。其次為工商業的職員，計19人（占13.7%），知識分子——18人（占33.1%），學生——10人（占7.3%），農民——6人（占3.4%），其他成分4人（占2.7%）。按行政手續流放的計67人（占47.5%），依法判決流放移民的計44人（占31.2%），服滿苦役的流刑犯計28人（占19.8%）。

最有興趣的是流刑犯的黨派關係。第一，這些材料反映了當時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第二，它指出當時哪一些政黨是最受沙皇政府迫害的政黨。因此，流刑犯們的黨派關係如下：布爾什維克——53人（占37.8%），形形色色的孟什維克——18人（占12.8%），不參加小組織的社會民主黨①——9人（占6.4%），崩得派——5人（占3.5%），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3人（占2.1%），立陶宛社會民主黨——2人（占1.5%），社會革命黨——30人（占21.4%），無政府主義者——3人（占2.1%），波蘭社會黨（右派）——5人（占3.5%），波蘭社會黨（左派）——4人（占2.8%），無黨派人士——6人（占4.2%）。

從上面的數目字可以看出，與其他一切黨派比較起來，布爾什維克占的百分比最大。同時，這不只是葉尼塞縣流

① 所謂不參加小組織的社會民主黨，想係指托洛茨基派，托氏在他的“鬥爭報”上以“不參加小組織”來標榜，以便掩飾他反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企圖。——譯者注。

刑犯的特点，而且在全西伯利亚都是如此。布尔什维克高度的革命性和积极性，是沙皇主义对他厉行迫害的原因。

在西伯利亚有许多人是因为参加 1905 年革命而流放的。在这一类人当中要把他们所属的党派加以分类是极困难的。因为他们长期脱离革命生活，服满了长期的苦役(7 至 8 年)后不久又被流放，同时对国内形势和战斗党的纲领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所以他们多数人还没有考虑要选择什么政党，要加入什么政党。对于这些流刑犯有很大意义的，是他们将参加什么党派，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他们将来加入哪一个政党，常常是由周围的环境决定的。

在调查表上颇有意义的一项，是问流刑犯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如何？答案是 113 人反对，10 人赞成，没有一定意见的有 11 人，另有几个人完全没有填写。当然，这还并不说明所有反对战争的人都在这个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抱着相同的观点。许多人还是动摇，他们反对战争还附着各种条件。但显然的是，尽管如此，叶尼塞县的大部分政治流刑犯没有投到沙文主义的阵营。

沙皇的苦役、监狱和流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摧残这些专制制度的敌人，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是葬送他们的一生。同时应该说，这个目的是顺利地达到了。对健康问题的答案，多半写着下面几种疾病：心脏病、肺结核、骨结核、神经衰弱、胃炎、风湿症、贫血、严重的衰弱症，以及其他病症。对于物质生活的问题，极大多数的流刑犯回答说，他们经常异

常穷困，吃不飽飯。

当然，这些統計材料本身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只是对全体流刑犯的三分之一所进行的統計，此外它只是在当时的那个时刻是可靠的，因为时时刻刻都有更多的新的政治犯到来。

从6月的下半月到7月底，每星期都可看到从安加拉河下游慢慢地开来的船只。其中有我的許多战友。我們同过去人們欢迎我們一样，都到河岸等着。在河岸上一看到熟識的人，大家就領他們到木头房子中来，招待他們吃飯睡覺。以后我們大家定出了一个制度，由我們大家輪流招待新來的人們，而一切伙食費用則由合作总会負擔。凡生活比較寬裕而經常得到亲戚朋友充分物質幫助的同志，还照旧用自己的錢来招待政治流刑犯。

安加拉沿岸各村流刑犯的人数大大地增多了。在我們村里也來了6个新的政治犯，同时其中大部分已先期服滿了苦役。其中有一个尼·里·伊烏丁已做了8年苦役。在新同志們未到以前，我們村里沒有单独成立协会，而是到离我們最近的宾丘格村参加他們的协会。現在，流刑犯增多了，于是就成立了单独的伊尔基涅沃协会，同时我們“自己的”乡警也委派到我們村里來了。这个乡警起初对于監視流刑犯的任务很巴結。我們几个人常常在一道雇农民的小船到14公里以外的宾丘格村去。乡警想阻止我們的这种旅行，但我們大家表示非去不可，他不得不屈服。

十七 流刑犯的逃跑

北方短促的夏季快完了。粮食开始收割了。在西伯利亚的这些地方没有大片的不长森林的田地，农民们只好利用砍伐了树木后的空地种植。有些田离村很远，农民们下田时，往往就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收割完毕，住在很小的木造房子——“斯塔诺克”里。这些斯塔诺克分冬夏两种。夏屋通常没有地板和天花板，同时农民做饭用的柴灶，在多雨的天气是设在屋子中央。晚上并排睡在泥地上。冬屋的构造稍微不同一些。其中通常都有地板和天花板，有些屋子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还在靠墙地方安上一个木板床和土灶。冬屋普通设在离村子较远的西伯利亚大森林中，农民们于每年秋季到那里打猎时往往要住两三个月。夏季，在西伯利亚的丛莽中，到处都是蚊子，特别是小蚊蚋，所以农民在田野工作时都在脸上带着一个用毛发特别编织的护脸罩子。这里的收割时间比俄罗斯欧洲部分稍微早些，甚至比西伯利亚的南部和西部也早些。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的秋季和接着而来的冬季比较来得早些。

从8月下半月起，人们已感到秋意了。白昼渐短，天气较冷。西伯利亚大森林萧萧凋零。农民们从田野回来准备秋狩了：准备火药、干粮和其他必需品。

秋景似乎也使人們倍加淒楚，受人監視的生活更覺得難以忍受，所以大家常常在脑海里浮起一種逃跑的思想。但怎能從這種淒涼的天涯海角逃走呢？道路沒有，隨時隨地都要提防野獸和人？特別困難的，是從賓丘格斯克鄉逃走。這裡只有一條河道——安加拉河，而且在路上非常危險。要識水性，要深知安加拉河里的石灘和急流，不只要學會躲避追捕的方法，而且要能夠避開當地居民的耳目，因為當地居民從政府方面得到指示，務須扣留所有行迹可疑的行人。即使逃走的人僥幸擺脫了上述的幾種危險而到達葉尼塞，但乘輪船時又很容易碰到憲兵，因為這裡的憲兵很多。從橋路逃走的危險也不少，而且化錢很多。

我在流放的期間，只聽到有兩個按行政手續流放的大學生逃跑成功。他們花了許多錢，一個農民才同意領他們出了幾個村莊。但出了3個村子後，逃走的人便不得不停下來改乘馬車。他們為避免嫌疑，決定都化裝為因公出差的官吏，並且到縣區政府的所在地住在所謂“地方自治機關的官署”里。他們到這裡後命令提茶倒水，備車備馬。

現在全村都聽說新來了兩個人。許多農民都象往常一樣，手里拿着煙管擠了一屋子，坐在地板上，一邊不斷地向兩面吐着唾沫，一邊望着坐在桌邊的兩個人，開始問長問短：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為什麼來去等等。突然，兩個學生聽到地板上坐的人當中有人竊竊私語：“哪里的話，伙計，我看不象，一定是瓦爾納克①想逃走了，把他們扣起來吧。”

① 當地的人把流刑犯、流浪者和普通可疑的人稱為瓦爾納克。

两个逃犯見事情不妙了，于是其中一个外穿大衣内着铁路人員制服，并綴着金属肩章的学生，便从桌子那面走出来，故意装作滿不在乎的样子，把大衣解开露出了肩章和发光的鈕扣。同时他开始訓斥了村长一頓，罵他为什么这么久还没备好馬匹。村长吓得直发抖，于是立刻駕了两匹很好的馬。他們走后两个鐘头，乡警帶着一批追捕的人跑来了，但已經迟了。他們沒有追上这两个逃犯。以后他們是否脫險，不得而知。

1915年秋天，我們的流放地发生了一件整队政治流刑犯逃走未遂而轟动全乡的事。差不多刻舍姆村整队的7个人都計劃逃走。关于这次逃跑的詳情，是我在克拉斯諾雅尔斯克監獄認識的格·彼·斯摩梁斯基告訴我的，他曾經参加过那次逃跑。逃走的事发生在8月底。这队流刑犯打算先順着安加拉河下游坐船到查道別茨村，其后由安加拉河轉向康斯克县。他們买了一只船，添置了一个布帆，并准备了一些食品，趁夜深人靜到了安加拉。順流而下是很容易的。把帆一張，船就自然向前漂下去了。

这样，他們在水上走了150余公里就到了查道別茨村。現在是應該离开安加拉河步行前进了。逃犯們走了几天路程，最后到了切尔万斯克乡，准备在那里过慕拉河畔的一个村子。村里的老百姓对逃犯非常殷勤：夜晚把他們分散到各家住宿，早晨給他們吃飯，并送来了路上吃的許多东西，讓他們大家都騎上馬，并派了两个熟悉西伯利亚大森林情形的人帶路。

时届深秋。必須在荒涼的西伯利亞大森林穿过蜿蜒曲折的小道前进。半路碰到的村落必須在深夜偷过。但是下一个村子却必須在白天經過，因此他們越过这个村子的时候就有許多人詫异地斜視着他們，結果他們还没有出村，就有人追上他們来了。他們必須折回当时村长住的那个村子。村长要檢查流刑犯的护照。显然，全体逃走的人都弄了一張假护照以备檢查，他們起初不讓他看，并說他們是到康斯克有公干的，任何人都无权阻拦他們。爭論了很久，还是把护照拿出来了。村长沒有看出这些是假护照，放他們往前走了。

下一个乡鎮切尔万斯克也必須在白天經過。但中途遇到的一个更夫却覺得他們有些不大对头，馬上跑到該地警官那里报告，說是遇見了一群可疑的人。逃走的人們覺得形勢不好，就跑到村外无人的地方藏在谷仓里。但却被人們发现了，乡警带着当地农民中自愿帮助他的人們赶到了谷仓跟前，并下令向里面开枪，仓里躲的人們馬上向各方面逃避，虽然沒有一个被打伤，但逃跑終未成功。流刑犯不得不投降，于是全体都又被解回原地。

刻舍姆协会的全体会員の逃遁就这样以失敗宣告結束。过后下令，凡供給过逃犯們馬匹和殷勤招待过他們的农民，都輪流在拘留所里关了几天几夜。

刻舍姆村流刑犯的逃走，对我們也有影响：对政治流刑犯的監視更严密了，一切制度不严的現象都糾正了，任何一种新的“自由”都必須重新爭取。

十八 流刑犯的生活問題

已經是 10 月了。晴朗寒冷的天气到来了。但安加拉河尚未結冰。在春秋两季道路泥濘时期，我們每季有两个月完全与外界隔离，看不到报纸和信件。在这些时期，心里非常煩悶，所以我們大家都焦急地期望着安加拉河上开辟的橇路。

寒冷的天气一天一天逼人，最后寒暑表直降到零下 38—40 度。严冬又肆虐起来。在河里的坚冰积雪上，农民們开辟出村与村之間的橇路。这好象也是对国家的一种义务。

白昼越来越短，最后一直縮短到 4 小时半。冬夜漫长。應該找些什么事情来充实这无尽长夜的空虛。在流刑犯的合作总会下已有一个积年搜集起来的比較大些的图书室。我們协会的全体会员都开始学习：閱讀書籍、杂志、报章，研究他們特別感兴趣的問題。有时还举行报告会和学术講演会，在討論时，常常因观点不同，发生爭論。在党的关系方面，我們的流刑犯协会同其他的流刑犯协会一样，各种党派的人都有，其中有 4 个布尔什維克，两个接近布尔什維克的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被認為是孟什維克，一个加入了波兰社会党。

自从橋路通行以来，每星期又可接到一次邮件。生活馬上活跃起来。是的，邮差送給我們的信件、报纸、杂志等等，虽已耽擱了一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但我們究竟有相当可能来了解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虽然我們在学习，但空閑的时间依然很多。在这种綿綿无尽的冬夜，有时我們大家都到某一个同志的房里坐下来一直談到深更半夜。

夏季，我們可以到西伯利亚的大森林里和安加拉河畔上散步，但在冰天雪地的隆冬上哪儿去呢？周圍都是大森林，是朔风卷来的积雪，在广漠空曠的大地上没有一个生物。

在西伯利亚北部边陲的自然界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現象。比方在秋天，有时在冬天，往往一会儿是漆黑的深夜，一会儿又变成銀光皚皚的白昼。有时我同随便一个同志到西伯利亚大森林欣赏北部西伯利亚夜晚的良辰美景。在水銀柱下 40 度的严冬，冻得人們身上发抖。在靜靜地酣睡着的小村子和它的四周，都鋪上了一层雪幕。在皎洁的月光底下，遍地閃爍着无数的碧玉。在远处，西伯利亚深林中高聳的丘陵叠起。四处寂无声息。似乎宇宙万物都絕灭了。西伯利亚无垠的空間寂靜沉默。寒风很快地吹透我們身上单薄的秋季大衣，結果停了几分鐘只得赶快回去。

冬季，我們又把雨季泥濘时期中断了的通訊联络与宾丘格协会建立了起来，从而通过他們又与离宾丘格 12 公里的雅尔克村的政治流刑犯們恢复了关系。冬季来到以前，宾丘格的政治流刑犯增多了，那里現在总計有 30 余人。在

他們当中有很多布尔什維克。我們同这些同志經常保持着联系。

似乎在大冬天的时候，我們流刑犯听到了 1915 年秋間各国社会主义者在齐美尔瓦尔德召开代表會議的消息，會議向西欧各国的工人发表了宣言，号召他們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这个宣言，俄国社会主义者方面签字的有列宁、亚克赛尔洛德和包布洛夫。但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也接到了侨居国外的社会主义者爱国派普列汉諾夫、德奇、亚列克辛斯基、巴哈、布納考夫、奥克先梯也夫等人签发的著名的告俄国工人書的全文。他們在这个告工人書中，号召俄国工人拥护沙皇政府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

得到这些消息后，几乎所有的协会都开始了討論。当然，布尔什維克是拥护齐美尔瓦尔德代表會議的立場的，极力反对社会主义爱国派的宣言的。但在其他党派中，却显然是搖摆不定的。一部分人贊成布尔什維克，另一部分人态度不明，很少的一部分人拥护社会主义者爱国派的立場。

除在政治問題上意見分歧外，在流刑犯中对革命的道德問題也有爭論。无政府主义者加明斯基的事件使我們大家憤憤不平了好久。我們認為加明斯基的罪状，是他在服滿苦役以后唆使刑事犯反对政治犯，結果打死了一个政治犯。布尔什維克把這個問題提到流刑犯合作总会来討論，提議宣布指斥加明斯基这种不能容忍的行为。当时加明斯基要求召开同志审判会，不讓布尔什維克参加。結果，这种

审判会召开了。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都参加了审判。审判在包古查恩举行，当然是秘密举行的。許多同志，其中也有我，借口到医院拿药，也偷偷跑到包古查恩参加了这次审判。这个案子討論了整整一个星期，虽然我們向审判会提出了許多控告加明斯基的事实，可是也只給他一个申斥。合作总会的大部分会员不赞成这种决定，繼續与加明斯基絕交。^①

破坏革命道德的事件发生以后，在1916年1月下半月秘密召开的合作总会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一个特别的机关来解决代表大会之間发生的一切糾紛和冲突。我是代表我們那一区的几个协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的会址，定在与我們村子相距110公里的查列节耶夫村，同时約定所有出席大会的代表均須于夜半3点鐘到达該村，以便第二天早晨10点鐘以前就順利結束會議，立即各自回村。

我劝一个农民借他的馬車送我到了这个村子，并且向他保証我决不逃走。他駕了两匹好馬，趁天剛黑我們就出了村子。夜里是寒冷的。馬跑得很快，在中途只歇一站，我們已經在指定的時間达到會議的地点了。出席代表大会的有8个代表，其中有沃伊考夫同志，这个同志于1917年7月在彼得堡散发“真理报傳单”时被士官生打死了。

① 加明斯基到后来成为叛徒。白卫軍在西伯利亚猖獗时期，他做了高尔察克的反間諜。因为他进行过这种反革命活动，由克拉斯諾雅尔斯克非常委员会判决枪毙。

代表大会上主要的問題是：批准合作总会上届理事会的活动，选举新的理事会、监察委员会和成立审理糾紛的机构。理事会会址仍設在宾丘格村。当选理事的有以布尔什維克維·包洛夫考夫为首的宾丘格协会的几个會員同志，包洛夫考夫领导过上一届的理事会。

审理糾紛机构的問題討論完結以后，决定成立合作总会的监察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当选的都是布尔什維克，即伊尔基涅沃协会的會員：我、謝尔盖伊·帕甫洛夫与安娜·尼基甫洛娃。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被选为主席。从委员会成立到我們离开流放地的这一段时间內，一共审理过 30 个糾紛的案子。大多数案子没有什么原則上的意义，都是因个人的关系而发生的。有几件是破坏革命道德的案子，还有一件是呈請皇帝赦免的案子，但与这几个案子有关系的只是极少数的人。由于建立了一定的制度，监察委员会的一切決議迅即通知合作总会的一切分会。

冬末，在布尔什維克流放者之中酝酿着一个在自己队伍以及在农民当中进行有系統的文化教育工作的思想。为了这个問題，在我們伊尔基涅沃村特別召开了一次会议，并請两个邻村的同志参加。从宾丘格来的是奥古斯丁·伯尔茨、伊·彼·普里夏格^①、斯·維·馬里雪夫与安娜·拉采

① 伊·彼·普里夏格，工人，布尔什維克。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猖獗时期，他在布尔什維克秘密組織中工作，后被捕枪毙。

(伯尔茨),从卡緬基村来的是阿·德若帕里澤和阿·斯·基塞廖夫。同时还有另外两个村子的两个同志,以及我們协会会员中所有的布尔什維克。在这次會議上通过了几个決議,但因流放的环境变化,不能充分执行。过了一个时期,伯尔茨、普里夏格和安娜·拉采得到迁移机会离开了我們,而阿·德若帕里澤則从流放地逃走了。

十九 西伯利亚大森林

凜冽的寒冬快完了。3月的后半月已經开始显露出春日来临的最初征象。随着和暖的春日的来临，地上复盖的白雪逐渐融化。4月下半月已看見春雨泥濘的道路。邮件停送了，我們又与整个世界隔絕了。各协会之間的通訊联络也都停止了。到5月下半月才开始恢复交通，从安加拉河的下流开来了第一艘邮船。

大批遣送流刑犯到安加拉沿岸来的工作早从后半个冬季就停止了，現在新来的人是偶然的現象。从6月起，流放地开始空起来了。許多服滿苦役的人和流放的移民得到迁居权利，到靠近城市的其他地方或到金礦去了。在这个时期，从我們村子和宾丘格等几个村子里，也走了几个得到迁居权利的人。合作总会的活动消沉下去了。我也想轉到随便哪一个区域去，但未获成功。

为了消遣解悶，我和謝尔盖伊·帕甫洛夫不管什么禁令，准备了两支枪常常到西伯利亚大森林很远的地方去玩。我們往往跑到几公里以外，在西伯利亚大森林最荒野的地方獸一整天。我們随便到一个水泉或小溪的旁边休息一下，架起篝火煮磚茶喝，喝完又在西伯利亚大森林里周游。回家的时候已很疲倦了，有时从大森林中帶着一两只打来的

野禽。我們自然而然地对西伯利亚大森林习惯了，被它的綿亘不絕的空間吸引住了。

在我們流放的同志之中，也有人因为对西伯利亚大森林依依不舍竟永远不想离开此地了。例如，在离我們稍远的一个村子別道巴就住着这样的3个同志，老流放移民。其中一个人在流放以前当过乡村教师，另外两个是工人。他們已經被流放了約7年之久，同时依照法令已享受到所謂农民的权利，就是說有权在全西伯利亚移动了。但他們依旧住在他們自己的村里以打猎維持生活。我們經常竭力劝导他們，希望他們利用这种权利搬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中去。劝导他們是很困难的，但我們最后还是成功了，結果他們3个人都到了克拉斯諾雅尔斯克。但不过过了半年，突然有一天，在大冬天的一个深夜里，正当我睡下的时候，忽然听到敲門的声音。我从床上起来，把門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們3个同志回来了。从这里到他們原先住的那个村子还有50公里，所以他們便順路到我这里来歇宿。我一边給他們燒茶，一边問他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凄凉的地方。他們詳細地对我說，他們怎样时刻想念西伯利亚大森林以及怎样因忍耐不住結果又回来的情形。但我們是留恋自由，留恋城市熱鬧生活的，我們是渴望积极地工作和斗争的，这3个同志却无论如何不肯与他們这个顛沛流离的异乡分別！

西伯利亚大森林有特別迷人的地方，但也有危險。在大森林的遙远偏僻之处，常常有野兽出沒，常常有迷失方向而

永远找不回来的人。人們常常对我們說，流刑犯們因为沒帶指南針就在西伯利亚大森林的远处回不来了。在我們一群人当中，一个老政治流刑犯就把他的妻子在西伯利亚大森林里丢了。这个同志是替一个商人服务的，商人派他到很远的西伯利亚大森林中去照料他运来与通古斯人作物物“交易”的貨物。这个同志要到那里住几个月，所以他就决定把从俄国来找他的老婆一道带走。有一次好象她是到西伯利亚大森林里摘果子去了，結果以后再沒有回到家里来。第二天，他同几个对大森林非常熟悉的通古斯人一道騎馬去找她，但在林里轉了一整天什么也沒找到，結果他們空手而归。以后又一連找了几天，但終久不知道她的下落。后来另外几个通古斯人說，他們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跑到西伯利亚大森林里去了。她身上的衣服都已撕破，大衣也沒有了，身上只挂着些布条子。通古斯人想帶她回到他們家里去，但她好象已完全瘋了，她一看見人就赶快藏到树丛里去。結果她大概是餓死或被野兽吃了。

在整个的夏天，又把許多批新的流刑犯赶到我們这边区来了。其中有許多人是直接从苦役营流放来的，所以非常穷困。必需把合作总会的工作活跃起来以便救济新来的人們。我們的协会也增加了3个流刑犯，其中有一个是波兰的老人，年已62岁，曾經加入过波兰社会党。他是我們当中唯一年近古稀的流犯，所以我們因尊敬長輩的关系，对他特別关怀。

战争及其灾害和破坏，最后也影响到了我們这遥远的

边区。到1916年秋天，我們一向从宾丘格村的小商店购买的几种日用必需品，价格漲了很多。房租和伙食費也漲了。流刑犯的物质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了。

我們决定在我們村里成立一个公共食堂。但物品并未因此增多，它还是不便宜。有一个时期，我們吃农民打死的熊肉，因为农民認为这种肉“最恶心”，所以自愿送給我們。但不久这种肉也吃不成了，什么糊口的东西也沒有了。在这种时候，我同謝尔盖伊·帕甫洛夫帶了两支霰彈枪到村外去打鸞鳥，但由于鸞鳥并不比麻雀大些，所以要燉5个人吃的湯，就非打中30只鸞鳥不可，——鉄子儿花錢太多。秋季又来了，但在西伯利亚大森林中，秋季一到就連鳥儿也少見了。

但有一次，在这种困难时期的一天，我和謝尔盖伊为了天一亮就开始打猎，决定晚上点名一过即趁黄昏到大森林里去。當我們出村时，秋天晦暗的夕阳已經快落山了，一分鐘一分鐘地在安加拉河岸陡峭的絕岩后湮沒了。不知从哪里傳来了西伯利亚少女哀怨的歌声。

我們向深林沉默地走着，我們两个人都在微风吹来的悲酸的哀歌中想起了自己的心事。走了10几分鐘以后，我們已进入了西伯利亚的大森林，同时愈往前走，愈到了它的深幽之处。西伯利亚大森林常常被中間突起的大丘陵所遮断。我們把其中的一个丘陵当做我們的路标，打算在它的山脊后面找一个住宿的“斯塔諾克”。这个斯塔諾克是在离村15公里的地方，农民們在猎取松鼠或其他的野兽时常在那里

歇宿。

最后，我們快走到山坡了，期望已久的斯塔諾克就在它后面了。但我們剛剛开始上这个坡子时，不知道因为誰的脚步太重了，突然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几根枯树枝沙沙地响了起来，同时也就在这一刹那，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在大树之間出現了。我們不由得停了脚步。

——熊——謝尔盖伊声音很低很低地說，同时把肩上的枪馬上拿下来。

我抓住他的手，也低声地說：不要开枪，讓它去吧！因为我們要是拿自造的子彈惹怒了它，那我們一定遭殃的。

这时，那个大黑东西很快地跑到了对面，很粗的干树枝都喀嚓喀嚓地折断了。树枝折断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四处又恢复了一片寂靜。

——好，結果还算好，——謝尔盖伊用手心擦了下額上的汗說。

从前我們在西伯利亚大森林不知道走过多少次，但从来没有这样近的看到过西伯利亚大森林中所住的这种东西。我們从当地老年人的口中，听到过不少危險的事，說他們在打熊时必须要留神。但是我們从他們的口里也知道，在西伯利亚大森林中遇到熊的时候，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有危險，因为单个的一只熊是从来不往人身上扑的，特别是对两个人，只要不触动它的话。我們还知道，突然喊一声或向天空放一枪也是能把它吓走的，所以好象是不需要害怕遇見这种野兽似的。但是我們这次碰到熊的事却警告我

們以后必須格外小心。

我們繼續走我們的路，決定不管到哪里去一定要手里緊握着槍。不久，我們已走到山后的道上，在山的那一方面走着，但是不論怎樣尋找也沒找到斯塔諾克。結果徒勞無益地瞎走了一陣，身上疲乏得很，只好坐在一個靜靜的小溪旁邊，決定在這裡過夜，因為最討厭的是在西伯利亞大森林中天很快就開始黑下來了。

已經是日落後的蒼天了，我們拖來了一些枯樹枝，架起了篝火。白雲似的煙冉冉升起，不久，在樹枝底下開始伸起了幾道火舌，匯合成了一大片火光。火燃燒得越來越旺，越亮，照明了我們的這個休息的地点。而在離篝火幾公尺的地方，漆黑的秋夜在四面八方好象是無底的深淵，要把人吞下去似的。我把我皮帶上拴的鍋子解下來，跑到小河跟前提了一鍋水，隨後把鍋子放在篝火旁邊，取了些燃燒着的木柴把鍋子圍起來。水很快地滾了。謝爾蓋伊從他的皮包里捏出一小撮搗碎的磚茶丟到鍋子里。我們用我們自己做的白樺皮茶碗一邊喝茶，一邊吃着糖漬的黑餅干。吃飽以後，我們就靠着篝火坐着。由於疲倦，身上又暖了，就有些懶洋洋地了，但我們還不想睡，決定再多少躺着談一會兒。但一些為革命工作而判處流放的人們能談些什麼呢？自然是談我們怎樣脫離監禁，獲得自由，希望早些再開始革命工作。

謝爾蓋伊和我一樣，也是從彼得堡來的，他在被流放以前在一個印刷廠當印刷工人。自然，不管命運把我們彼得

堡人驅趕到哪里，我們的思想永遠和彼得堡在一起，希望到那里的風暴似的革命運動中過我們一生最好的日子。現在，縱然我們是在離它 5,000 余公里以外的荒涼的西伯利亞大森林中，但也還是想知道現在在俄國和彼得格勒發生了些什麼事情。根據我們所收到的許多早已過時的報紙，我們也可對這一點有一極模糊的印象。但是當我們知道在戰前的最後幾年革命運動是怎樣猛烈發展的情形時，我們也堅決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俄國一定要有一次革命的大動蕩。

快到子夜了，我們枕着自己的皮包躺在篝火跟前。為了防止不測，我們把裝好子彈的槍放在自己的身邊。篝火的木柴燒完了。完全沒有火是危險的。可能有許多狼闖來或碰上了熊。我爬起來抱了一大捆大樹枝拋到沒有火頭的篝火里。又升起了熊熊的火光，又把我們周圍的樹照亮了。謝爾蓋伊躺下睡覺，把一頂皮帽子蓋在眼睛上。我也躺在我睡的地方很快地睡着了。

我不知道我睡了多少時間。右腿疼痛的把我疼醒了。秋天的濕氣使我背上象是潑了一盆冷水，冷颼颼的很不舒服。謝爾蓋伊睡着了。在燃燼的篝火周圍雖還稍微冒着些煙，但燃過的大木頭已倒了，而在篝火的中間，只有木炭在冒煙，發出紅藍色的火焰。夜更黑了，似乎更向我們休息的地方推進了。天空中，有許多星光閃動。周圍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大針葉樹上的輕悄悄的聲音不時打破這種沉寂。

突然在我耳邊傳來了蕩蕩的聲音。我立即警戒起來。聲音越來越清晰，同時馬上清醒地判斷出這是在朝我們這一

个方向的树枝折断的声音，有几个野兽飞速地跑来了。我立刻叫醒謝尔盖伊。他馬上跳了起来。

——快拿起枪来，——我低声說。

他拿起他的独彈步枪，同时我們赶快离开篝火几步，拿着装好子彈的枪埋伏在大树中間。几秒鐘以后，在离开我們不远的地方，正朝我們这个休息的地方从側面蹣跚地出現了几个影子。我們瞄准了，接連放了两枪，轟轟的回声打破了西伯利亚大森林里夜間的寂靜。突然受惊的野兽疾风似的一齐冲向朝我們相反的方面，一路上撞断了許許多多的树枝。这都是鹿。显然，鹿是想跑到离我們休息地方不远的那条流动着的河里去喝水的。几分鐘以后，又是靜謐无声。

——見鬼。我还以为是熊呢！——謝尔盖伊說。

——熊这么晚不会出来溜跚了——我駁他。

——誰曉得它——他摆了一下手，又躺到時明時滅的篝火旁边。

我在篝火上加了几根粗大的干树枝，又走到原来的地方睡一会儿。迷迷糊糊地大概又睡了两个鐘头。最后我抬起头来，听到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猛禽断断续續的鳴声。东方渐渐升起了灰白色的帷幕。黎明就要到来了。我俩起来收拾好皮包准备出发。在西伯利亚大森林里整整轉了一天，到很晚的时候才疲倦地带着3只黑山鷄和皮袋里的7只松鼠回到村里。

当然，我們的猎获品不能解决飯堂的困难，最后还是不

得不断炊。

安加拉河一天一天地結冰了。从下游来的最后一艘邮船到了。睡在我們村里的几个信差對我們講过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他們說，船在我們村外几十公里的地方，突然遇到一群熊來襲击他們。从安加拉下游来的邮船，照常都是有人在岸边拉棹的。但有一次，深夜，在靠近船的岸上出现了5只熊；3只熊下水向船游来，其余两只留在岸上。带左輪手枪的邮差們向熊瞄准开枪，两只馬上被打死，其余都跑了。

泥濘时期以前的最后一艘邮船，带来了一封使我悲慟的家信，我的兄弟在信里說，我父亲等不及我从流放地回家已經死了。

廿 合作总会商店的成立

冬季一天比一天明显地到来了。9月的最后几天已经降霜，而从10月的最初几天起安加拉河已开始结冰。边区与外界的一切交通又长期断绝了。

到这个时候，物价又提高了许多。所有日用必需品差不多只有通过合作社才能买到。在我们包古查恩镇上也有一个合作社，但只有它的社员才能享受这种权利，当然我们是享受不到这种权利的。流犯的生活状况非常恶劣，为避免不愉快的事发生，当局不得不让我们参加合作社和给我们参加合作社生活的权利。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在安加拉沿岸全边区展开了巩固和发展合作社的运动，同时与地方上的小商店进行斗争。

自然，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了这么多的时间，与老百姓是搞熟了，亲热起来了。往往农民集会，农民自己也要邀请我们出席，给他们讲解一下某些法令。自从得到参加合作社生活的权利后，我们参加农民集会也好像是合法的了。

在此以前，在我们周围200多公里的境界以内，只有在包古查恩有一个合作社，同时社员几乎全部是这个乡镇的农民。现在，其他许多村落的人也参加合作社做新社员了，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在其他比较大的村庄也成立合作社

分社的任务。

农民們在出售毛皮的問題上最不滿意。我們向他們解釋，把毛皮賣給商人是吃虧的，要少賣許多錢的，而商人則借此發財。我們這種解釋收到很大的效果，农民們越来越多的把毛皮賣給包古查恩的合作社。在收購毛皮時，開始先預付不多的錢，而其余未付之款則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把它出售以後全部付清。應該指出，商人們永遠也不是一次把錢付清，而是先付定錢，但這筆定錢不是用現金來付，而是用很久賣不出去的陳貨抵償。再則商人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把毛皮出售之後，幾乎永遠又是用商品抵補其余未付的欠款，同時在這個時候，往往把商品的价格提得相當高。由此可知道商人們每出售一次农民的毛皮可賺到多么大的一筆利潤。但把毛皮賣給合作社，却比把它賣給商人能得到更多的錢，所以合作社的威信最後鞏固了。

包古查恩合作社的業務蒸蒸日上。在冥丘格村已經成立了它的一個分社，這個分社幾乎完全是為政治流刑犯服務的。他們把合作社的工作整頓得很好，因此合作社的聲譽日隆。

在我們村里已經有許多合作社的社員，因此在村民大會上我們提出了在伊爾基涅沃成立合作小店的問題。村民大會通過了我們的提議，並當場選出5個人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籌備和經營未來的小商店。人們從老年人中選出了村里的3位最受人尊敬的农民和兩個政治流刑犯——謝爾蓋伊·帕甫洛夫和我——組成這個委員會。因為我們不能馬

上找到一个适合开店的房子，便决定暂时把店設在謝尔盖伊·帕甫洛夫住的房子里。其后便駕两輛运貨馬車到宾丘格装载貨物。我們在当天的黄昏时候就买貨回来了。

最初发售給我們的商品数量极其有限。在那一天的晚上，我們召集委员会的人們檢查运来的商品。虽然农民們很信托我們，但我們还是按規矩办事，使每一种商品都由农民們亲眼檢查过。此外，这也是我們希望吸收农民参加合作社工作的一个办法。

大家委托謝尔盖伊·帕甫洛夫和我負責經營生意。虽然我們俩非常穷困，但不能對我們的劳动提出报酬的話，因为反正做这件事是得不到錢的。况且我們早就感到滿意的是，我們最后終于得到了一个参加社会有益工作的机会。

我們在那一天把自己的商店完全整理就緒后，天已經很晚了。委員們都已散会回家，但我和謝尔盖伊还把店里的事情談了很久，希望我們的小商店将来一定发达起来，将来一定使我們村里的小奸商最后不得不結束他們的营业。我們一直談到夜半3点鐘。

第二天早晨，当我高兴地去找謝尔盖伊时，我已看到他站在柜台后面郑重其事地把两磅煤油和一磅肥皂卖给一个农民了。农民們絡繹不絕地来我們商店參觀，而謝尔盖伊則站在柜台后面笑嘻嘻地称贊貨物。

我們的小商店一天比一天发展和巩固。报名入社的新會員一天多似一天。現在我們想从青年小伙子当中物色一个人当店員，但不論怎样物色，也不能从青年当中找到一个

适当的人选。全村能写会算的讀書人不过4人。但一个人因为有某种原因拒絕，而其他几个人，农民不相信他們。

这年冬天过得非常活跃。我們协会的許多会员都忙于合作社的工作，所以精神上很少感觉到流放地的痛苦和寂寞。

在仲冬，在几个协会里对未来革命的問題展开了討論。在这个时期，政治流刑犯中傳布着列宁的一个有名的提綱“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列宁在这个提綱中写道：“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发生。届时在无产階級面前将提出夺取政权、剝夺銀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的迫切任务。資产階級——特别是費边派和考茨基主义者一类的知識分子——将于此时尽力分裂革命和阻撓革命，强迫它接受局限的、民主主义的目的。”^①

对未来革命任务的这种决定，許多同志，連个别布尔什維克在內，当时是批判地接受的。某些人甚至認為这无疑地是印錯了，列宁是不会这么說的。这种怀疑是显而易見的，因为直到今天，我們的口号还是民主共和国，認為社会主义革命在目前是談不到的。由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当时許多人还不明白。

但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是大家期待着的。對我們有兴味的許多問題是：革命在何时并如何开始？革命的第

① 列宁：“关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論民族自决权”，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55 年中文版，第 127—128 頁。

一把火将在何处燃燒起来？軍隊和农民将采取什么态度？

尽管我們期望着革命，但最初关于革命的消息，却如晴天霹靂，使我們大家惊奇不置。好象一切事比我們所想象的都簡單。除了警察、宪兵和黑色百人团保皇党以外，誰也不积极地支持沙皇制度，結果在俄国統治了 300 余年的罗曼諾夫王朝复灭了。

廿一 关于革命的消息和从流放地启程

1917年1月到了。正是严冬气候。北部西伯利亚天寒地冻，坚冰裂骨。在我们住的屋子里很冷，要保持中等的温度，也需要不断地燃起炉火。常常因为在一个同志屋里晚上坐久了些，结果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时竟冷得连茶杯里的水都已结成冰了。此时紧要的事，不是脱衣服，而是赶快把炉子燃起来，只有慢慢等着屋里稍微暖和一些，才可脱去外面穿的衣服。

只有到2月的下半月，寒冷的程度才比较不那么刺人。经久不断的寒冷，已经使我们大家受够了，所以大家殷切期望和暖的阳春。当然，没有哪一个人怀疑我们是处在解放的前夕。

已经到3月了，但在俄国的2月天所发生的革命事变，在我们这里尚未得到任何消息，甚至是一些不确实的消息。3月的后半月，我们还没接到每周定期来的邮件，但对于这一点，谁也不十分注意，因为邮件的中断在先也是常有的事。

二月革命的第一个消息只是到3月中旬才传来的。这是在13日夜间到14日早晨的事，这个日期，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在后半夜的3点钟，有人到我住的房子跟前敲门。

我被惊醒了，立刻起来跑到門跟前問外面出了什么事情。乡警在門外答复我問的問題（这个乡警不久才从卡緬基村調到我們这里来。他对流刑犯們很表同情，而在我們派他到阿·德若帕里澤和阿·斯·基塞廖夫那里送信时，他能按时把他們写的条子交給我們。在我們村里，我們大家也和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馬上打开房門讓他进来。乡警兴奋到了极点，一进門便拉住我的手直搖晃。起初，我看到他这种情形还疑疑惑惑，怎么也不明白究竟他是干什么来的。最后，停了一下，他才开始向我庆祝已发生了的革命。

这种情形使我非常兴奋，但是我对他还有点不敢相信，甚至脑子里还有这么一种想法，以为他有什么奸計不成。但乡警立刻向我声明，他还带着一个通知哩，并愿意把通知拿給我看哩。我激动的两手发抖，点着灯一口气讀完了下面的几句话：“同志們！3月2日尼古拉第二退位，由米海伊尔代替他和他的儿子即位。米海伊尔又把皇位讓給立宪會議。事变的发展惊人地迅速。由前綫开回彼得格勒镇压起义的縱队到彼得格勒后参加起义了。成立了临时政府，参加的人是：部长會議主席兼內政部长——格·伊·里沃夫亲王；外交部长——皮·尼·米留柯夫；陆海軍部长——阿·伊·古奇考夫；交通部长——尼·維·涅克拉索夫；工商部长——亚·伊·考諾瓦洛夫；教育部长——阿·阿·馬努伊洛夫；財政部长——莫·伊·笛萊申柯；宗教事务院总檢察长——佛拉第米尔·里沃夫；农业部长——阿·伊·什卡列夫；司法部长——亚·費·克倫斯基。”

讀完了這張通知后，我开始問乡警这个通知的来源。他大略地告訴我說，这份通知是剛才一个农民交給他的，这个农民是由卡緬基村出发到包古查恩过去的一个村子的。这个农民的任务是把这份通知傳到政治流刑犯住的各村，但因为这个乡警过去是住在他們村子里的，而且这个农民又知道他同“政治家們要好”，所以他就把这份通知轉交乡警了。最后調查明白，这些消息是在叶尼塞斯克北部金矿工作的政治流刑犯从电报中收到的。他們收到以后馬上順便把这个可喜的消息轉达給卡緬基，后来又由卡緬基傳到我們这里来。

当然，我最初还不知道这一切詳情，对这个通知还不特別相信。只因农民要馬上帶这份通知往前赶路，所以我就匆匆抄下了内容并馬上穿起衣服把这个事变通知了其他的同志。乡警一出門，我也跟着上街到謝尔盖伊·帕甫洛夫那里去了。

此时已經是夜里3点半了。当然，謝尔盖伊睡着了，所以我敲了很久他才開門。当我告訴他这个可喜的消息时，他因为又惊又喜甚至身上打了一个寒噤，他穿皮靴的时候两手还在发抖。我和他两个人分头去通知所有的同志，并决定馬上召开會員會議。大家决定派我和謝尔盖伊·帕甫洛夫到包古查恩村，因为那里有邮政分局，同时我們还認為那里可能得到某些更可靠的詳細的消息。我們請謝尔盖伊的房东給我們駕了两匹馬在黎明天亮的时候坐車到包古查恩村去。

我們順路到了賓丘格，並且知道賓丘格的流刑犯們剛才也接到這個通知，於是他們也派了他們的代表到包古查恩去。雅爾克的同志們也是這樣。

到包古查恩鎮的時候已經過了中午。我們進鎮的時候，街上連一個人也沒碰到，甚至往常在這裏的15個鄉警也沒碰到一個；沒有人阻擋我們，所以我們便自由地通過村子到了流刑犯們的宿舍。那時，這裏已有40個由各村來的流刑犯。大家都興奮地爭論起今後怎麼辦的問題。當時決定等候到晚上，然後再召集所有來到此地的人們開會，並討論今後的對策問題。出乎我們的意料，包古查恩的同志們除接到上述的通知以外，也沒有任何新的消息。只是在這天以前不久，在一個流刑犯所接到的一封信中寫着這麼一句：“謹致社會民主主義的敬禮。”這些話，雖然以前郵政檢查員是不許可的，但這究竟還是非常不明顯的一個暗示。

但我們大家都感到總是有些特別的事情發生。這可由下面的事實證明，就是儘管有大批的政治流刑犯在包古查恩自由集會而警察局長也不採取任何措施，但在平常的時候，他一定來驅散我們大家。

在大會召開以前的幾小時，謝爾蓋伊·帕甫洛夫、我和另外一個同志借口要問明一個什麼問題，特到警察局長那裏看看動靜，看看他對於我們不經他的批准而到包古查恩來採取什麼態度。警察局長一看見我們，面孔就大變了，接着又非常客氣地問我們找他的原因。他露出了非常焦急不安的神情。當我們出門時，他也不敢問這麼多的流刑犯到

包古查恩是干什么来的。我們向他解釋說，我們觉得很煩悶，所以大家来此地互相見見面。显然，警察局长已經知道最近事变的情形了。

半点鐘以后大会开始了。在討論今后如何对付的問題时，发生了激烈的爭論。一部分同志主張明天早晨就开始成批由流放地启程，不必再等候补充的消息，另一部分則主張接到确实可靠的消息后动身。他們說，如果发生革命的消息不是确实的，那么流刑犯这样成批的逃走，乡警一定要屠杀我們。因此我們什么也沒有商量好，决定把大会延期到第二天再开。大約已經到了夜半4点鐘了。大家都还是非常兴奋，虽然天已很晚，可是誰也不能入睡。

大清早晨，包古查恩的一个同志来敲我們宿舍的窗子說，有一个过去在我們伊尔基涅沃住过而后来解到叶尼塞斯克的流刑犯帕留赫已从叶尼塞斯克来了。帕留赫証实了俄国发生革命的一切消息。他說，在叶尼塞斯克一听到了推翻专制制度的消息，立刻就在那里成立了社会救济委员会，該会派他为到我們这里来的全权代表，带着証件和金錢請流刑犯們启程。他住在地方自治会的房子里，当我們大家到他那里开会时，他簡單扼要地把发生事变的情形告訴了我們。

帕留赫是从叶尼塞斯克坐了几昼夜的驛站馬車来的，同时他在一路上解除了各村的一切乡警的武装。在地方自治会屋子的牆角放着他們带来的几支步枪和馬刀。他甚至把他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县警察局长巴哈夫，即当时在安加

拉河沿岸边区大家所說的“边区的害虫”也解除了武装。帕留赫把他逮捕并开了过去解流刑犯时用的一張“路条子”把他逐站解到叶尼塞斯克。后来，人們对我们說，巴哈夫在叶尼塞斯克被释放后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現在把消灭包古查恩旧政权的問題提出来了。当时决定，帕留赫既有权代表叶尼塞斯克委员会做这件事，那么我们是应该协助他的。大家都拥到街头。帕留赫把乡警的头目喊来，命令他把他的全体“卫队”集合在警察局那里放下武器。乡警恭恭敬敬地举手敬了个礼，馬上出門执行命令了。

然后是召集各乡鎮的乡长、村长和百人长們。他們由帕留赫率領，在胸前带着象征新政权的胸章一齐拥到警察局长的房里。警察局长絲毫未加抵抗，撕下他的領章，无条件地把一切公文卷宗和銀錢交給来找他的人們。帕留赫向他声明，他可以自由，并且可以到他愿意去的地方去。在包古查恩成立了由农民組成的临时乡鎮委员会，并将一切事务和銀錢移交給它。

这些事件过去两小时以后，我們大家都分头回到自己的村子。我們召开了村民大会，向农民們宣布了革命，帮助他們建立起了乡村委员会。其后才开始准备起程。但是在起程以前，我和謝尔盖伊还需处理一下合作社的商店問題。因为在此以前，我們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店員，同时也找不到房子，所以决定把一切存貨都送回宾丘格，交到包古查恩合作社分社的商店保管。我們不愿意拖延，等到天一亮就把

一切貨物用一輛馬車裝運到了賓丘格了。我們準備在第二天起程。

這是我們在伊爾基涅沃的最后一天了。晚間，農民們自動地召集了一個歡送我們出發的祝別大會，我們在這個會議上同大家熱烈地告別。天才微明，幾乎全村的居民都出來送我們到包古查恩去。當時約定所有的流刑犯都分批趕到包古查恩和康斯克之間最近的路上等着。

我和謝爾蓋伊及其他幾個同志列為第一批，於3月19日坐了7輛運貨馬車永遠離開了沙俄流放的偏僻的邊區，通過遙遠的路程向俄羅斯前進。

廿二 康斯克——彼得格勒

走了几天，最后，我們到了西伯利亚大鐵道上的康斯克。全城都裝飾着紅旗，到处都感到一片非常兴盛和欢騰的气氛。

在康斯克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初听到革命的消息后，也由各政党的代表們組成了一个社会治安委员会。我們在这里知道了更詳細的消息：二月革命是怎样开始，怎样发展的。

我們知道，2月27日那天，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以地主和保皇党罗将考为首的国家杜馬临时委员会，但几天以后，取得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执行委员会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領袖們的同意，把这个委员会改組为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并以里沃夫亲王为首。参加这个政府的左派代表是劳动党在国家杜馬的首領亚·費·克倫斯基。

准备坐火車到俄国各城市的許多政治流刑犯也已經从各区来到康斯克这里来了。

我們到了康斯克的第二天，举行了一次追悼会，紀念在这里死了的一个等候出发到俄罗斯的政治流刑犯。追悼会形成一个人山人海的示威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有各軍事部队和当地的无数居民。在送殯时一路上由管弦乐队依次

奏着“馬賽曲”、“国际歌”和殯仪进行曲。在墓地发表了許多动人的演說，庆祝革命的成功。我也代表我們安加拉沿岸边区的政治流刑犯发表了演說。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的場合講話。我說：

“彼得格勒无产階級在俄国全体工人階級和軍隊的支持下于2月所开始的革命，最后使几百年来吮吸俄国人民鮮血的沙皇专制制度灭亡了。但我們不應該忘記，这个胜利，俄国人民是花了很大的代价的。在革命未发生以前，在与沙皇制度所进行的敌我势力悬殊的斗争中，已經牺牲了不少的俄国人民、工人階級和农民許多世代的优秀代表，我們今天要向他致最后敬意的这位长眠的同志，也把他自己的一份力量贡献到这次斗争中了。”

我把臉轉向士兵，最后以下面的几句话结束了我的講話：“士兵同志們！記牢，斗争还未結束。旧制度的拥护者和資产階級不作声了，惶惶然地藏起来了，但他們并未放下武器。斗争还在前头，紧紧地握住你們的枪吧！”

第二天，我和謝尔盖伊及其他几个政治流刑犯动身到彼得格勒。在途中，特别是在火車站上，都邀請我們吃特別准备好的酒席。在火車未进站以前，常常有許多当地的居民和軍事部队拿着紅旗来到站上召开群众集会，直至列車停下的时候为止。欢迎我們的人們向我們握手問好，庆祝解放。直至彼得格勒，沿途都是如此。

我們于3月底的最后两天来到彼得格勒。許多布尔什維克从監獄、流放地和国外回来了。在战争开始之际被破

坏的所有布尔什維克的組織又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維克党的领导下开始为革命时期诞生的工人、兵士和农民代表苏維埃的政权而与临时政府及其政策进行斗争。

沙皇制度垮台了，但资产阶级和同它在一道反抗革命前进——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旧制度下形形色色的走狗还残存着。必需在新的、空前未有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斗争。